國學大師之死

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

同道 著

康有为　亡莫大于国魂亡，而国亡次之

王国维　殉身为清室，不忍旧学亡

辜鸿铭　只有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

梁启超　保国保种必先存学

章太炎　吾死，中夏文化亡矣

鲁　迅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蔡元培　以科学方法揭国粹真相

胡　适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陈寅恪　华夏民族文化终必复振

顾颉刚　历史传统不能一天中断

梁漱溟　中国之出路在儒学复兴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

冯友兰　阐旧邦以辅新命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章太炎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钱　穆

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胡　适

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梁启超

建议上架：历史文化

ISBN 7-80170-526-2





ISBN 7-80170-526-2/K · 113
定价：25.00元

國學大師之死

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

同道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同道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0

ISBN 7-80170-526-2

Ⅰ.国… Ⅱ.同… Ⅲ.名人-传记-中国-近代 Ⅳ.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7233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总 策 划 臧云鹏
责任编辑 宗 边 陈凌云
特约编辑 位灵芝 黄志伟 贾晓寰 李平收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　　本 16 787×1092 毫米
印　　张 18 2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国学”复兴大趋势

同道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

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

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本书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本书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本书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因此，书名中的“死”，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一、通过对13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解读其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由此使大家看到13个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二、正是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度讲，“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抑或说，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涵发生了大断裂。

极端而言，已成为一门“绝学”，或曰“绝唱”。

一

那么，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发生了这次大断裂呢？这就要看这个价值体系的载体——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国学知识——割断与知识界有机联系的时间和原因。

整整一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是这次历史性大断裂的开端。这就是废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

> 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 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1905年的8277所，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59117所；学生从不足26万人增长到1639641人。

进入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

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

5月，第二道令：

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

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

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1919年，历史再往前迈进一步。“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推动国语运动，并和“新文化运动”配合，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教育部接受胡适建议，下令：

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①，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全将旧时文言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中学教科书也逐渐改编为语体文。

民国十二年(1923年)，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

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

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当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一、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8～13岁是记忆力最旺盛的年龄段，而大学生的年龄通常超过17岁；二、他们在中小学校学习的语言是白话文，考上大学以后要看古籍，必须依赖《辞海》、《辞源》。

从这个角度讲，有人把本书中的13位学人称作“最后的国学大师”，并非言过其辞。

①即白话文——作者注。

二

读到这里，有读者也许会问：大清皇帝和民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出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时代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纵观1840年至2006年间166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救亡——强国——富民——和平崛起。

1840年至1945年的主题是"救亡"，期间经历多次由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

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军火烧圆明园；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精锐部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攻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

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全面爆发。

这段屈辱、悲惨的救亡史，直至1945年9月2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美军舰"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一刻起，才告结束。

至于如何救亡，国人起初遵循魏源①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理念，向西方学习。但其中的"技"几经变迁，从军事科技到维新变法，从改变政体到排满革命，从教育人才到文化启蒙。这多种救亡方

①1794～1857年，晚清思想家，曾任江苏布政使。

法，呈递进纵深的轨迹向前摸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威严扫地，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开始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疆大吏们放下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对待英国使节马嘎尔尼[①]和阿美士德[②]的“大国”傲慢态度，发动“洋务运动”。不过，随着科学技术一同潜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使当时的精英阶层十分警惕，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于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早在1861年冯桂芬[③]所写的“采西学议”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着力打造军事力量的“洋务运动”历时35年，至1895年甲午战败结束。期间，本书所讲述的13位国学大师，除辜鸿铭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华侨，康有为在1887年偶游香港看到一些西方书籍外，其余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大概是因为军事是政府的事，与知识分子关系不大。

直至甲午战败，军事至上理念破产，知识分子才为民族忧患意识驱使，向西方寻求“器物”（坚船利炮均为有形的器物）之外的“技”，于是才有了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试图引入西方政体，打破了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动摇了“中学为体”的价值观。梁启超将康有为称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其“新”字大概就是针对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而言。

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28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

①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乔治·马嘎尔尼勋爵率领400多人船队来华，借为乾隆帝贺70寿辰，提出在中国沿海设立贸易港口，在北京常驻使节。按照大清仪制，乾隆要求对方下跪叩头。双方发生争执，最后采取妥协的办法，马嘎尔尼勋爵单膝跪地向乾隆帝递交国书。乾隆虽赏赐甚丰，但拒绝了英方的所有要求。

②1816年，英王派遣罗尔·阿美士德勋爵访华，再次提出通商要求，遭到嘉庆皇帝拒绝。因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被驱逐出境。

③冯桂芬（1809～1874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官至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曾师事林则徐。

社，开始学习日文；21 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 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 年）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在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看来，"康梁"的变法并非不对，而是过于激进，没有争取到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其实，内忧外患之际，清朝政府也在进行着自我救亡。1906 年 9 月 1 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第二天，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获准。

当时，以清朝体制为精神象征的学人，并不在少数。康有为自然算一个，他于 1927 年 3 月死于食物中毒，人们怀疑为慈禧所派刺客所为，因为自维新变法开始，他便以保光绪而去慈禧为己任。他死后，弟子们向溥仪求谥号"仁忠"而不得，是因为他劝说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因此也有人认为他被日本人毒害。

辜鸿铭（1857～1928 年）从西方浪漫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到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可贵之处，至死留着清朝的辫发。他的学问和观点虽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所轻，死时门庭冷落，但却得溥仪赐谥"唐公"。

没有功名却在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1877～1927 年）是 13 个人中唯一的自杀者，他的死实在是因为价值观无法寄托于未来的革命政府，而不得不以殉清而终，得溥仪赐谥"忠悫[①]。"

梁启超之死为西医误割右肾所致，但死前仍撰文为西方的科学精神辩护。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主张开明专制。1919 年考察一战后的欧洲，思想回归东方文明。

---

①què，诚实的意思。

与改良派相对应，维新思想所演化出来的另一条思想路径则是排满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都认为，不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便无救。

章太炎以高深的学问立身，以民族革命为己任，以革命家的精神行走于时事政局之中，七被缉捕，三入牢狱。曾两选墓地邻居，一为抗元志士刘伯温，一为抗清志士张沧水。临终留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蔡元培（1868～1940年）在戊戌政变后，产生"教育救国"思想，以办学为名鼓吹革命，爱国学社实为暗杀团训练基地。

本书13人中，享受"国葬"待遇的，前有章太炎，后有蔡元培。盖因革命者的革命精神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而蔡的规格又后来居上，受到了国共两党的大规模追悼。可见蔡在革命之外另有教育之功，深得士人之心。

进入民国，袁世凯称帝，革命派的理想并没有随着清朝的覆灭得到实现，革命成功并没有带来"救亡"的成功。于是，"救亡"未完，"启蒙"又起。标志性事件就是新文化运动。

军事——法制——政体——教育——革命——文化，救亡的手段用到最后，就是"文化救亡"，所以我们不妨把新文化运动称作"文化救亡"。至此，国人灵魂中真正的冲突开始了。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中，中西方文化层面的正面冲突正式拉开序幕。激进派从西方、保守派从历史分头寻找民族精神的原动力，最终激进派占了上风。胡适（1891～1962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全盘西化"，鲁迅（1881～1936年）的"打倒吃人的礼教"、"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最强音。

此时，13人中年龄较小的梁漱溟（1893～1988年）、顾颉刚（1893～1980年）、钱穆（1895～1990年）、冯友兰（1895～1990年）都已经20多岁，思想已经成熟。梁漱溟、顾颉刚、冯友兰当时都在北大，被裹挟进了这股潮流；钱穆虽未上北大，但也每月必看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

站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成为了"救亡"成功的一大关键；但也正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

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化向“第三种形态”更新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赖以“救亡”的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负面结果，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也正因如此，后人往往忽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闯将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要“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进一步说，仔细读完书中所选的13位国学大师，你就能发现：他们到了晚年，无一例外地有向中国传统回归的迹象，只是程度、速度上有差别而已。这大概可以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历经“千年变局”而不灭的合理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清醒之人：梁漱溟就因为不满西化之风，“五四”时始读四书五经，并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钱穆当时就对这些放弃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人们提出疑问，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强国”替代“救亡”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洋务运动”。当然，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有本质区别。清朝是国门大开，引进欧美技术，依靠外债；新中国是相对锁国，引入苏联技术，自力更生。清朝政府最大的收获是北洋水师，而新中国则诞生了“两弹一星”，建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原子弹已经具备现代战争的“核威慑”能力，外族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却使昌盛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时机被错过。13人中死于这一时期的只有一人。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通过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和清末名妓柳如是这两个女人的研究，寄兴亡于“心史”。1969年10月因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去世，时年79岁。

1978 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由“强国”转向“富民”。

近 30 年过去，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国逐步具备了建设强大而文明的国度的基础条件。但是，伴随着物质上的持续繁荣，西方文化也悄然浸染。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崇，其标志事件就是 1990 年的“华盛顿共识”[①]。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最后两位国学大师——钱穆和冯友兰——相继谢世。此前，顾颉刚与梁漱溟已于 1980 年、1988 年去世。

在他们死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薄弱，加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实用主义的驱动，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在青少年中演变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极端个性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金钱为上”、“个人利益第一”。包括今天年轻的精英学者阶层，更多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有意无意忽视其《道德情操论》；强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倡导的人性本恶、追名逐利的内容，轻视他在《论李维》中对公民美德的重视，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以我为主”而不及其余。

其实，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的 500 多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复兴、与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抗、政治自由主义等多个阶段，并且已经形成了新的思想传统：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相协调是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个人自由应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自由主义者应从共同的道德善出发，为国家作奉献，对其他社会成员承担必要的义务，等等。这样的思想传统与我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岂是同一种东西？

---

①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与会者就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 10 种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是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及私有化。

四

进入21世纪，时代主题又从“富民”走向“和平崛起”。

在大国姿态日益显现的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临文化层面的历史性隐忧。可喜的是，在废除科举整整100年后，我们迎来了“国学”复兴的曙光：

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授课；

1个月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乾元国学教室”开办国学班，学员为40多名民营企业老板、银行行长、政府官员；

2006年8月，复旦大学哲学系宣布在沪开办首个“精英国学班”；

数日后，清华大学宣布将在10月开办“中华文化精髓与现代企业谋略高级研修（上海）班”，与复旦大学形成两强抢滩之势。

在人大国学院挂牌的同时，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挂起孔子像开馆；

2006年，武汉出现首家蒙童学馆；

2006年，湖南平江、江西南昌、江苏徐州、重庆等地的“现代私塾”如雨后春笋悄然面世；

2006年7月，上海出现全日制私塾——孟母堂。一个多月后，该私塾被有关部门叫停，旋即掀起轩然大波。“国学”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

在这股浪潮的背后，我们能体会到国家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素有“第二党校”之称，是执政党培养优秀理论人才的基地。2001年9月，该校在校园内竖立起一座巨大的孔子像，举行揭幕仪式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参加，并发表讲话给予肯定；2002年11月，成立孔子研究院，教育部相关司长参加成立大会。

这是否说明执政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呢？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2003年2月，一本看似普通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就出版了。这本书由江泽民题词，李岚清作序。出版后，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领

导人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要求发放到每个中小学生手中，作为重要的课外读物。

2004 年 7 月，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在海外建立 100 所孔子学院”，并指示“结合当前国家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从国家事业的高度，按照‘抢抓机遇、迅速突破’的指导方针加快推进建设”。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任务与三大文明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而“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就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同月，纪念孔子诞辰的祭祀大典在山东省曲阜市孔庙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活动首次由政府举办，公祭由曲阜市市长主持，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直播。

除了国家力量，我们还能感受到商业力量在“国学”复兴进程中的助力：

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名校的国学班的学员耐人寻味。与人大国学院面对在校学生进行授课不同，这三所学校无一例外地将推广国学的对象定位在了民营企业的老板阶层，学费自 2.8 万元/年至 3.8 万元/年不等，授课时间每个月只有两天，平均价格超过了前几年泛滥成灾的经营管理课程。这是否又说明中国的先富阶层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对精神归属感的向往呢？

至于“遍地开花”的“现代私塾”，则毫无疑问地将“国学”的复兴希望寄托在了我们的下一代。以“孟母堂”为例，在招收的 12 名学生之中，一半是教师的子弟，另一半则是成功商人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已经悄然成为中国人精神之旅的主旋律。可以断言，其蔚然成风继而成为一时代的大趋势、大洪流，为时并不远矣。

那么，单纯地回归读经时代吗？当然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难道不令人担忧吗？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努力，不过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相信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理性和智慧，更多关注大趋势、大洪流的来临。因为

这意味着在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重建民族精神的根基。

正如章太炎所言：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国学大师虽魂兮归去，然文化传承决不可断。又正如顾颉刚所言：

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子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之本。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北京同道新文图书公司联合推出的这本书，我们愿她成为千万个读者点燃文化蜡炬的一根火柴。

如果您愿意和作者、编者交流本书内容或其他国学知识，请联系：010—64915748，publish@todonews. com

臧云鹏

2006 年 10 月

目 录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

假如没有蔡元培

胡适:近代学术思想的枢纽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

钱穆:最后的国学

三部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

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

——梁启超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陈独秀

（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

——费正清



康有为晚年生活奢侈，有别墅三处、妻妾五房和未婚子女六个，每月总开支两千银圆左右（约人民币八万元）。图为康有为七十大寿时在『游存庐』别墅与家人合影。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着10天前的七十大寿。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康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送来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全联集《史记》、《汉书》及《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天然贴切，把康有为比喻为孔圣人，这让一直以“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煞是喜欢。

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去，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到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的去世，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康有为七十寿诞后，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

后把他的像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到青岛之后，写赐寿谢恩折时，未写数行就开始痛哭，写完后告诉家人说："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

另据康有为晚年在青岛结交的晚辈李可良在《我印象中之康有为》记述：死前康有为曾对家属作过个别的安排与嘱咐，唯对于九姑娘未曾说到，别人问他，他说"她是跟我一路的，你们不必管了。"果然，康去世几天后九姑娘跟着死了。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充满了神圣意味。

康有为死后不久，门人弟子要求溥仪谥之"仁忠"，但遭拒绝。又拟将其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他们君臣相伴，也因经费不足作罢。十余天后，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 3 天才选定的墓地。

据目睹过康有为葬礼的黄人明说，当时的殡葬场面非常宏大，原本准备用两匹马的马车将棺木拉到枣儿山上，但因山势陡峭，马车根本上不去，最后只能由人抬上去。马车前面有一种架子装饰叫"罩"，前面扎了一个大花头。当时康有为的子女每人都穿了一身孝服，脚穿草鞋，下葬后子女们就把草鞋扔掉，赤脚回家，以表孝意。

康有为死时，妻妾子女大都不在身旁，门人弟子也都散落各地。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后，失声痛哭，于当年 4 月 17 日召集康门弟子在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弟子们涕泪双流，梁启超哽咽着宣读祭文："吾师视中国如命……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繄百日之设施，实宏远而周详……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

谁毒死了康有为？

上文关于康有为死前几天的情形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的记载。两人的描述中不约而同使用了"七窍出血而死"的字样，这极可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多数人认定与中毒有关。但是否有人故意下毒，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种种猜测。

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据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的一份交代材料所记，康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这种说法迄今未见任何其他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也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出四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叫巫仿，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晋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康有为，终于在青岛成功。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之时，下诏赦免了一大批戊戌获罪人员，但不包括康、梁，可见他一直未被慈禧所原谅。但此种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康有为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对此两种说法都不赞同。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这样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近年来，出现了第四种说法。青岛有位人文工作者姜茂森，从吕振文儿子的口中得知，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据这位吕氏后人说，当时英记酒楼的同乡宴请，吕振文也在座。康有为喝下橙汁后腹疼不已，还是吕振文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直到几十年后，吕振文才向儿子透露了实情：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为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终于置之死地。

这个曾为康有为撰写过墓志铭的吕振文，在1938年变节求荣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9名委员之一，后来又先后出任伪青岛特别市财政局长、土地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吕振文为人气节固然令人不齿，但由此也可得出，“日本人下毒”之说，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除去上述种种猜测之外，关于康有为的死，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万象》六卷九期曾刊出毛丹先生《康有为晚年》一文，转述台湾老报人关于

康氏请德国医生移植猴子"青春腺"于自身的奇闻。文章说道，当年康有为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说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研究多年的返老还童术已获成功！他把类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可以使人明显年轻，记忆力、性机能等方面都大大增强，80岁的老翁可以策马驱驰……康有为读至此，抛书拍案而起，高喊："大清有救了！"

为避人耳目，康暗中通过至交、上海名医江逢治奔走，重金延聘擅长此术的德国名医冯·施泰勒为他移植睾丸。手术那天，康有为只带了一个仆人前往诊所，德国医生选取了一只年轻公猿的睾丸为其置换。手术成功后，康有为自我感觉甚佳，体力明显增强，步履轻捷，读书写字无丝毫疲劳，食欲也大增。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月，其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精神日渐萎靡，身体也每况愈下。施泰勒闻讯而逃。康有为一怒之下，竟向法院起诉施泰勒"妖术欺世"，但未及法院开庭，康氏即于1927年初匆匆弃世。此种说法比较荒谬，且无任何佐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大清朝的"忠诚"。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康的"国学大师"身份以及"保皇派头子"的头衔，遭到了"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1966年8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到康的墓地掘坟开棺。但挖了一上午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去吃饭了，留下一位姓赵的老师在此看守。

据目击此过程的人事后回忆：在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1.5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的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80厘米，厚约35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棺木为红松，约4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有为同时死亡的3岁幼女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

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下葬时身穿中山装,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1.5米,厚约80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待康有为的头骨被掏出来之后,红卫兵们把它绑在木棒上,游街示众,并高喊“打倒中国保皇派的祖师”。忙乱中还丢掉了下巴骨!其时,正逢青岛博物馆与青岛市红卫兵总部联合举办“造反有理”展览会,负责人王集钦看到造反派如此对待康氏尸骨,便以摆展览为名要求红卫兵将头骨送到展览会,以便加以保护。开始有人写了一个“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说明牌,在王的一再要求下才改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头颅”字样。展览结束后,康的头颅被扔在了台阶上。王找了一个木箱,将头骨放进去,又钉上盖子,冒着随时可能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把它藏在办公室里。1984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在浮山南麓(今青岛大学旁)决定重修康有为墓,并四处寻找康的头骨,王集钦这才将它献了上去。

此时,距离康有为的出生已经过去了126年。经历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巨变,我们今天或许可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康有为这个人。

“新中国史”第一章

1858年的中国,腐朽的清王朝正经历着英法联军和太平军的双重蹂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烧杀掳掠,正伺机北上;2月,三次受挫于石达开的曾国藩,返乡奔父丧,太平军一度得势。3月,一个将从思想根基上动摇清朝统治的人降生了,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爷爷当过连州“训导”,叔祖官至广西“巡抚”,父亲是江西“候补知县”。家业丰厚,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两万卷藏书为康有为幼年潜心读书、增长见识提供了很好的

条件。他五岁便能夜读信件，口诵唐诗数百首。有一次，叔伯们为试试他的才气，出“柳成絮”属对，康应声对以“鱼化龙”。父辈们见他小小年纪出语不凡，便刮目相看，捋着胡须说：“此子非池中之物也。”十二岁时看龙舟竞赛，康即席写出一首四十句的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他接受这种称赞，自以为比其他同学高一等，“大有霸视之气”。

少年时，康有为从几位启蒙塾师教授的儒家经典里受到封建文化熏陶，有志于圣贤之学。与人交谈，言必称圣人，话必引经典。走路时，口里喃喃诵诗文，经常碰了墙壁或撞了树干才突然停步。有一次一早出门，午饭仍未归，家里人四出找寻，原来他蹲在村口厕所里看书入了迷。村里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半是期许半是揶揄的绰号“圣人康”。

与他之前和同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康有为在前辈的督导与教育下，试图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与多数读书人一样，康有为也是屡试不第。这让他很不甘心。

于是拜当时的大儒朱次琦为师，受“济人经世”之学，从学三载，阅书无数，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受其影响，康有为后来拒斥古文经与程朱理学①，而信陆王心学②。陆王心学重视“修心养性”，这时的康有为开始厌恶“日埋古纸堆”的读书生活，于是“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一会儿看到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成了圣人，欣喜而笑；一会儿又想到天下苍生都在困苦之中，闷然而哭。同门见他如此怪异，以为他有心理问题。其

①程朱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合称。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②陆指南宋陆九渊，王指明代王守仁。陆九渊为宋代“心学”的创始人，以“心”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客观规律的“理”主观化。王守仁力承陆学，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创“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说。陆、王两派思想上一脉相承，和程朱学派相对立，明代以来有较大影响。

实，这是因为康有为遭受到了思想上的危机。朱次琦虽然教给了他“经世致用”之学，但他认为在这里无法找到救国救民的良药，心情十分郁闷。

第二年(1879年)发生了三件事，使得康有为的人生开始与别人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是辞别朱先生，入西樵山读书四年，此次修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力(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他先是转向道学和佛学，修心养性，后又全心致力于公羊学①，用一种新的眼观来阅读“故纸堆”。康有为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最完备和最可靠的儒家真理，孔子作《春秋》是微言大义，而不在记录史实。康有为对公羊学派的兴趣并非是纯学术的，而是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梁启超说，康有为是用公羊学来变法的第一人。经由对公羊学的研究，以及后来所接触的印度佛学和西学，康有为试图重建儒学，为革新制度奠定哲学基础。康有为经常自比孔子，他的字“长素”就是长于“素王”的意思，“素王”(古人认为，孔子虽不居皇帝之位，但拥有皇帝之德)就是孔子。他的弟子称呼他为教主、南海圣人等，他则称弟子陈千秋为“超回”(超过颜回的意思)、梁启超为“轶赐”(赐指端木赐，即子贡，轶是超车的意思)、麦孟华为“驾孟”(凌驾孟子之上的意思)、曹泰为“越伋”(伋指孔伋，即子思，孟子的祖师爷)、韩文举为“乘参”(参指曾参，乘是骑马的意思)。

第二件事是入山读书时认识了在京任职的张鼎华(时为翰林院编修，以文学盛名于京师)，从他那儿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从而知道了京城风气、当时的人才，以及各种新书。从此决定舍弃考据、八股之学，专心养意，以经营天下为志。

第三件事是游历香港。他看到香港宫室瑰丽，道路整洁，不由得赞叹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把他们当作夷狄。于是，在拜读国人著作外，又开始阅读

---

①汉武帝时，为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董仲舒挖掘《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著《春秋繁露》，构建起了公羊学的一套体系化的理论。主要思想包括大一统、通三统(夏、商、周三代之历法)、张三世、更化改制等。东汉何休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撰《春秋公羊解诂》，明确提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概念。魏晋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变迁，公羊成为绝学。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公羊学重新兴起，代表人物有刘逢禄、龚自珍。19世纪末，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西学著作。三年后(1882 年),康有为途经上海,国家的衰败、人民的苦难与洋人的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报纸书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政治制度等,知道了西方治国之术是有根源的,于是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

就这样,康有为在 20 岁出头时,已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萌芽思想体系。

1888 年,康有为第四次乡试落榜,更加觉得清廷无可救药。于是决意不顾禁令,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①],请求变法。在这篇充满激情的奏折中,康有为先是痛陈了所面临的危机,激烈地批评了统治者的麻木不仁,甚至大胆批评了慈禧和光绪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软弱无能。接着向慈禧和光绪提出了三项建议:"变成法"(参考古今中外法制,推行新法)、"通下情"(使民间舆论可以上达朝廷)、"慎左右"(慎重选择能够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大臣)。这份奏折虽因多方阻扰未能上达,但他大胆的行动和主张在爱国人士和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成为知名人物。

上书没有成功,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沉寂,而是开始默默地思索真正的救亡之路。他认为救国需从培养人才入手,于是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梁启超就在这时成为了康门弟子。

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六经和孔子学说开刀,重新解读,为维新变法寻找到了理论依据,引起了极大轰动。

《新学伪经考》通过历史的考证指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作"伪经";是王莽一朝的学术,所以又叫作"新学"[②]。他说,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指斥"古文经"不是孔子的"真传",后来宋人所注疏的经,也多是伪经。这一下捅了大篓子,因为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是以宋代的理学作为正统思想的。但康有为不理这么多,他就是要

---

①此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二十几次上奏折。

②公元 8 年,王莽篡夺汉朝皇位,改国号为"新",史称"新朝";公元 23 年以王莽之死结束。

打倒统治者赖以维系的旧思想，为实行变法扫除思想障碍。

《孔子改制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的历史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一来，康有为把常人心目中的孔子改头换面，装扮成了“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这还不够，他还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凡是变革所需要的东西，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因此一跃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例如在《尚书・尧典》中有“咨四岳”一句，意思是向四个部落酋长征求意见；康有为却解释说，这是孔子主张民主政治。又如有“宾四门”一句，本指各方诸侯入贡于天子，康有为则说这是孔子主张“开议院”云云。

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准备会试的康有为深感痛心，连续一日两夜没有休息，写成了一篇长达一万八千多字的《上清帝书》，随即令梁启超等人联络18省在京举人，准备联名呈给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反对议和，主张继续作战，将矛头直指主和派大臣，阐发了变法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比较系统、具体的变法纲领和措施：富国（发展经济）、养民（奖励发明，改善商业环境）、教民（普及文化教育）和革新庶政（改革政治组织和行政机构，广泛吸收人民参政议政），从而为戊戌变法确立了基本框架。

这次“公车上书”，随着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嘭”然盖上玉玺而宣告破产；虽未能上达天听，但康有为却从上书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于这年5月又上了第三书。此时的康已经是进士了，没人敢扣压，上书最终到达了光绪手中。光绪看完之后，心中极为痛快，对康大加赞许。这让康有为倍受鼓舞，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变法救国的主张，于是在7月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

报》，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为即将到来的变法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又给光绪帝上书，同时上呈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光绪帝这回也耐不住了，不甘心做一个亡国之君，甚至一度想请来华游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指导改革，足见他的维新愿望是如何的迫切。两人一拍即合，先是由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接着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下诏后，光绪帝立刻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终于见到了久已向往的天颜。当时的康有为不过是一名六品工部主事，被皇上破例召见，还赐坐说话，这对康有为来说，是怎样的殊荣！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变法因慈禧太后的干预而流产。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帝和过于理想主义的康有为，在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103天后，开始走向各自人生的末路：光绪被慈禧囚禁，直至去世；康有为远走海外，思想日益为世人所弃。

据不完全统计，1895至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33个、学堂17所、报馆9家、书局2家，至1898年增至300多个(所)，用以广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它突破了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技艺的牢笼，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先河，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改写。梁启超说："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

忠于君主，更忠于思想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清政府通缉，开始了长达16年的逃亡生涯，遍游四洲，经31国，行60万里。在此期间，他一直念念不忘被慈禧幽禁的光绪帝，更让他无法舍弃的是孜孜以求的"君主立宪"梦。在康有为的心目中，要想下赢"全中国"这盘棋，首先必须保证将帅(光绪)无虞，方可徐图大计。

为保光绪，康有为先是逐个给各国驻华公使写信，希望他们联合起来干涉慈禧太后，解救光绪帝；后又辗转日本、英国等，试图说服各国政府，但均未果。康有为逃亡日本时，正赶上孙中山也在。孙中山便想与康有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政府，但康声称自己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来，依然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解救光绪，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康有为深知，要想营救光绪，还得依靠军事力量。1899 年 7 月，在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协助下，康组织成立了保皇会，全称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会成立不久，便赶上光绪帝三十圣寿，康精心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祝圣寿”。他领着数百华侨，长袍短褐，对着龙牌行三跪九叩大礼，遥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在康、梁等人的领导下，保皇会先后筹款 40 余万元。这些款项主要用于资助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以及徐勤等人在广西、湖南等地的队伍，发动“庚子勤王”运动，以期解救光绪帝，但最后被张之洞所镇压。

之后的康有为，暂时脱离了现实世界，把注意力转移到戊戌变法前的理想——重建儒学。在 1901—1902 年间，康有为先后完成了五部书：《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大学注》以及《论语注》。这是康融会古今中外思想重建儒学的一个结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礼运注》，在这本小书中，康有为正式将大同与小康之说（取之于《礼记·礼运》）与三世说（取之于《春秋公羊传》）相挂钩，为写作《大同书》奠定了根基。在这本书里，康有为还说孔子之道先是受损于荀子的武断哲学，继而又惑于刘歆的伪造，最后败坏于朱熹的偏见。结果，中国未能得到孔子之道的好处，只能停留在“小康”之世。

1902 年，康有为写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大同书》，构建了他对“新世界”的理想。他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之道结合起来，又吸取耶稣教、佛教的平等、博爱的教义和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提出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全书从揭露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入手，表达他对社会黑暗腐朽的强烈不满。他以圣人自居，设计救世方案：大同社会是人类尽善尽美的境界，是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一、没有阶级和种族之分，没有军队、国家和君主，全世界合立一公政府，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及物质文化

生活；二、取消家庭，男女平等，男女婚配只订交好合约，不再是夫妻，所生子女，由公政府抚养，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公政府管理；三、没有私有财产，一切生产资料，无论工、农、商，一律归公有；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运输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人们的劳动时间大为减少，物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总之，大同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人人相亲的极乐世界。

不过，环境很快又改变了。1906 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北京传来消息，说太后与皇上的关系已经和好，皇上开始参与新政。康有为得知后，欣喜若狂。认为现在朝廷自行变法，实行立宪，定可以扫除几千年来的弊政。如此一来，自己以后就不必再提什么解救皇上了。于是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康有为积极上书请愿，出谋划策。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采取他的建议了。

1908 年 11 月 14 日，一心变法而不得的光绪皇帝逝世，时年 38 岁。消息传来，康有为"泣血呼踊，号于昊天"。他对光绪帝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与期望，一心盼望他能够复政，继续未竟的变法大业。然而就在事情获得转机时，光绪皇帝却过早去世，这不能不让康有为痛心。康有为认定是袁世凯害死光绪帝的。当初袁世凯出卖皇帝、镇压维新派，现在看到光绪帝就要复位，为了防止报复，毅然杀死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一推理，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便决定发起讨伐袁世凯的运动。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康有为仍不妥协，创办《不忍》杂志，以期唤起国人支持他的"虚君共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试图邀请康有为回国主持孔教会事宜，遭到了康有为拒绝。康回国后，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特别是接受"二十一条"口诛笔伐，同时主张武力倒袁。

倒袁战争结束后，康有为就撰写了《为国家筹安定者》一文，为清室复辟大造舆论，多次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后又积极支持张勋复辟，但其主张不为张勋所接受，自己只得了个并无实权的弼德院副院长之位，一怒之下辞职南归。溥仪在闹演了 12 天的复辟丑剧后，再次宣布退位，康有为终究未

能保住他的"将帅",声誉也一落千丈,最终对政治产生了倦意,开始寄情山水,漫游神州大地。

1922年1月,康有为游历杭州时,看了一出《光绪痛史》的戏。当看到台上光绪催促康有为出京逃命,康有为誓与圣上同生共死一幕时,台下的康有为泪流满面。回想起公车上书时的意气风发、戊戌变法时的挥斥方遒,而如今却只能寄情山水,为世人所不解,禁不住苦叹道:"人生百年悠忽而过,欲建功立业,何其难呀!"此时的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理想的幻灭,承认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使命将永远不能实现:"先帝遇害早亡,革命祸乱神州,大同之梦看来永远也遥不可及了。"

从表面上看,康有为似乎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保皇派,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康有为说:"春秋之义,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依据这一理论,他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实现民主共和,也就是从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他断言:太平世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即民主共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据乱世,并不适合直接进入到太平世,必须以君主立宪作为过渡。由此可见,君主立宪只是康有为基于改造现实而提出的一种路径,他的最终理想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大同。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仅企图做小规模的重建工作的话;那么在《大同书》中,他则定下了极大的改革计划,其影响的深远,非同时代的任何人所能比拟。

但是,先知的命运往往是不被人所理解,对此,李敖有这样一段话:

> 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

只能活在现在。

倘若康有为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视李敖为知己的。

轶事

康有为“抢”了梁启超的进士

1895年，康、梁赴京参加会试。当时的主考官徐桐等人是极端保守的官僚，在他们看来，康是一个有叛逆思想、不受欢迎的人，因此他们告诫阅卷大臣：广东试卷中有才气的，定是康有为，千万不能录取。但所有的试卷都一律将考试人的姓名封闭，因此只能从内容猜测。一位大臣发现了一篇才气横溢的试卷后，便相互传阅，阅卷大臣都以为是康的，决定不予录取，但事实上是梁启超的试卷。结果，康高中进士，梁名落孙山。

孙中山要见我，先得拜我为师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回到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当时孙中山也在广州开业行医，两人相距甚近。孙中山曾托人致意，希望与他会谈，争取他参加革命。康有为比孙中山长六岁，拒绝平等见面，要求孙中山先办一份门生帖子，拜他为师，才允见面。孙中山认为条件太苛，两人终于没有相会。

“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康有为逃亡日本期间，有次应邀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在闹洞房时，康有为即兴做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并邀请闹洞房的亲友宾客在每个字上加一笔，组成一句贺词。后在康的暗示下，新娘在“司月二大”四字上各加一笔，新郎在“旦牛住了”四字上各加一笔。添加完后，康让新娘和新郎齐声读出。新娘新郎两颊绯红，难于启齿。康朗声读道：“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引起在场宾客哄堂大笑。

妙助徐悲鸿与爱人私奔

徐悲鸿与上海大同学院教授蒋梅笙之女蒋碧微，在哈同花园一见钟情。但蒋早在13岁时已与苏州同乡查紫含订了亲。查家乃姑苏大户，退亲几乎不可能。万分苦恼之际，徐便向康求教。康听后，略加思索，仰天大笑："哈哈，就让老夫来穿针引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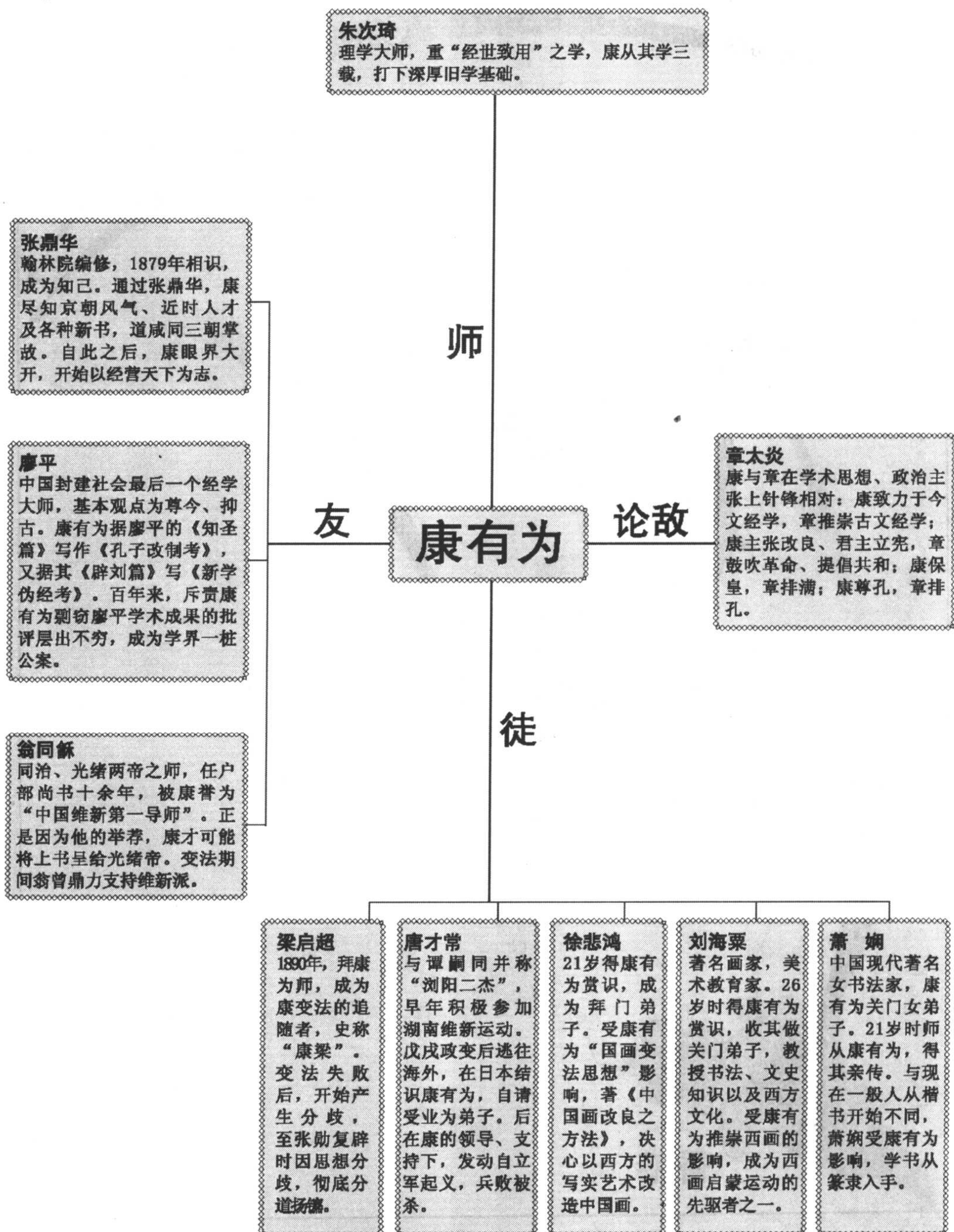
此后，康多次登门，说服了蒋梅笙。1917年5月，徐与康商量，准备在春暖花开之际，携蒋碧微赴日本写生。经过一番策划，康先让徐躲进辛家花园，"失踪"几日，临行前蒋碧微才化妆潜出。赴日前夜，皓月当空，康设宴为他们饯行。他举杯道："祝贺悲鸿与蒋小姐私奔成功!"然后提笔深情写下"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给这对才子佳人。

蒋碧微私奔前，曾留下"遗书"一封，其父已知内情，特意买了一口棺材，内装石头，并在《申报》上登了爱女病逝"讣告"，借以掩人耳目。

章太炎撰联嘲弄康有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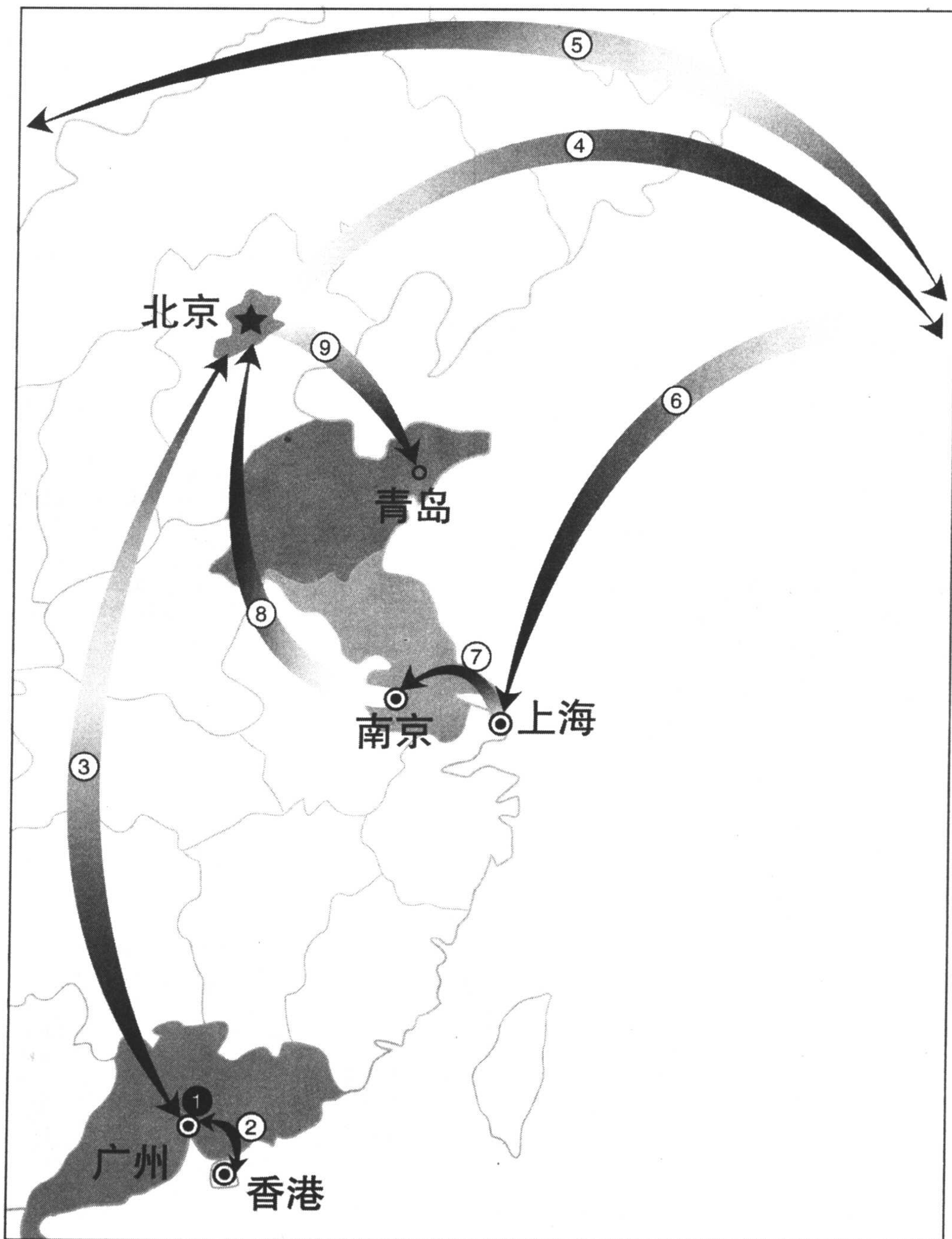
据说，章太炎曾撰联嘲弄康有为变法不成，反组保皇会。上联：国家将亡必有；下联：老而不死是为。该联既嵌入"有为"二字，又运用歇后语的方法，分别隐去"妖孽"和"贼"(《札记·中庸》："国事将亡必有妖孽"；《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康有为关系图



朱次琦
理学大师，重“经世致用”之学，康从其学三载，打下深厚旧学基础。
师
张鼎华
翰林院编修，1879年相识，成为知己。通过张鼎华，康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此之后，康眼界大开，开始以经营天下为志。
廖平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经学大师，基本观点为尊今、抑古。康有为据廖平的《知圣篇》写作《孔子改制考》，又据其《辟刘篇》写《新学伪经考》。百年来，斥责康有为剽窃廖平学术成果的批评层出不穷，成为学界一桩公案。
翁同龢
同治、光绪两帝之师，任户部尚书十余年，被康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正是因为他的举荐，康才可能将上书呈给光绪帝。变法期间翁曾鼎力支持维新派。
友
康有为
论敌
章太炎
康与章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上针锋相对：康致力于今文经学，章推崇古文经学；康主张改良、君主立宪，章鼓吹革命、提倡共和；康保皇，章排满；康尊孔，章排孔。
徒
梁启超
1890年，拜康为师，成为康变法的追随者，史称“康梁”。变法失败后，开始产生分歧，至张勋复辟时因思想分歧，彻底分道扬镳。
唐才常
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早年积极参加湖南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海外，在日本结识康有为，自请受业为弟子。后在康的领导、支持下，发动自立军起义，兵败被杀。
徐悲鸿
21岁得康有为赏识，成为拜门弟子。受康有为“国画变法思想”影响，著《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决心以西方的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
刘海粟
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26岁时得康有为赏识，收其做关门弟子，教授书法、文史知识以及西方文化。受康有为推崇西画的影响，成为西画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萧　娴
中国现代著名女书法家，康有为关门女弟子。21岁时师从康有为，得其亲传。与现在一般人从楷书开始不同，萧娴受康有为影响，学书从篆隶入手。

康有为人生轨迹图



注：1928年6月20日，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为北京。本书做图时统称北京。

①广州。1858 年 3 月 19 日，生于南海县。自幼遍投名师，通读先秦诸子典籍。少有霸气，志在创立新教。但不善八股文，乡试不第。后投到理学大师朱次琦门下，学习经学和史学。三年后，痛感经史之学不能救国，入深山老林白云洞，改读佛道之书，经常产生幻觉，自以为圣人，为天下苍生之苦而哭。

②广州←——→香港。1879 年，游学香港，看到街道繁华、建筑瑰丽，如至天堂，钦佩西人治国有法度。于是开始阅读西方著作。自港返家后，致力于以新眼光研究“公羊学”。

③广州←——→北京。1882 年，25 岁，参加顺天乡试，又不中。回程道经上海，繁盛入眼，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1885 年，第三次乡试又不中。1888 年，31 岁，第四次参加顺天乡试，仍不中。写下《上清帝第一书》，请求变法改革。未达天听，心灰意冷。康有为认为上书不成皆因国民愚昧，决意培养人才，回广州创办“万木草堂”。1890 年，收梁启超为徒，兴奋至极。1891 年 7 月，写成今文经学著名著作《新学伪经考》。1893 年，终于考中举人。第二年，甲午战争爆发，康有为忧心如焚。1895 年，赴京会试，时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在即，联合应试举人，“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成为维新领袖。第二年，强学会被慈禧封杀，返广州写成《孔子改制考》，是为变法纲领。1897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历经 103 天，颁布新法 110 多条。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康梁”逃往日本。

④北京——→日本。在日本组织保皇会，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反对革命，不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往来。

⑤日本←——→列国。周游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印度、美国、墨西哥、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等 31 国，行程 60 万里。游说各国政府和华人推翻慈禧，扶持光绪。在新加坡槟榔屿遥控国内“自立军”起义；在香港组织保皇公司；在印度大吉岭写成《大同书》，构想乌托邦式新世界。1911 年返回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反对共和政体，提出“虚君共和”。

⑥日本——→上海。袁世凯称帝，组织武力讨袁运动。

⑦上海——→南京。途经杭州、曲阜，提倡孔教，致电黎元洪大总统定孔教为国教。

⑧南京——→北京。1917 年，拥护张勋复辟，导致众叛亲离。

⑨北京——→青岛。复辟失败后，游走各地，声援过“五四运动”，谴责过冯玉祥逼宫，但已为时局所弃，影响力不复往昔，1927 年于青岛抑郁而终。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

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

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胡适



在王国维（图左）的一生中，罗振玉（图右）起着重要作用，是王的精神导师和『命运引导者』。罗长王十一岁，欣赏王的才华，对王提携有加，从生活到学业进行资助，王几次重大思想转变，都有罗的影响。罗王二人后来结为儿女亲家，但也因此失和。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

四五月间，革命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在河南为奉军击败，河北、山东情势非常危急，时局可谓一夕数惊，北京各界大为恐慌。

此时，清华大学校园内尚属安静，国学研究院刚刚评定完学生成绩。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王国维参加了师生叙别会。

宴会上，王国维为门生谢国桢及其朋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题诗一首，后又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午后，宴会结束，王国维拜访陈寅恪，两人同属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列。

当晚，学生刘节与谢国桢去了王国维家里——清华西院18号，问疑阴阳五行的起源，并讨论日本人研究天干地支的得失问题。其后，说起眼下的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说起冯玉祥即将入京，张作霖想率兵总退却，以保卫山海关以东地区的时候，王国维说："北京日内有大变。"

王国维的意志消沉可能和当时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刊登的《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有关，这篇文章上面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虽说是"戏拟"，难免使人惴惴不安。自1927年初至5月底，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北伐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清华园内的教授们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道："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

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6月2日，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侯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王国维拿了钱出公事房，在院里吩咐听差雇洋车，正好轮着三十五号车当值，他坐定后，即吩咐车夫往颐和园方向而去。

十点钟，到达颐和园，王国维买票入园，并给了车夫5角，让他在园外等候。王进得园内，四顾无人，径直走向石舫，在石舫前坐了良久，后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

原本在远处忙碌的园丁听到有落水声，急忙赶来，见先前入园之人已在水中，急忙下水打救。水很浅，但湖底的淤泥很深，只见王国维头入泥中，费力捞起后，口鼻之中全被污泥塞满，探摸鼻息，已经咽气，这时距园丁听到落水声不过几分钟而已。

下午三点钟，三十五号车夫仍在园外等候，看门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何一直呆在这里，车夫说在等进园的一个老人。看门人问了车夫所等老人的体貌特征后告诉他，这个人已经投湖自杀了，并带他进园内确认。

车夫看后急忙赶往清华大学报信，路上碰到骑自行车来寻找父亲的王贞明。

当天夜里，清华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教授、助教一行三十多人，开汽车急奔颐和园，察视遗体。

第二天一早发放讣告。下午一点多，同学们先赶到颐和园，由园丁带到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自打捞起来后就停放在了这里，上面盖了一方芦席，四个边角以四块砖镇着。园丁把芦席刚一揭开，大家就不由得失声痛哭，眼前的王先生已经断气20多个小时了，面目紫肿，四肢蜷曲，匍匐地上，惨不忍睹。众弟子想起先生前日风采，又瞻其眼前遗容，不由悲从中来，恸声不止。

不久家属和学校办事人员陆续赶到，只有验尸官迟迟没到。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阴云密布，雷声大作，但没有雨。下午四点多，法官带着验尸官姗姗而至，简单查问后，开始检验，同学们在旁边审视。王国维当天穿着一贯的马褂、长袍、汗巾和布鞋，从他衣袋中寻出了四块多钱和一封遗书，纸已湿透，字迹仍完好。信封上写着："送西院18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上写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月初二日"是阴历，即公历的6月1日。很明显，遗书是自尽前一天，即国学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召开的那一天写好的。

验尸完毕后，学校的杂工即将遗体移植到绷布架上，放到颐和园西北角门外以前内庭太监住的三间小屋里入殓。傍晚七点多的时候，才扶棺到清华校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

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及曾受蔡元培之托三邀王国维任教北大的马衡、燕大的容庚等。

喧嚣身后事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电文中所谓"代奏"，是请罗向驻驾天津的溥仪报告死讯。曾经的清帝溥仪15年前已经退位，13年前，被冯玉祥逼出故宫，12年前由日本便衣警察护送到天津日租界。罗振玉曾担任清廷学部参事，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一职，虽然时过境迁已久，但二人一直与溥仪保持君臣之义。

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墓地选在了田间高处的麦垄中，深约六七尺，宽三四尺、长约丈余，以西门汀筑成。棺木放在中间，上面放了一块石板，用泥土堆起来，葬礼完全是

按照北方的习俗办的。坟是由清华的泥水匠做的，上面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上了树。

罗振玉又在天津设“忠悫公”灵位公祭，随后赴京，参与处理后事，并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内，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后，中国战祸连绵，国将不国，人人自危，一代大师魂魄飘零，伶仃于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正当盛年的天才学者如此决绝地走向不归路呢？

遗书藏玄机

王国维曾谈过自杀：“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意思是一个人之所以要自杀，是当他的能力不能实现他的志向，必然绝望，而自己的意志力又不能控制这种情绪之后，才会采取的一种行为。因此，关于他的死因，亦即他因何绝望，猜测颇多。比如罗振玉逼债、丧子之痛、挚友失和、家事隐私、苦病厌世等。其实，这些理解都太过流俗。实际上在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16字意味深长，隐含着他自杀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应从王国维的人生价值观说起。

王国维生于光绪三年，此时大清王朝统治中原已有250多年之久，经过康乾盛世的巩固和融合，民众对于这个朝代的存在已视同当然。王国维偏居浙江海宁，父亲王乃誉也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

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16 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 16 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1893 年、1897 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当师爷去，他的父亲就曾经在浙江溧阳当过幕僚。

但是，社会正在起变化。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前后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

1898 年，戊戌变法，实施新政，废八股改试策论。

1905 年，清政府在几经调整之后，正式宣布废除科举考试。

这是一个列强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涌动的时代。

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的几大书院都没有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大多数的读书人仍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 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 5 万人以上。

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王国维在 21 岁时就放弃了科举进仕的念头，实在是形势使然。即使他想考下去，这个道路也会很快被切断的。

王国维顺着社会潮流学习新学，但也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有一种人生目标被颠覆和理想实现途径被阻断之感。就是在这种苦闷的情绪中，王国维接触到了悲观主义哲学。留学日本时他读到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著作，并沉迷了好几年，可是随着他对西学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认为西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竞争”和“贪”，中国人本以中庸为贵，但由于对西方的盲目学习而导致“纪纲扫地，争夺相扔，财政穷蹙，国几

不国”。可以看出,传统的“三纲六纪”执行得好坏,是王国维评判朝政的标准,他对于西学救国的主张是持批判态度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愤激尤深,觉得清末社会虽然糟糕,还有彭玉麟、沈葆桢等人敢于秉公执法,而民国政局则是上下同风,蝇营狗苟。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由“洋务运动”派生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西方思想由技术而政体而文化思潮,呈现出从“用”到“体”的一步步推进的脉络。而处在民国建立之初的王国维,由于对西方思想基础挖掘较深,并且对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强国的民风时局变化,可以说是一眼看到底,不要说以西学为“体”,即便是“用”,也是中优西劣。这对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渗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反拨。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3年,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

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不能继续呆在紫禁城内享受“他国君主”待遇,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中国的士大夫自古名节观念极重,王朝更替时,必有一批士人眷恋

旧朝，不肯革故鼎新，甚至以死相抗。传统价值观往往使这样的士人青史留名，为人称道。按陈寅恪的说法，生逢此“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只欠一死”，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而“欠”字则代表名节有污，必当赎回。

他认为这次就应该一死谢国，但由于自杀未遂，所以称“欠”。

王国维的“君辱臣死”观念早已有之。张勋复辟失败时，他就在一封信中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靦颜南归，真可谓不值一钱矣!”意思是说参与复辟的诸公如果活着回去，人品名节就一钱不值了。

以上可以说是王国维自杀的根本原因，而直接原因则隐含在“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八个字中。“世变”当然是指北伐军一路成功，眼看要攻入天津、北平，流寓天津张园的末帝岌岌可危，天将变色。那么“辱”字如何解释呢？这要看当时的两则消息：一是湖南叶德辉被先辱后杀；二是浙江政府收没章太炎的家产。叶德辉曾是清朝的御史，也属于清朝的遗老，王国维自有唇亡齿寒之感。章太炎本来是排满革命者，但是到了1927年，已经60岁(虚岁)，认为北伐军拔五色国旗改立青天白日旗，是背叛中华民国，因此决定退出政治泛舟江湖，作“民国遗老”。北伐军连这样的早期革命领袖也不放过，也难怪王国维会认为这次革命将比“逼宫”事件更为严重。在他猜测，北伐军一旦进京，他的命运将比叶、章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那时他离开溥仪去清华教书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但其间仍不时被溥仪诏去奏对，君臣之义仍在。在王国维投水前三天，满洲金梁曾到学校拜访他，当天王国维一反往日静默，情绪极为忧愤，告诉金梁说他想陈请溥仪离开天津，但是张园内的人不肯转达。眼看溥仪将不保，自己的一场大辱在所难免，自杀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从文哲到经史的痛苦历程

王国维在接触西洋哲学之前，走的完全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道路，只不过他在这条路上走得不成功。如果他像蔡元培一样顺利，由秀才而进士而翰林，那么王国维即使不选择仕途，其学术道路也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

1898 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 1899 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渐，王国维对于哲学有了厌倦之情。

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是为学术方向的第二次转变。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

1909 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经罗推荐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历任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在清朝的体制内谋到了一份职。这个阶段的他心态相对安定，开始转向戏曲研究，这可算作是第三次转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王国维的治学发生了第四次重大转变。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罗振玉比王国维大 11 岁，1899 年在东文学社看到王国维写的一首诗而惊为异才，从此对他提携有加，从生活到学业对他进行资助。在避难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工作都是罗振玉

介绍或提供的，到这时已经跟随罗振玉12年，王对罗一直敬为师长。罗振玉一直致力于振兴农业以强国，忙于办学、办报以及官场事务，蛰居日本期间，他对清室沦亡进行了反思，认为是西洋学说致使中国社会流弊滋多、天下大乱，国内学者疑古之风愈演愈烈，他担心不断质疑经书的反古逆流将断送中国三千年之教泽，所以，罗振玉决定研究经史，信古矫枉，而王国维应该是他最好的搭档。

这时的王国维怎么样呢？家国无望，漂泊异乡，前景渺茫。内心的苦闷是显然的。

罗振玉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慷慨陈词，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茫昧中醒了过来。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西洋哲学、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了一条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立刻觉得以前所学所做都没有意义，于是将自己带到日本的百余册《静安文集》全部付之一炬。

人生价值观的确立，使王国维游移不定的学术方向随之定型。为了道统，他毅然抛弃哲学、文学、戏曲，坚定地转向经史考证。

千年旧学之光

据1927年王国维的助手赵万里所编的《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国维一生著述有62种之多，涉及诗词、诗词评论、红学研究、戏曲研究和古史、古文字及训诂音韵、西北地理及辽金元史等。其博学令同代学人无不钦服。1934年，陈寅恪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作《序》中又总结了王国维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这

种方法是王氏的独创，对后学者是一大贡献。

1904 年，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命的本质就是欲望。《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授人以解脱之道，真正揭示了人生痛苦的真相。《红楼梦评论》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目前中国蔚为大观的红学研究风潮正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这本书正是王国维学习西方知识时完成的，明显可见他“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1908 年，《人间词话》发表在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人物的《国粹学报》上，开篇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还有：“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此第三境界也。”这个说法其实是指出了做学问的道路，意思是没有登高望远，无以确定有价值的探索目标；没有对寻求的迫切愿望和自信，难以面对征程的漫长和艰辛；没有千百度的求索，就不会有瞬间的顿悟！

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以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相结合写成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学批评力作。

在戏曲研究方面，王国维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最近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先生当为不祧祖矣。”《宋元戏曲史》以宋、元两朝为重点，论述中国戏曲形成过程，征引万代有关资料，说明其源流演变。书中介绍了古代巫者的装神和娱神；春秋战国时代倡优的戏谑和讽谏；汉代的角牴戏；唐代的歌舞戏、滑稽戏、参军戏等，其中王国维推举元曲为最自然的文学。《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专著。

1911年之后，王国维在日本的五年，研读经疏，旁治古文字声韵，考证殷墟文字。由于这些是他的信仰之寄托，所以在这个方面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的研究方法大都是从清代学者的书中得来的，罗振玉在所作《观堂集林》序中说：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很近似乾嘉时期最富有求实精神的程瑶田，他根据实物考定古代制度，并以此权衡古今学者是非。王国维也是以这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另外对王国维影响较大的晚清学者是他的同乡孙诒让，孙氏是清末浙江学者中声誉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个人，他治学范围广博，自言"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19世纪中叶，甲骨文出土后，孙氏首先写成《契文举例》；并进一步采用金文甲骨，向上推古人造字的根源，纠正许慎《说文解字》的错误，作《名原》两卷。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与孙氏非常相近，不过他不是停留在辨认字义上，而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经过分析，发现了卜辞上所记载的先公先王的名字，写成《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列出了殷代王朝的世系，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绝大部分是可靠的记载，把中国有据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不仅如此，他还根据甲骨金文，参考经传记载，来证明殷代祀典和传统之制与周朝不同，以此考证写成了古史名著《殷周制度论》，认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个论断给后来的史学家们以很大的启示。

王国维做学问既吸取了乾嘉时代学者实事求实的方法，又有贯通中西的开阔眼界，在古史研究上开创了"二重证据法"，即强调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互为表里，互相印证，不可偏废，才能得"古人之真"。这种不鄙薄古人、不轻视今人的客观态度也正是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学术品格的体现，正因如此，方有他学术上的巨大成果，郭沫若以他浪漫主义的语言特征称赞："他（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不跟王先生同桌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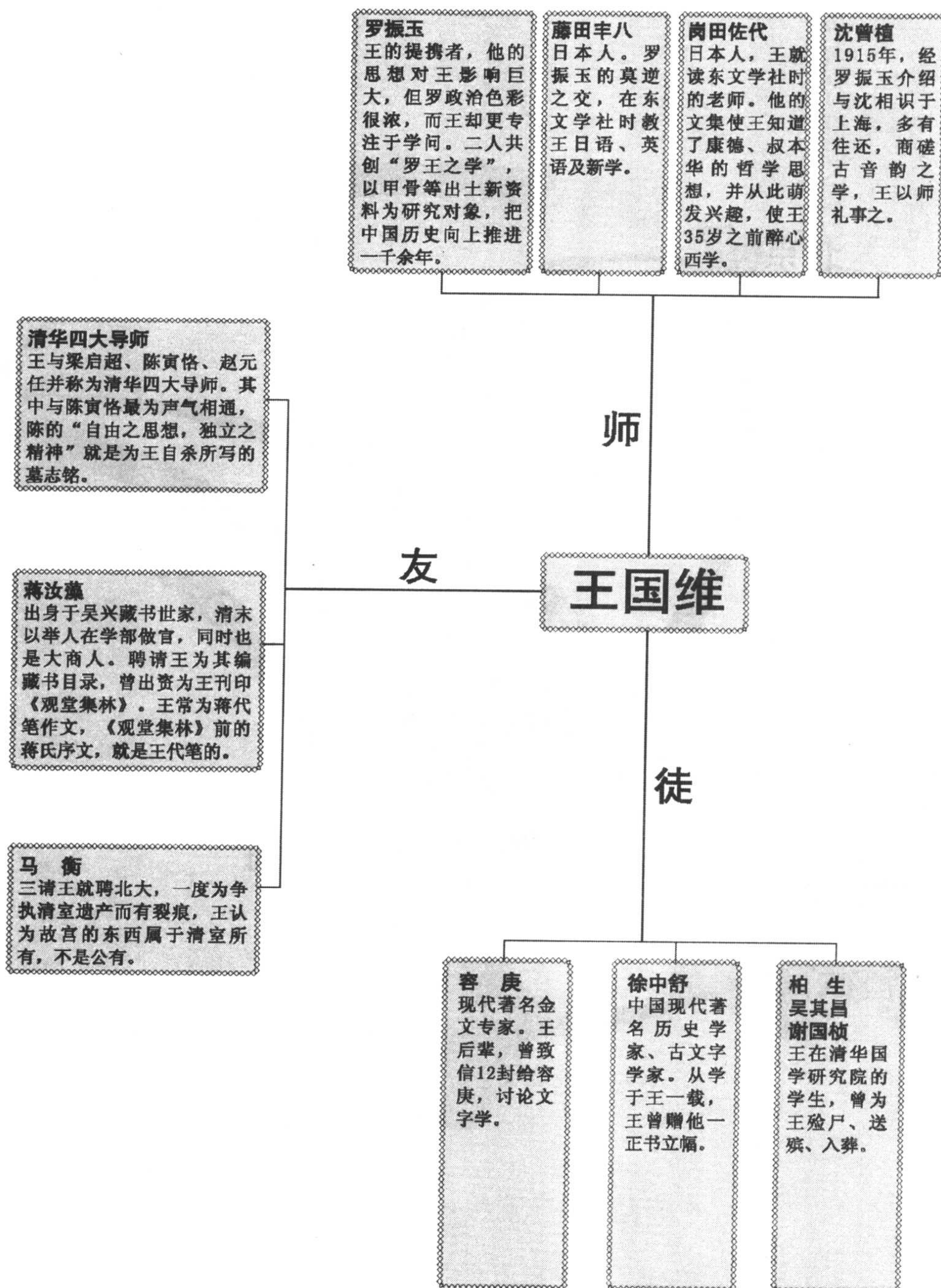
罗王失和始末

在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之前，罗王两家就定下了姻亲关系。罗振玉将他的第三个女儿许配给了王国维的长子潜明，由于两个孩子自小一起长大，虽是父母之命，倒也你情我愿。自此，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了。罗振玉与王国维二人性格截然不同，罗精力过人，从十六岁就开始管理家政，事无巨细一一经心，一直到中老年，是一位家长制的独裁者。而王则不同，性气和平，缄默不言，一心埋头读书治学，除了儿女婚姻大事，其余都不过问，他的继室潘夫人则是理家能手。潜明对于原本是表姐的潘夫人变成后母很不高兴，罗女在王家是长媳，婚后他们与潘氏常有矛盾，王国维对此却浑然不觉。

1926年，潜明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早逝，王国维夫妇从北京赴上海料理丧事，而罗振玉从天津先行赶到。丧事完了之后，罗女对潘夫人主办的丧礼有些微词，罗很生气王国维偏听妇言，担心女儿在婆家吃亏，当晚，未同王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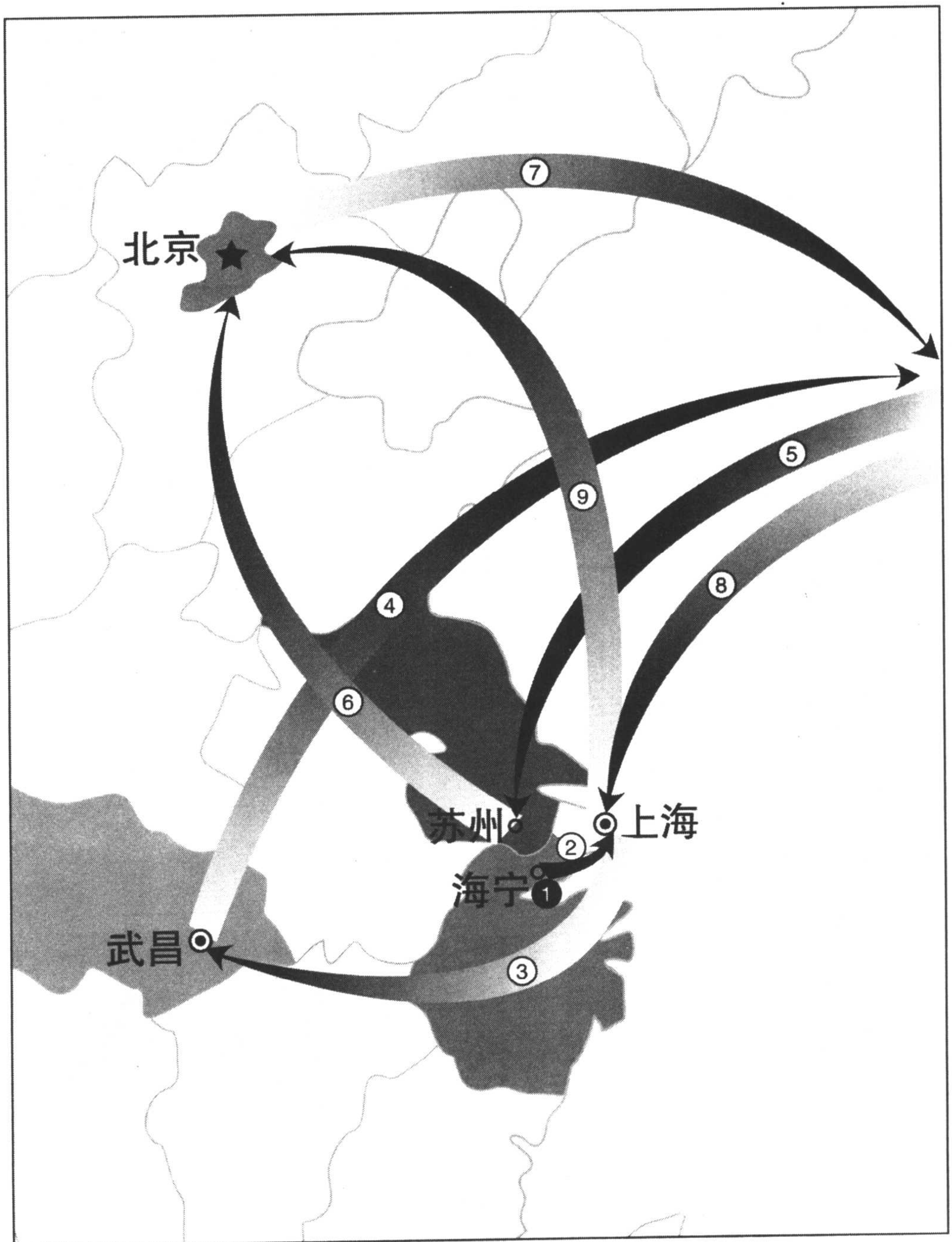
量就带着女儿回了天津。这件事情对王国维打击很大,他回到北京后愤愤说:"难道我连自己儿媳妇都养不起了吗?"在书房默坐半晌后,拿出罗振玉素日来信烧了许多。"罗王失和"由此而起。由于在上海时,罗振玉的女儿曾变卖了不少首饰给潜明治病,王国维回京后就筹钱要寄还罗家。正好,潜明所在的上海海关发了3000元的抚恤金,王国维就把钱寄到天津,可罗振玉却不让收,原封不动寄了回来,王国维又寄了回去,并附信说罗拒收无理,罗才不得不收下,这个钱罗后来用作刊印王国维的《观堂遗书》了。从此两人再未通信或谋面。

王国维关系图



罗振玉
王的提携者，他的思想对王影响巨大，但罗政治色彩很浓，而王却更专注于学问。二人共创“罗王之学”，以甲骨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
藤田丰八
日本人。罗振玉的莫逆之交，在东文学社时教王日语、英语及新学。
岗田佐代
日本人，王就读东文学社时的老师。他的文集使王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从此萌发兴趣，使王35岁之前醉心西学。
沈曾植
1915年，经罗振玉介绍与沈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王以师礼事之。
师
清华四大导师
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其中与陈寅恪最为声气相通，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为王自杀所写的墓志铭。
友
王国维
蒋汝藻
出身于吴兴藏书世家，清末以举人在学部做官，同时也是大商人。聘请王为其编藏书目录，曾出资为王刊印《观堂集林》。王常为蒋代笔作文，《观堂集林》前的蒋氏序文，就是王代笔的。
徒
马　衡
三请王就聘北大，一度为争执清室遗产而有裂痕，王认为故宫的东西属于清室所有，不是公有。
容　庚
现代著名金文专家。王后辈，曾致信12封给容庚，讨论文字学。
徐中舒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从学于王一载，王曾赠他一正书立幅。
柏　生
吴其昌
谢国桢
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曾为王殓尸、送殡、入葬。

王国维人生轨迹图



①浙江海宁。1877年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幼年丧母，身体多病。不喜八股，喜读《汉书》、吟诗，为“海宁四才子”之一。1892年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1893年、1897两次赴杭州应乡试不中，放弃科举。

②海宁——→上海。戊戌变法后，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时务报》关闭后，入东文学社半工半读。受日本老师影响，读叔本华、康德等人的书，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

③上海——→武昌。1900年，庚子事变，东文学社停办。旋即，随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罗振玉赴武昌，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

④武昌——→日本。1900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学习日语、英语。1902年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

⑤日本——→苏州。1902年夏，由罗振玉推荐，赴江苏南通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教。1904年，赴罗振玉创办的苏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康德、叔本华之书，深受影响。

⑥苏州——→北京。1907年4月到北京，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开始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其间三度回乡奔丧，第一次是1906年父亲病故，第二次是1907年妻子辞世，第三次是1908年母亲辞世。

⑦北京——→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以遗老自居。受罗振玉提点，转而专攻经史小学，研究甲骨文、金文、古史等，著述丰厚。

⑧日本——→上海。1916年2月，携长子回国，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1917年1月下旬，受罗振玉招至日本，2月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期间发表了多篇学术著作，三次拒绝北大文科教授的聘任。

⑨上海——→北京。1922年4月，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1924年11月，冯玉祥部逼宫，王国维随驾前后。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7年，北伐军起，自沉昆明湖。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李大钊

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清水安三博士（日本汉学家）

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

——吴宓



在国内，辜鸿铭的思想为主流思想家所轻；但在全世界，辜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人，常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文章，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来访。图为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前排左）与辜鸿铭（前排右）合影。

寂寂而终，两女为尼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1918年，《东方杂志》上刊登介绍辜鸿铭思想在西方反响的《中西文明之批判》一文，对辜鸿铭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有肯定之意。带有保守意味的《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策源地《新青年》杂志分庭抗礼，“五四”前期影响颇大。陈独秀率先发难，先对辜鸿铭进行定位——一个“君主论者”，然后就掀起了《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关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大争论，对保守论调狂轰滥炸，从此新文化运动气焰日上，狂飙突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讥嘲，辜鸿铭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反击显然势单力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他一阵“炮轰”之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这可看作辜鸿铭在中国风云一生的落幕时刻。

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留着清朝辫子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完全过时”的可笑人物，倍遭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但辜鸿铭自己却并不理会这些，1924年初的他已经67岁。他对大清朝的坚贞之心感动了废帝溥仪，终获召见，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

中国传统的君主。他觉得亲临了一个王朝的最后一道荣光，并深感荣耀。

据《辜鸿铭传》描述：在太监的带领下，他来到了紫禁城的养心殿，平日里的辩才、自负和倔犟烟消云散，进门即拜跪在地上，三跪九叩，口中说着："臣辜鸿铭向皇上请安。"

年方二十的溥仪微微颔首，道："起来吧。"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与辜鸿铭进餐时发现，年迈体衰的辜鸿铭在溥仪面前敬畏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然而，1924 年 10 月，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辜鸿铭的心中，帝国之灯终于熄灭。他深知自己已"不容于中国"，于是应日本大东学会邀请，到东京讲学。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抵御外辱，其功不在明治维新，而在中国传统的教化，并天真地幻想把日本所保存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来，从而使中国儒家传统文明得以恢复。带着这个梦想，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初时大受欢迎，很多地方来邀讲座。在日期间，还应辜振甫[①]的父亲辜显荣之邀赴台湾演讲，又在台湾政界和文化界掀起文化争论。他那时教过 7 岁的辜振甫 ABC，留给辜振甫印象最深刻的教诲是"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当时，台湾已经是日占区。但随着中日关系日渐恶化，辜的听众日渐稀少，他意识到，自己在日本也成为了多余的人。

3 年后，1927 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回到故国，当时送行的只有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一人。他回国后给萨寄过一次照片，上书："年来检点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失意与感慨溢于言表。

回到中国后，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 42 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 20 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

---

①辜鸿铭堂侄，1917 年 1 月～2005 年 1 月，曾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不久,好友梁敦彦去世。辜鸿铭开始沉浸在诗人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其时,辜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

1928年3月,辜鸿铭染了感冒,头昏目眩,咳嗽连连,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然后是高烧,头脑里是一片混乱,梦中一会儿是英国,一会儿又是槟榔屿故地,一会儿是张之洞府中……后来痰中出现血丝,中西医诊断均为肺炎。4月底,已经无法进食。30日,感觉大限来临,两个女儿床前饮泣,心中实在不放心两个还没出嫁的孩子。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1928年5月1日《晨报》载:

> 辜鸿铭昨日(30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在京寓逝世。辜氏所患系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辜号汤生,福建籍。1856年生于新加坡,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通哲学文学,尤长于英法德等国文字。曾英译四书,另有英文著述多种。归国后,入张之洞幕府,任两湖督署文案十七年。复充上海沪浦局总办五年,及南洋公学教务长。辛亥革命后居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多年。前年赴日,在日本帝国大学演讲。张作霖就大元帅,辜复由日回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诣。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今犹存。享年72岁。

据罗振玉(辜在张之洞幕府时的同事)记述:临死前几天,辜还口占遗奏,“尚殷殷以东西政教不同为言”,念念不忘他的东西文化差异论。遗疏报给溥仪后,废帝念其忠心,赏银治丧,并赐“含谟吐忠”四字匾额,赐谥唐公。

临死前,他将在清末所著奏疏、条陈与域外政制等文结集,由罗振玉润色并作序,题作《读易草堂文集》,是为他的两部中文著作之一。

安葬辜鸿铭的是他的两个女儿,她们给他的遗体穿上全套崭新的清朝官服,把他那条发白的辫子夹杂着红丝线,细细编好,才放入棺木。与同时

代其他文化名人相比，辜鸿铭这个来自西洋的中国人死得极为寂寥。

葬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落发为尼。

来自马来亚的“香蕉人”

现在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辜鸿铭有许多被时人目为怪异的言行，由于他不合中国礼道，留下了很多奇闻逸事，使得后人只关注他顽固的表面，流于诟病和嘲弄，却没有结合他的人生经历、文化活动及思想进行深入了解，以致将辜鸿铭当成了顽固小丑。这是不客观的。

辜鸿铭实际出生于马来亚，《晨报》记者对他出生地报道有误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他并不了解。他 10 岁时跟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 3 年，主要学习英语。在欧洲 11 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他 27 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 年正式归国后，才开始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在香港学习时期，因为中文经典太过艰涩，他还经常读西方的汉学著作来帮助理解。到张之洞幕府做了“洋文书”后，汉文基础仍是很差，根本谈不上理解儒家经典，曾遍请那些和他同事的翰林、进士教他汉文，由于不懂师道之礼，遭到拒绝，无奈只好自己买了本日本人写的《官话指南》，作为汉文读本，但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张之洞看不过去，指导他系统阅读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后来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

由于自小生活在西方，辜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现在对于那些生在海外，长着中国人面孔，但受中文教育不多、思维西式的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香蕉人”，黄皮其外，白瓤其内。可以说，辜就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香蕉人”。

辜鸿铭刚回国时不习惯中国礼俗，仍以西人的坦率习惯行事，我行我素，俾睨一切，对自己看不起的人，不管是谁，照骂不误。他的同事和上级都评价他“为人荒谬绝伦”。

他骂袁世凯"小人办外事"、"寡廉鲜耻无气义"。全国上下为慈禧祝万寿之时，他却口占顺口溜讥讽慈禧太后"天子万年，百姓遭殃"，连他一向服膺的张之洞他也敢批评"太功利"。

可见，从文化思想特征上来看，辜鸿铭不能算作中国人。但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放弃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前程，回到苦难的中国？为什么会比中国人更坚持中国传统文明呢？为什么在国际上"黄祸论"盛行之时反而在西方大力宣扬"中国文明优越论"？为什么在国内崇尚西学、废除帝制、提倡共和之时反其道大力鼓吹君主体制呢？

偶遇马建忠，变回中国人

辜鸿铭自称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老人"。他的苏格兰义父布朗先生是一个对西方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人，他对年幼的辜说："我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

辜鸿铭 14 岁开始接受布朗先生"私塾教育"，学习英语和德语，从小背诵了莎士比亚的 37 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记忆力非常惊人，到了 70 岁时还能完整背诵弥尔顿 1300 多行的《失乐园》。他对于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黑暗印象深刻，特别是歌德的作品，辜后来写文章时引用得非常多。歌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所倡导的"克己复礼"思想与儒家文化惺惺相惜。

21 岁时，辜鸿铭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时的导师，由于布朗先生和卡莱尔是旧交，所以刚到爱丁堡时，辜有几个月每晚都到卡莱尔家聆听他们论学。卡莱尔在当时的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英国后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浪漫主义先出现于德国，在英国最有势力，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风行欧美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主要特征一是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二是强

调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美国超验主义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是爱默生。卡莱尔和爱默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都对东方和中国文明表示出赞赏与推崇。

卡莱尔曾对辜鸿铭说过："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赏更为热烈，他曾认真学习"四书"的全部译本，并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楷模。作为浪漫主义的嫡传弟子，辜在日后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其浪漫主义老师言论的引用，这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1878 年，辜鸿铭在法国游学时，还结识了一批对"科学悲观失望"的颓废青年和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巴黎大学老教授，受他们影响很大。这个老教授是卡莱尔的老朋友，极其推崇中国的《周易》，但是花了半辈子时间也没读懂，所以他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就告诉他："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他劝辜鸿铭不要继续在欧洲滞留，应赶快回国学习中国文化，在列强侵略中国、政府救亡图存之时报效祖国。

1880 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 年前后，马建忠因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其下榻的海滨旅馆拜访。

马建忠即是《马氏文通》①的作者，是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为李鸿章办过洋务，当过郭嵩焘、曾纪泽的翻译。主张向学习西方，发展商业甚至主张设立议院。他的二哥马建勋，也曾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即著名爱国人士，震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40 年后，辜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以前知道和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是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建忠则劝我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特别是唐代陆贽的文集。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

---

①《马氏文通》一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是奠定中国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

回来已经三年多，我还不曾进入和不知道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喜欢使自己保留一个假洋鬼子样……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1885年，对祖国文化向往已久的辜鸿铭在香港恶补了几年汉学知识后，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聘，做了他的一个洋文案。至此，他开始真正接近中国。次年，辜鸿铭改英文名为 KuHung—ming，30 岁的辜鸿铭如愿以偿，娶了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淑姑为妻，他大为感叹：“到如今，方知小脚之妙……”不久，纳日本大阪姑娘吉田贞子为妾。可以想象，这两个女人让他对东方女性的美有了直接感性的认识。

帮张之洞策划湖北新政

一种信念的确立总是需要过程的。辜鸿铭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从向往到“道固在是，无待旁求”，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看他思想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有三个阶段。一、洋务运动后期，经过在张之洞幕府 12 年的学习，1897 年辜鸿铭作《上湖广总督张书》，表明对儒教归服并公开反对仿效西体西政等，但当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汉学家的批评和对来华传教士的谴责上；二、1909 年张之洞去世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内对于“洋务运动”中所奉行“中学为体”的质疑使辜鸿铭对于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信心产生过短暂的动摇；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于自身的反思和对东方文明的推重再度坚定了辜鸿铭服膺儒家道统的决心，这个时期，他信心满满地鼓吹儒家文化优越论，公开宣称只有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

张之洞是继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的晚清洋务派重臣。在督战中法战争时，起用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声名鹊起。他为政务实，讲求致用，对于儒学纲常具有坚强的信念，幕府里始终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文人学者。像

最早明确攻驳康有为“今文经学”和较系统抵斥西方基督教的朱一新，反对戊戌维新的顽固遗老梁鼎芬，号称旧学问第一、民初孔教会和复辟派的头面人物沈曾植以及罗振玉、梁敦彦等等。辜即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呆了20年，直到1905年经张之洞推荐就任黄浦江濬治局督办时才离开这个“圈子”。

辜鸿铭刚开始对于洋务运动并不反对。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藉资浏览，遇到外国有什么新发明或者新鲜事，都会解释给张之洞听，以帮助他决策，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文史学家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说：“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

他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曾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确是杰出之才。”

甲午战败，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以康有为为首的士子学人呼吁变法图存，认为只引进技术而不改变旧体制是不能救国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保护意识骤然强烈，开始“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断然拒绝，说：“虽上谕来，我亦不译。”

事后，他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文中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认为“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

1898年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随后，张之洞抛出《劝学篇》，提出“二元论”办法，即作为个体，中国人必须坚持并严格地按照儒家原则办事；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必须抛弃儒家原则，采取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但康、梁却直接提出中国必须由专制政体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辜鸿铭因此对康有为极端鄙视，认为他是亡国妖孽。

1898年月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辜鸿铭英译《论语》出版。从戊戌变法以后，他就没有停止过对康有为的攻讦，认为：“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

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扫地净尽。”1913年，康有为、陈焕章成立孔教会，在国内影响比较大，辜鸿铭的好朋友梁鼎芬、旧同事沈曾植都是主要会员。孔教会政治上反对共和、主张复辟，思想上鼓吹孔教为国教，与辜鸿铭的思想颇为近似，但他却拒不参加，还大骂“陈焕章应读作”陈混仗”，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没有资格拜孔子。并作顺口溜：“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可见他对康有为这个“乱国肇事者”的痛恨。

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列强对于中国的瓜分达到顶点，加上国内义和团起义，使得清王朝四面楚歌，辜鸿铭开始为慈禧太后辩护，他将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在《日本邮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英文系列政论，结集成《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出版，他认为当前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本质问题，在于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缘故，之所以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西方人大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所以不能了解胜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儒家道德文明。

1909年，辜鸿铭心目中的中国最后一位“论道儒臣”张之洞病逝，他非常伤心。早在两年前(1907年左右)，辜最后一次见到张时，张曾向他表示过对中国未来的绝望。辜在为纪念张而作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哀伤地写道：“现在战局还未明了，我们的头却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辜对于反对西方文明、固守传统文化斗争的前景非常忧虑：“我们艰苦奋斗了三十年，可现在我们的事业几乎失败了。我们中有些人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许多人投降了，所有的人被分散到四面八方。”“我现在孤独一人……不得不彷徨徘徊。”

“严复、林纾皆可杀”

但伤心之中也有安慰：1910年，清廷以其“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同榜中严复位列第一，他列第二。同年，辜的中文版《张文襄幕府纪闻》、英文版《中国的牛津运动》同时出版。他著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追念张之洞，向西方做一次悲壮的抗议；二是“我想帮助我们中国人去与现代欧

洲的进步与新知的观念战斗……总结教训，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怎样失败。"其实是再一次显示他的观点：批评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争取中国文明的地位。他常引用孔子的"有教无类"（他将其翻译为"文明不分种族，一律平等"）要求西方尊重中华民族，他的书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之后，辜鸿铭认为在外务部郎中的职位上毫无作为，遂辞职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监督。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他给租界内的《字林西报》写信指责列强袖手旁观、纵容革命，这封信发表后，他所教的学生群情激愤，不能容忍老师的反革命的思想。辜鸿铭来学校时，学生们把他包围起来，对他进行质问。辜鸿铭却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们鼓掌而散，辜鸿铭也真的离开了南洋公学。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前史未有的战祸使东方人对西方文明的幻想有所惊醒，恰恰符合辜鸿铭一直以来对西方文明局限的批判和预言，西方舆论界也纷纷展开自我反思，这种情况坚定了他反对西方文明、固守中国儒家文明的信心，1915 年出版《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1917 年出版德文论文集《呐喊》，正式阐明以中国文明拯救西方的思想。比之大战前，他关注的重心有了转移，从要求西方不要破坏中国传统到主张西方必须输入中国传统文明以自救。

随着战争的激化，西方人逐渐形成了对自身文明的失望和对东方和平思想的羡慕。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记述说："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由于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对辜思想的追捧，他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也由一个骨气铮铮的民族文化捍卫者变成

了思想深奥的哲学家，英国作家毛姆就曾不畏周折地去拜访过他，对他“竭尽奉承之能事”。在西方，辜更是与印度泰戈尔齐名的东方圣哲，当时泰戈尔刚以其长诗《吉檀枷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战中以及战后，他在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等地演讲东西文化，他的思想观点与辜虽微有差异，但大体相同，都是谴责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批评西方个人主义、效率主义，鼓吹追求和谐、满足于精神生活的东方文化价值，要求西方向东方学习等。

与西方向东方学习的风气相对应，当时的中国也掀起了尊孔复古的潮流，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使这股潮流越来越猛烈。辜尽管大骂袁世凯，但国内的这种气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和激励，走红西方又让他非常自得，经常在北大课堂上摇着他的辫子鼓吹君主制，甚至在一次教员会议上，辜很认真地对大家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用讲了。”

陈独秀等人针对这种倾向，1915 年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大力宣扬“科学”、“民主”，抨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针锋相对地反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进步青年纷纷响应。1916 年，蔡元培留德回国后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为北大教授。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北大的“新派”。又续聘辜鸿铭、新聘黄侃、刘师培等思想守旧派为教授，形成北大的“旧派”。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展开了“新旧思潮”的战斗。

但是，旧派人物间并不团结，不能讲出激奋人心的新理论，他们的《国故》月刊根本不能与《新青年》、《新潮》对抗，日渐落败。这时的辜没有机会在国内全面阐发中西文明观和尊王论，只能在英国文学课堂上即兴发表一些零散的“春秋大义”、“纳妾合理”等引人笑谈的观点，并利用社交机会表明立场。一次，辜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便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疾言厉色道：“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

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他不介意别人叫他“辜疯子”，自说自话，在北大学子心中留下了迂腐可笑的印象。

1917年，辜鸿铭带着幻想跟随张勋的“辫子军”参加了复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形，变成了世人眼中不识时务的“顽固保守派”。

“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

如果把辜鸿铭称作国学大师，恐怕与他同时期的很多人都会反对。尽管他回国后“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揽”，而且有“文科进士”的封号，但是他的国学水平并不为当时的人认可，他的同僚钱恂认为他“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有点口吃的章太炎也说：“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那么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辜鸿铭回国后主要从事过的工作为外交、写作和教书。

他在办外交时，确实做过很多让中国人大长脸面的事情。1891年5月到9月时，在长江流域的安徽芜湖、江苏丹阳、湖北武穴、麻城等地先后发生了针对外国传教士的反抗行动，另外还广泛流传着士大夫乡绅制作的各种反洋教宣传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洋教舆论，是近代影响较大的教案之一。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负责办理此案，对反洋教运动进行了镇压。但是在办理过程中，他也意识到了传教士的无理与教民的可恶，只不过碍于《中法条约》中的条款，他也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作为张之洞的幕僚，辜对整个教案的情况非常了解，出于爱国的义愤，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用英文写下了《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直接对西方公众发表意见，表达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满。伦敦《泰晤士报》等媒体对这篇文章发表了很多评论，有一篇社论竟怀疑不是中国人所写，因为“如果是的话，语气不会有那么高贵和从容”。由于辜的声音存在，西方传教士的思想侵略面临着一个不可小觑的论敌。

还有一件值得圈点的事情是辜鸿铭在上海黄浦江濬治局任上时，局中有外国人借办工程之机，贪污白银 16 万两，辜鸿铭怒不可遏，要求严厉惩办。这个人很是害怕，趁着夜晚偷偷拿着巨款找辜鸿铭，哀求放他一马，辜却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坚决拒绝，并对此人不依不饶，穷究到底。

另外，《清史稿》还记下了这样一笔："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以一介书生、一篇文章而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达成和议，辜鸿铭的功劳不可磨灭。

辜鸿铭在今天能为我们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留下的著作，而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的则是《尊王篇》、《春秋大义》和《张文襄幕府纪闻》，另外还有他翻译为英文的《论语》、《中庸》。他翻译的这两部儒家经典突破了以往西方汉学家对孔子及儒家经义的曲解，利用他的英国文学根底，借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相对准确地完成了向西方输送中国文明的工作。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的影响，而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翻译的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即使是作为辜鸿铭论敌的李大钊也不得不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对辜有一段评论："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这个议论可以说相当中肯。事实上，辜鸿铭以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服务于他的"中国文明优越论"的。

被国人视为异族

从思想层面来看，辜鸿铭主要有两方面的成就：一是较早地对"文明"的内涵做阐说，他认为：文明的根本就是人的状态（男男女女）；二是敏锐地揭

示了中西差异:“西方文明崇尚物质力,东方文明崇尚道德力。”

辜鸿铭提出的观点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由于大多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而且他外表长期保守,往往被人视为逆时代潮流而动,其言其行也多不为正统人士所重视,以致于影响了国人对他的评价。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为了鼓吹西方文明,推动维新思想,也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是国内公认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开拓者。实际上,辜鸿铭比他早了四年多。关于中西差异的实质,陈独秀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也有过论述:西人好战,东方人喜欢和平;西人强调个人,东方强调家族;西方强调实力,东方强调感情。但是他的见解并未超出辜的水平。但是人们脑子中先存了前进有希望,往后看是倒退的进化论逻辑,就不惜因人废言了。

辜鸿铭所服膺的中国儒家文明具体来说应是指孔孟早期儒学,他认为宋代以后的儒学导致了儒学的狭隘化,对现在的中国未能尽得真正的责任。当然,他也并非完全排除西方文明中可资借鉴的内容,而只是希望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中国旧传统。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他不同于对西方几近无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旧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于一味醉心“欧化”,而对西方历史、社会了解并不深入的人,如胡适等;也不同于一度倾向西学,而后转向中国传统的人,如严复、王国维等人。

他作为一个对西方了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前进,在他自己构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里驰骋,在现实中却处处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获取国人同情,甚至被国人视为“疯子”、异族。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了 20 年,职务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屈抑在下的感觉时时让他感到不满。1901 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 18 年,但迄今为止还处在刚开始工作的官职上没有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屡屡说:“在中国,我是不为我的同胞所重视的。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因此都错误地轻视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重用我。”“他们认为我

不但保守，而且反动。”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与国内代表先进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导致辜鸿铭怀才不遇；西式特征的行为思想方式导致他与中国社会沟通存在障碍，使得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海归”人士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让人叹息。

轶事 辜鸿铭

辜疯子和徐颠子

据胡适《记辜鸿铭》所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y Ku”这两个绰号。

冯友兰眼中的辜鸿铭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

英文门的同学们说，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四骂袁世凯

辜鸿铭一直瞧不上袁世凯，在外务部时，就曾经应诏条陈，谴责袁世凯为"小人办外事"，此为"一骂"。

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辜鸿铭更是骂得厉害："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此为"二骂"。

唐绍仪爱慕辜鸿铭的才华，想为袁世凯网罗辜鸿铭，所以特设宴款待。鸿铭坚拒曰："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说完，扔了手中的酒杯，不告而辞。此为"三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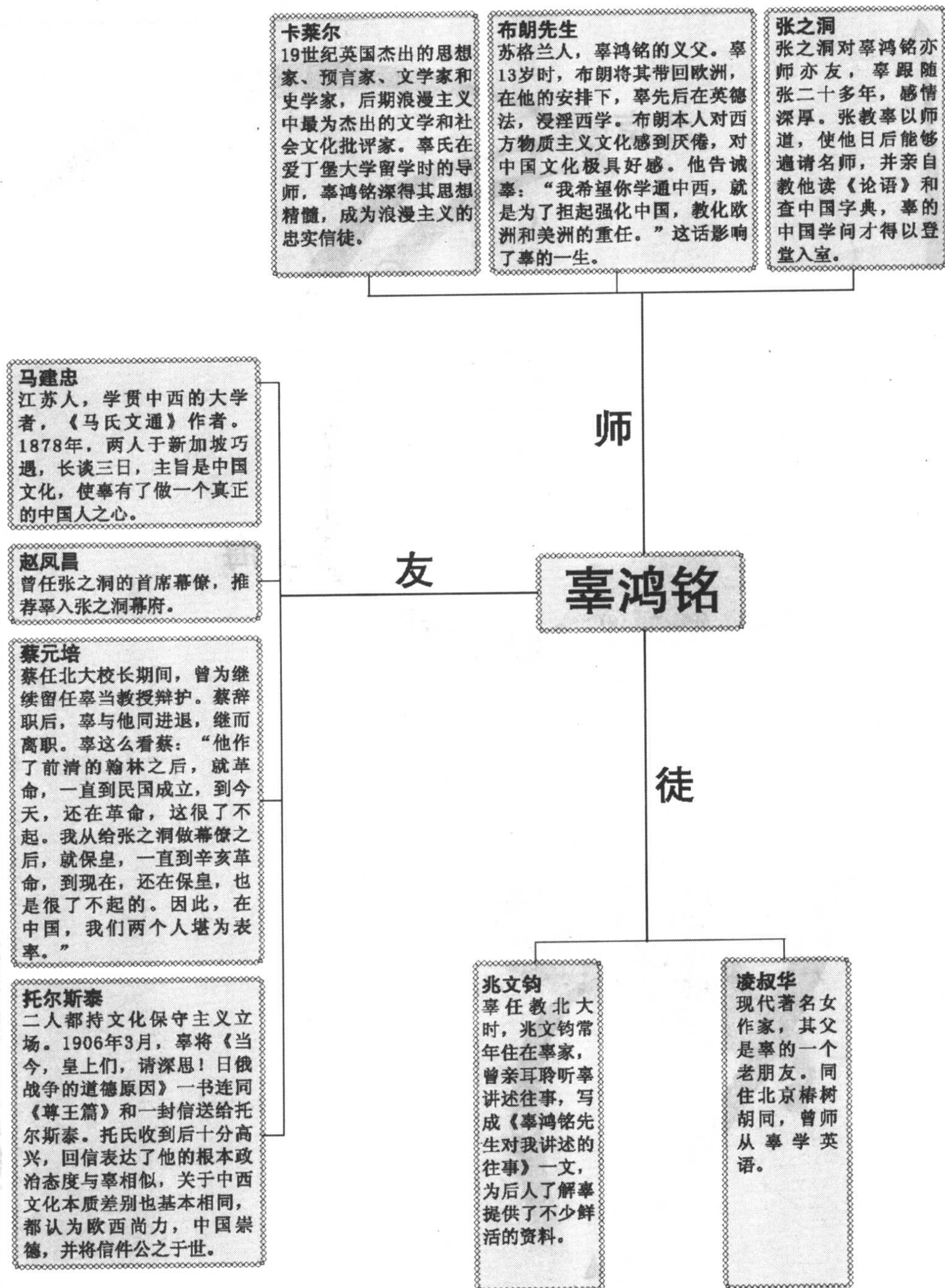
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后，一命呜呼，辜在袁世凯的三日志哀期中，公然违背当局不准娱乐的命令，大宴宾客，请戏班，狂欢三日。此可算作"四骂"。

辜鸿铭剪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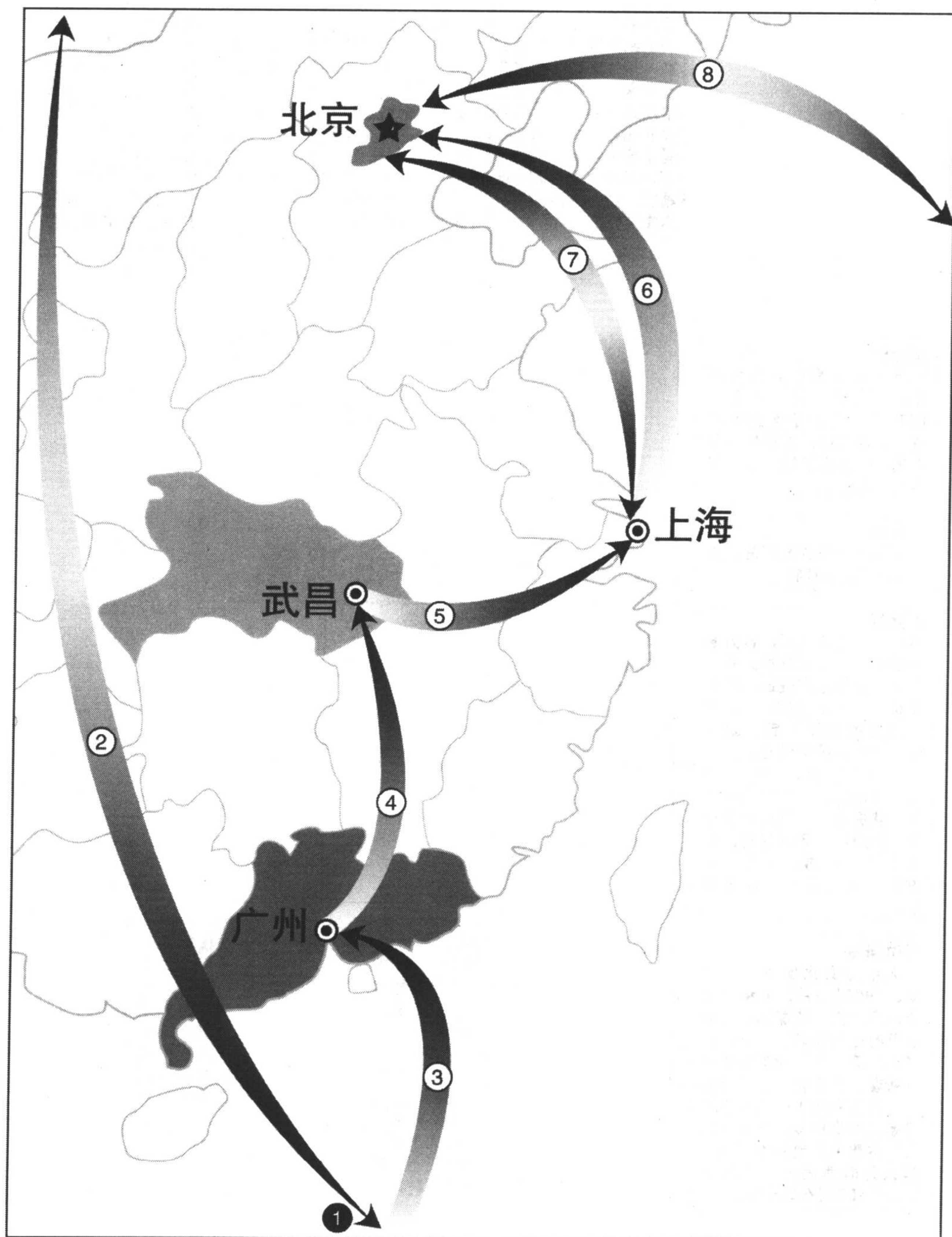
辜鸿铭的父亲送他出洋，把他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时，曾对他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布朗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酥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

辜到苏格兰后，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辜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有天晚上，辜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拿起他的辫子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辜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见女朋友笑了，辜就借了一把剪子，将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

辜鸿铭关系图


卡莱尔
19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预言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后期浪漫主义中最为杰出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批评家。辜氏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时的导师，辜鸿铭深得其思想精髓，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
布朗先生
苏格兰人，辜鸿铭的义父。辜13岁时，布朗将其带回欧洲，在他的安排下，辜先后在英德法，浸淫西学。布朗本人对西方物质主义文化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他告诫辜："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这话影响了辜的一生。
张之洞
张之洞对辜鸿铭亦师亦友，辜跟随张二十多年，感情深厚。张教辜以师道，使他日后能够遍请名师，并亲自教他读《论语》和查中国字典，辜的中国学问才得以登堂入室。
师
马建忠
江苏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马氏文通》作者。1878年，两人于新加坡巧遇，长谈三日，主旨是中国文化，使辜有了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之心。
赵凤昌
曾任张之洞的首席幕僚，推荐辜入张之洞幕府。
蔡元培
蔡任北大校长期间，曾为继续留任辜当教授辩护。蔡辞职后，辜与他同进退，继而离职。辜这么看蔡："他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我从给张之洞做幕僚之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国，我们两个人堪为表率。"
托尔斯泰
二人都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1906年3月，辜将《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一书连同《尊王篇》和一封信送给托尔斯泰。托氏收到后十分高兴，回信表达了他的根本政治态度与辜相似，关于中西文化本质差别也基本相同，都认为欧西尚力，中国崇德，并将信件公之于世。
友
辜鸿铭
徒
兆文钧
辜任教北大时，兆文钧常年住在辜家，曾亲耳聆听辜讲述往事，写成《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为后人了解辜提供了不少鲜活的资料。
凌叔华
现代著名女作家，其父是辜的一个老朋友。同住北京椿树胡同，曾师从辜学英语。

辜鸿铭人生轨迹图



①槟榔屿。1857年，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认苏格兰人布朗先生为义父。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②槟榔屿←——→欧洲。1867年随布朗先生前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开始接受系统而又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亲聆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教诲，终身受其影响。197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博士文凭；之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赴英殖民地新加坡任职，遇到著名语言学家马建忠，晤谈三日，开始向往中国文化，于是辞职回槟榔屿，补习汉文并留辫子，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

③槟榔屿——→广州。1885年应邀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

④广州——→武昌。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之赴湖北武昌，协助张之洞办洋务和外交，在湖北居14年。1896年上书张之洞，反对学习西方，表示彻底折向儒家传统的态度；1898年出版英译《论语》；义和团运动中，在《日本邮报》上发表英文系列政论《尊王篇》，替慈禧辩解；1901年撰《文明与混乱》，驳斥西方盛行的中国人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的"黄祸论"观点。

⑤武昌——→上海。1905年，被赐外务部郎中的实衔，出任上海黄浦江濬治局督办。1906年，英译《中庸》问世，申明旧式统治方法与秩序不会过时。与列夫·托尔斯泰书信往来唱和。

⑥上海——→北京。1907年，张之洞进京入阁拜相，辜鸿铭随行。1908年，经张之洞推荐入外务部。1909年，张之洞病逝，辜著书追念。1910年1月，以"游学专门一等"，获赏文科进士，名次仅低于严复。

⑦北京←——→上海。1910年，深感外交部无所作为而辞职，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督学。辛亥革命后，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撰文攻击，拒绝为其效劳。1915年，出版《春秋大义》，鼓吹东方文明救世说；同年受聘北大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重回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3年，从北大辞职；1924年初受到溥仪召见，与来华访问的泰戈尔会谈。

⑧北京←——→日本。1924年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多，宣扬中华文明。1927年回北京，拒绝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但未及上任，就于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病逝，溥仪赐谥号"唐公"。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梁启超晚年定居天津后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图为梁启超五十四岁时在天津饮冰室写作时留影。

1928年9月，梁启超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此时离他人生最后一站不足4个月。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痔疮发作时，他就侧坐着写；住院期间，仍托人寻找有关辛稼轩的材料；材料找到后，又不顾重病，提前出院继续写作。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这样一位少年暴得大名、堪称"舆论界骄子"、叱咤清末民初政坛二十载的显赫人物，如此忘情地投入呢？

梁启超之所以编写《辛稼轩年谱》，或许是因为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辛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在词学上又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南归之后，虽然终其身并未被南宋朝廷重用，但他本人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休戚和民族的命运，正如朱熹所说，辛稼轩"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梁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流亡海外十三年之后，梁启超回到故土，试图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无奈屡屡受挫。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而拒绝他的改革主张。

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最后一变。在梁启超五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五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改变一生的对话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这一年，他还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这三院与学海堂齐名。广州五大书院，梁同时就读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嗜书如命。不但泛读了大批儒家典籍，而且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汉学的基本训练。学海堂以小学和典章制度的研究为主，教学生学会辞章训诂，对典籍进行考证、辨伪、校勘、诠释等工作。在这里，梁启超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积累。

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假设梁启超当时真中了进士的话，那末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可能没梁启超什么事了。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充分地参与到了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后，又任强学会书记。后来，强学会因慈禧的干预被迫关闭，梁启超应黄遵宪、汪康年之邀，南下上海担任

《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的“暴得大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时务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七千份，创造了中国自有报刊以来的最高记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争相传诵。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氏最早阅读和接受了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在 1898 年创办的《清议报》上，梁启超经常撰文揭露清廷的黑暗、腐败与独裁，大力倡导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大谈“破坏主义”。

为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使得梁启超对清朝的顽固派充满了仇恨，对清政府也失去了最初的信任。此外，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开始脱离康有为的影响，独立研究“西学”。为此，他还专门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日文，阅读了大量日文版西学著作。在此过程中，梁启超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卢梭的理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我们知道，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

精神之父，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倾向于革命。

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为实现这一计划，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答应悔改，谨遵师命。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那儿有很深的华侨关系，梁启超便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这层关系，梁启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自此之后，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但在内心深处，梁启超并未抑制住对革命的信仰。这一点可见于他1905年所发表的言论：“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无疑是一种救国的手段。

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地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 11 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 4 年。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 20 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当然，从“政治”转向“启蒙”并非根本立场、观点的变化，而是一种深化。在维新时期他就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因此把学校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国民性”的重要。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批评说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集体性缺欠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1898 年至 1902 年，鲁迅到南京求学，后又到日本留学，这段时间恰好是梁启超最激进地倡言革命，发表“新民”理论、“小说界革命”理论的时候，正是梁启超“言满天下”、“名满天下”的时候，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鲁迅蒙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他是梁启超编的《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梁启超倡导的“新民”理论、“小说界革命”理论，在鲁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916 年，陈独秀回忆和评论道：“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皆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

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即受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学会发起时还请梁启超为赞助员。

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1911年，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正是受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醉心开明专制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梁不仅反对共和、革命，甚至宣称：君主立宪虽然

是维新派的政纲，但现在还不宜实行。为什么？第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胜任议会政治，以正常手段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第二，施政机关未整备，无论法制及其相应机构，都离实行立宪政治有相当差距。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当时的中国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是最佳的政治选择，这便是1905年梁启超所撰写的《开明专制论》的主要观点。这种政体和理论，是封建国家实行由上而下的渐进性改革的一个中介、一个阶段。梁启超的开明专制，重点是保障民权，锻炼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自治能力和法治意识。开明专制可以循此进步为立宪政治。

尽管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长期以来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明专制也并非不是一种选择。实际上，梁启超当年的预言，很大程度上被辛亥革命后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所验证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回到国内，重新活跃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先后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于这两人，但这两人都是开明不足、专制有余，梁的政治实践注定失败。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回归国学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

1919年，梁启超在访问欧洲一年后，写下《欧游新影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十分萧条，梁启超认为这是科学破产所致，于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向往西方的文明与科学产生了怀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宾格勒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认为文明像生命一般诞生、茁壮、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无穷的空间”，中国文明的象征“道”，西方必须要向东方学习。

对欧美政治学说及其理想王国的质疑和幻灭，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以至绝望，加深了梁启超到学术中去求解脱求出路的决心。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以西方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西结合，“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1923 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几百本要籍的精华所在、攻读要点与具体方法。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清代学术概论》论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它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它把中国近 300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

1924 年，梁启超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与《清代学术概论》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两书的研究对象一致，但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

国近300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该书与后来钱穆所撰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先秦政治思想史》分析了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编列，并提出其个人精辟的见解。此书有助于读者对上述四家的了解，兼可领悟研究哲学和史学的方法与态度。在这本书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学术见解，例如首次提出"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梁启超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两部著作，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标志着新史学的成熟：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新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国民；旧史学的研究范围囿于政治史，新史学则要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两书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誉为治国史者的指南针。

围绕着新史学的创立，梁启超对地理学、经学、诸子学、考据学、小学、音韵学、目录校勘学、谱牒学、金石学、考古学，都在整理旧有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成为了整理国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国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打通了建设新国学的道路。

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梁启超死时只有57岁，正值壮年，倘使能够假以天年，正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他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难道真是天妒英才吗？

导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

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由于始终无法找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此时他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而且对协和充满了信心。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协和真好，可惜在德国医院耽搁日子，不然只怕现在已经全好了……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7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袁守和、李仲揆的信中提到病情"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中药矣"。为他开药的是著名的中医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吴佩孚幕中做过秘书处处长，此时归隐香港，此番听说梁启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并为治疗。

9月初清华开学后，梁启超便搬入清华园住。自从服了唐天如开的中药后，病况很有进步，极为高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你二叔叔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明前龙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这一月，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梁于是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清华学生来吊者皆痛哭失声，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馀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2月23日，范静生因大便失血过多辞世。范静生是梁启超的爱徒，师徒这一年来在医院里常碰面，彼此都谆劝保养，但静生凡事看不开，加以体瘁事忙，没有养好，这使梁启超受到重大刺激，因而小便不通29小时。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但是此间和此后，发生了两次比较严重的小便阻塞：第一次是在6月27日，阻塞约50余小时；第二次是在8月23日梁思成与林徽音新婚夫妇自海外归来时，悲喜交加，又堵塞了20多个小时。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由于在协和足足灌了十天的泻油，食欲全无，回天津后想吃些异味，炒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至连日发烧。于是请来日本医生田川氏诊治，未见有效，发烧不退，体力也日渐衰弱。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发现胃部摄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无痨菌而"末乃厉"(monelli)菌极多。于是又从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相同，将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动物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是人体

所常有的，不足以致病，而且杀此菌的药极简单，用碘质便可。但医生以体质过弱，不便用药为由，勉强试着用药。

12 月 7 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 30 小时。17 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 日，注血 200 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 1929 年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都是西医惹的祸

自称可以活到八十岁的梁启超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他的死有生活习惯不良、常年糟蹋身体的过错，有多种病痛的折磨，有亲人故友辞世的刺激，也有不甘心过"过老太爷生活"、不遵医嘱好好修养的缘故。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西医的"盲目"信任。

事情还得追溯到 1926 年的 3 月，当时协和医生检查后确定病原在右肾，于是动手术将右肾割除，但是割完之后尿血并未停止。术后不久，著名文人陈西滢抛出惊人之语，在《现代评论》(5 月 9 日)上撰文质疑协和医生：

>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①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①原文为左肾，应属笔误。

陈西滢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他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附和陈西滢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报副刊》(5 月 29 日)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能谓之为束手。”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

>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却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在 1926 年 9 月 14 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写道：

>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化，现在连德才证

明他们的谎话了。

足见在导致梁启超死亡的诸多病因中,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为西医所误。至于梁启超是如何为西医所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从知晓,直到1994年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关于68年前协和医生那次致命失误的解释:

四十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好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九个月,也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HowardL. Boorman)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认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三十三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轶事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张梁对无缝如天衣

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广东才子梁启超年方弱冠。一日，梁在家乡广东及第举人后，上京会试路过汉口，张久闻其名，为考其实学，在宴请时出一联嘱梁相对：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咄咄逼人，口气好大，暗喻张乃江夏（汉口）第一高官（四水即长江、淮河、黄河与汉水，以长江第一）。而且有四、一、二等数字，颇难应对。才华出众的梁启超，不亢不卑，从容应对：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梁自称儒人，以三教（指儒、道、墨）、三才（指天、地、人）对四水四季，以在前、在后对第一、第二，堪称天衣无缝的绝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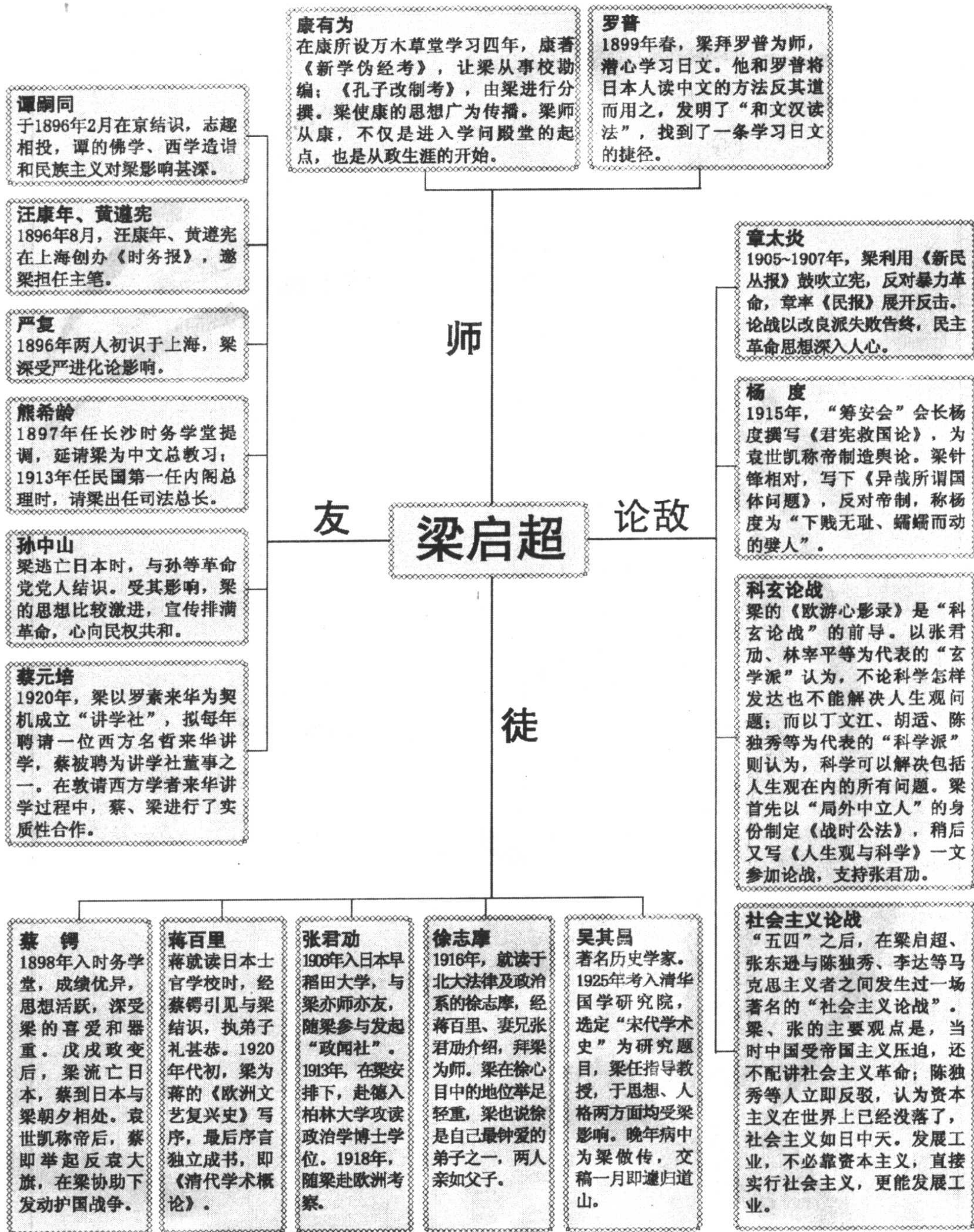
梁启超证婚苦训徐志摩

徐志摩与陆小曼，经过一段曲折浪漫的相恋之后，于1926年订婚。而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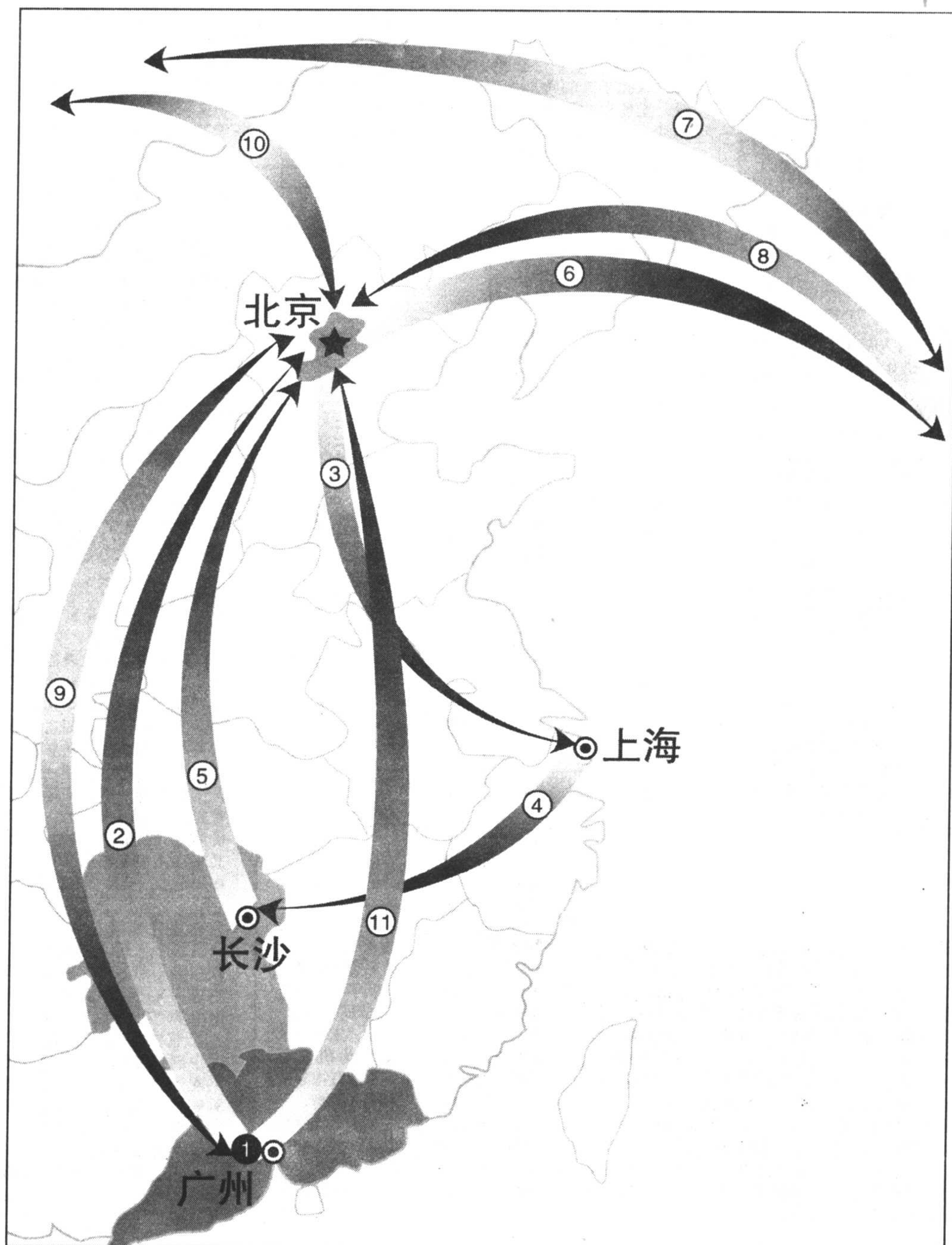
出徐志摩的先生梁启超作证婚人，则是徐家同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梁本欲拒绝，因为他不主张徐陆结合。后来经不起胡适等人的一再劝说，方同意证婚。

婚礼如期举行，轮到证婚人致辞时，梁缓缓起身，表情肃然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梁接着说："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做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这段证婚辞令徐志摩面红耳赤，陆小曼脸色发白，冷汗涔涔。徐志摩强忍愧怍，上前对梁说："先生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一点弟子的面子吧。"

梁启超关系图


梁启超
师
康有为
在康所设万木草堂学习四年，康著《新学伪经考》，让梁从事校勘编；《孔子改制考》，由梁进行分撰。梁使康的思想广为传播。梁师从康，不仅是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也是从政生涯的开始。
罗普
1899年春，梁拜罗普为师，潜心学习日文。他和罗普将日本人读中文的方法反其道而用之，发明了“和文汉读法”，找到了一条学习日文的捷径。
友
谭嗣同
于1896年2月在京结识，志趣相投，谭的佛学、西学造诣和民族主义对梁影响甚深。
汪康年、黄遵宪
1896年8月，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梁担任主笔。
严复
1896年两人初识于上海，梁深受严进化论影响。
熊希龄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提调，延请梁为中文总教习；1913年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时，请梁出任司法总长。
孙中山
梁逃亡日本时，与孙等革命党党人结识。受其影响，梁的思想比较激进，宣传排满革命，心向民权共和。
蔡元培
1920年，梁以罗素来华为契机成立“讲学社”，拟每年聘请一位西方名哲来华讲学，蔡被聘为讲学社董事之一。在教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过程中，蔡、梁进行了实质性合作。
论敌
章太炎
1905~1907年，梁利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率《民报》展开反击。论战以改良派失败告终，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杨　度
1915年，“筹安会”会长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梁针锋相对，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科玄论战
梁的《欧游心影录》是“科玄论战”的前导。以张君劢、林宰平等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不论科学怎样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以丁文江、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所有问题。梁首先以“局外中立人”的身份制定《战时公法》，稍后又写《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参加论战，支持张君劢。
社会主义论战
“五四”之后，在梁启超、张东逊与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梁、张的主要观点是，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还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等人立即反驳，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没落了，社会主义如日中天。发展工业，不必靠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更能发展工业。
徒
蔡　锷
1898年入时务学堂，成绩优异，思想活跃，深受梁的喜爱和器重。戊戌政变后，梁流亡日本，蔡到日本与梁朝夕相处。袁世凯称帝后，蔡即举起反袁大旗，在梁协助下发动护国战争。
蒋百里
蒋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时，经蔡锷引见与梁结识，执弟子礼甚恭。1920年代初，梁为蒋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最后序言独立成书，即《清代学术概论》。
张君劢
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梁亦师亦友，随梁参与发起“政闻社”。1913年，在梁安排下，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8年，随梁赴欧洲考察。
徐志摩
1916年，就读于北大法律及政治系的徐志摩，经蒋百里、妻兄张君劢介绍，拜梁为师。梁在徐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梁也说徐是自己最钟爱的弟子之一，两人亲如父子。
吴其昌
著名历史学家。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选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梁任指导教授，于思想、人格两方面均受梁影响。晚年病中为梁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

梁启超人生轨迹图



①广东。1873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茶坑村。自幼天资聪颖，机智过人，被誉为“神童”，12岁就考中秀才。随后入华南最高学府学海堂读书，打下汉学基础。17岁又考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榜后，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追随左右。

②广东——→北京。1894年，与老师康有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协助发起公车上书，任强学会书记。

③北京——→上海。1896年，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声名暴起。

④上海——→长沙。1897年，因与《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关系不协，赴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

⑤长沙——→北京。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

⑥北京——→日本。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思想日趋排满、革命，与孙中山越走越近，终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创刊《清议报》，在东京创高等大同专科学校。

⑦日本←——→列国。1899年后辗转檀香山、美国、香港、印度、澳洲等地，办理保皇会事宜。

1902年回日本，创《新民丛报》，影响日隆。以改良派首领的身份，与革命派进行论战。1907年8月因笔战不利，《新民丛报》停刊，革命主张深入人心。

⑧日本——→北京。1912年11月回京，先后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提出多项改革建议，遭袁反对。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氏称帝。

⑨北京←——→广州。护国战争爆发后，辗转上海、广西、广东等地，与学生蔡锷一起组织武力反袁，迫使袁取消帝制，羞愤而死。

1917年1月，应总统黎元洪之邀，赴京调解府院之争。同年7月参加段祺瑞“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与康彻底分道扬镳。随后短暂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一职。

⑩北京←——→欧洲。1918年底，一战结束，赴欧洲考察一年，一为考察学问，二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利益。闻日本将接手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致电国内，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促成“五四运动”。

1920年3月5日，结束考察回北京，全力从事国民实际基础之教育事业：组织共学社、讲学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国学院；著《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

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蔡元培

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

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梁启超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　迅



章太炎一生行为怪僻，续弦的标准之一是『女方必须是湖北人』，十年后得遇汤国梨。汤天生丽质、才华横溢，人称『皇后』，三十岁未嫁，直到遇见章太炎，虽不满其相貌，但为其学识所折服，与之结合。图为一九一三年五月底，章太炎与汤国梨婚礼场面。

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是最难以定位的一个。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但这一定位即便在他的学生们中间也存有分歧。比如鲁迅，他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而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无论是政治胜于学术，还是学问优于政治，笔者无意评说。但我们可以这两点为纵轴，以同时代学人为横轴，考察章太炎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历史与学术地位。

父亲的遗命与人生两大主题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 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佣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尔曹当知之。
>
> 精研经训，博通史书，学有成就，乃称名士。徒工词章，尚不足数，况书画之末乎？然果专心一艺，亦足自立，若脱意为之，以眩俗子，斯即谓斗方名士，慎勿堕入。

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对章太炎人生道路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外祖父朱有虔。外祖父是一个治学严谨、国学根基厚实的老学者。他教小外孙读书，非常讲究方法。课堂上循循善诱，一字一音，必求精审；课外又说古道今，激发其学习兴趣。

章太炎十一二岁时，外祖父给他讲了著名的“曾静案”，讲完还意味深长地说：“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真是不可不严啊！”

章太炎听了之后就问：“以前有人说过这话吗？”

外祖父告诉他，王阳明、顾炎武都说过，尤其是王阳明说得更透彻：“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

章太炎立即推论到：“那么，照这样说来，明亡于清，反倒不如亡于李闯了？”

外祖父沉默了片刻，低声说：“现在已不必再作这种论断了。如果李闯真的得了天下，他自己虽然不是好人，但他的子孙却未必都不好。”说完之后连连叹息。

听外祖父讲完之后，章太炎又找来《东华录》，仔细查寻了戴震、曾静、查嗣庭等案件的来龙去脉，触目惊心。不久，他又阅读了《明季稗史》，其中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详细记载了清军入关后对汉族老百姓的血腥屠杀。所有这些故事，让少年章太炎异常愤怒，“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他的排满革命思想开始发芽。

相比于这些听来或看来的故事，家族的遗风、父亲的教诲更具有感召。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太炎的父亲，尽管做过清朝的官，但不是吏部任命的。死了以后要按照祖宗传下的规矩，穿汉族服装入土。

父亲死后，22 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诂

经精舍是一所有着八九十年历史的古老书院，乾嘉学派的重镇。当时的主持人是一代名儒俞樾。俞樾30岁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是师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卓有建树的朴学大师。其主要著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分析特殊文法与修辞，多有独到之处，成为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著作。

在诂经精舍，章太炎学习了8年，受到了严格的汉学训练。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两部足以显现他学术功力的著作——《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氏读》。前者是平时读书心得的积累，内容主要是对先秦诸子文字音训的研究，和对《尚书》、《诗经》、《后汉书》、《国语》等经史典籍的解释。《春秋左氏读》字数50多万，书成后，章太炎很自负地在同学中宣称，如果刘逢禄看了这本书，只能是爬着逃走。刘逢禄（1776～1829年）是比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还长一辈的清代今文经学大师，认为《左传》是汉代刘歆的伪作。章太炎详尽地引证周、秦、西汉各种文献引用、袭用《左传》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并非刘歆虚构。

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还陆续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求教。谭献、高学治是浙江杭州人，孙诒让为浙江瑞安人，黄以周为浙江舟山人。可以说都是章太炎家乡的前辈国学大师。高学治对经学和宋明儒学深有研究；谭献擅长写诗填词；黄以周在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精深研究；孙诒让博学精深，对经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周礼正义》是我国古代研究《周礼》的集大成者；宋衡精研佛学。从这些名师处，章太炎的学问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

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

此时他 30 岁，经学研究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

章太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诂经精舍时期。当他第一次从老师俞樾那儿听到康有为"公车上书"和组织强学会的事时，就对康有为充满了钦佩。恰巧此时，强学会到处征召有志之士，章太炎被其富国强兵的宗旨所感动，毫不犹豫地寄出 16 元银洋，申请入会。1896 年，《时务报》创办后，章太炎更是一期不漏地阅读。

章太炎一到《时务报》馆，就受到时任主笔的梁启超等的热烈欢迎。章太炎也不负众望，很快写出《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以及《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章。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批评李鸿章联俄反日的做法，主张中国在自强的同时，应视日本为唇齿，共同抵御俄罗斯。章太炎之所以主张亲日，是出于他"黄种、白种，誓不两立"的种族观念，这是他少年所受"夷夏之防"思想的合理延伸。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则强调，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保护学会，选拔和任用人才，"以革政挽革命"。这与康梁等人"兴学会"、"开民智"的观点基本一致。

然而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至于一场群殴事件。

1897 年 4 月的一天，与往日一样，章太炎在报馆的忙乱嘈杂中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低头写稿。麦孟华等康门弟子又开始吹嘘康圣人如何目光炯炯、长相不凡等等，极尽肉麻之能事。章太炎忍无可忍，高声插了句："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章太炎此话一出，立即激怒了麦孟华，抢到章太炎桌前，出手就打。章太炎也是不甘示弱之人，双方不由分说便扭打在一起。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也喊叫着拥了上来，章太炎奋起还击，混乱中打了梁启超一个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离开报馆后不久，德国出兵强占了胶州湾，紧接着沙俄舰队驶入旅顺湾，其他各国也是虎视眈眈。面对如此危局，满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章太炎决定上书李鸿章，因为他是当时最有名望的汉族大官。章太炎建议：一、以割让威海卫给日本为代价，联合日本，钳制俄、德，遏止瓜分逆流；二、雇用日本人为客卿，在税务、制造局等方面取代英、法等国。可是，信寄出后杳无音讯。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联俄抗日之策，是甲午战败后的不得已之举。从章太炎的建议中可以初步体会到他论政的一大特色：立场鲜明、想法单纯。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从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短暂交往可见，章太炎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人，他在与政界人物交往的过程，总是先假设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或者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他人。但是，一旦他发现双方理想、思想不一致后，决不会委曲求全，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甚至不惜视为敌人。

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关系也是如此。

1898年的戊戌政变促进了章太炎的觉醒，他的排满思想日趋强烈，开始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充满怀疑。但此时，章太炎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一

个独立的体系，无法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托古改制”思想体系相抗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影响，这在他的《訄书》(1900年)初刻本中有清晰的体现。《訄书》初刻本以《尊荀》始以《独圣》终，虽然抬出荀子来与今文经学家的尊孔相抗衡，但并不反孔。为缓和维新与排满之间的矛盾，章太炎在《訄书》中还设计了“客帝”与“分镇”两个方案。在《客帝论》中，主张虚尊孔子为“共主”，满洲皇帝则退居为“客帝”，掌握实权，推行变法；《分镇》主张在中央权力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加强各地方自治自卫能力，与列强抗争。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表明，章太炎的主张完全行不通。他意识到，他所冀望的维新派、“客帝”光绪、汉臣督抚李鸿章等都无力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促使章太炎觉醒的第一件事，是戊戌政变后章太炎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的交往。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因参与维新变法，与其他维新党人一道被通缉，先是逃往台湾，与梁启超等冰释前嫌后又来到日本，住在《清议报》馆。此时的梁启超虽一度萌发革命思想，但很快又追随老师康有为回到了“保皇”、“立宪”的老路上。在与梁启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章太炎深感其思想已经僵化，落伍于时代。章太炎深信，没有武力，救国就是一句空话。

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华。东南各督抚，如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济南的袁世凯，拒绝接受朝廷的“乱命”，和列强实行“东南互保”[①]。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带着光绪等人匆忙逃往西安。清政府的无能，让章太炎觉悟到“客帝”纯属纸上谈兵，又因为李鸿章等督抚在《辛丑条约》

①清廷向列强宣战后，命令各省总督采取一致行动。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总督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不愿卷入北方地区的战乱，破坏东南地区相对稳定的政局。于是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东南互保”条约，规定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宪保护；各国兵轮水手可登岸，各国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若引起动乱，中国认赔偿等。同时商定，一旦清廷日后怪罪，各省互相担保。“东南互保”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地区免受八国联军的冲击，在动荡中保持了较稳定的政治局面。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外宣战，而它的地方政府居然采取所谓的“中立”态度，拒绝参加作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奇闻。

签订后，见清廷仍旧存续，无意与之决裂，使章太炎认识到“分镇”的荒诞。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

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

1901年，章太炎发表了公开批驳改良派政治主张的第一篇论文《正仇满论》，此文发表于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国民报》上，对梁启超所谓的反对清朝统治就是“仇满”的观点给予反驳，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流血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统治，中国才能发展为近代民族国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公开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文章，一经发表，举国哗然。

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重申了《正仇满论》的观点，是章太炎公开向康有为宣战的第一炮。该文与他为邹容《革命军》写的序一同发表于《苏报》显要位置，煽动仇满、鼓吹革命，不仅沉重打击了康有为等保皇党的气焰，也把革命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清廷统治者。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问世，其全新的内容和观点让人耳目一新，问世不久就因为脱销而再版。这本书代表了章太炎经学史学化的古文经学思想的确立。章太炎与康有为在政治主张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高潮时期也随之到来。在这本书中，章太炎通过《订孔》、《清儒》等篇解构了晚清今文家的“六经皆孔子而作”的观点，并且认为“六艺”非儒家所独擅长，将孔学与儒学、经学与儒学区分开，反对康有为认为的“以孔统儒，以儒统经，经儒合一”的主张；而且，他将孔子与左丘明联系起来，认为《春秋》是史书，应该通过《左传》去了解孔子的《春秋》，将孔子定义为“良史”，终于摆脱了康有为的影响，举起了经学史学化的大旗。

1906～1907年，章太炎被推为《民报》主编后，与梁启超所在的《新民丛报》大打笔仗，使《民报》名气陡增，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也远播海内外。比及《时务报》，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论文更加老辣稳重、条分缕析，笔锋横扫一切，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1913年，在读到康有为等倡导定孔教为国教的言论时，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议》。其后，康有为、张勋两位文、武圣人共同导演的一出复辟闹剧为孔教画上了终止符号，也才为章、康二人的论争画上了句号。

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

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1902年，章太炎第二次东渡日本，再次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已成气候，日本的大部分留学生开始投入革命党的怀抱。孙中山利用会党内部的结盟仪式，邀请兴中会同志100多人，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与章太炎正式定交。这一天，章太炎连喝了70多杯，竟然没有醉态。居日期间，两人经常接触与交流，在讨论中，章太炎接受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

3个月之后，章太炎回到了国内，先是对自己的理论和思想进行了一番清理，修订了《訄书》。紧接着就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中国教育会，共同创建爱国学社。教学之余，两人经常带领学生到张园演说，公开宣传革命；两人还一同在《苏报》上撰文，鼓吹排满。《驳康有为论革命论》、《〈革命军〉序》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在这里他还和邹容、章士钊结为了异姓兄弟。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其才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从此开始了3年的牢狱生涯，曾静、戴震等人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

"《苏报》案"发前，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等人闻听风声，相继逃往外地。但章太炎照常去报社上班，邹容劝他暂时躲避风头，他只是笑笑，说："小事扰扰。"当友人气喘吁吁跑进来告诉他，巡捕马上要来了，请赶紧离开。

章太炎一边摇头一边说："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恰在此时，几个凶狠的巡捕叫嚣着冲了进来，一个小头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票，高声念着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名字。不等小头领念完，章太炎忽地起身，向前逼近一步，指着自己鼻子，高声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风范直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去留之间，体现了章太炎的坚定与执著。章太炎与蔡元培出生仅相隔一年，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小时候都受了"曾静案"的影响开始排满。但蔡所受影响显然没有章太炎深，也不像章太炎受家族遗风所感染；蔡在科举路上一帆风顺，而章第一次参加科举就昏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参加。因此，蔡在仇满上不如章太炎坚决，两人的革命道路也因此大相径庭。蔡元培在从事了短暂的革命实践后就转向了"教育救国"；而章太炎自从立志革命后，就只身从戎，不顾生死。

1906 年 6 月 29 日，历经 3 年生不如死的牢狱之灾后，章太炎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革命党人和热血青年的追捧。在他被囚的几年中，光复会、同盟会相继成立，革命党人蔚然成风，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但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利用《新民丛报》对"三民主义"发难。章太炎出狱之前，就已经和革命党的报纸《民报》开始打笔仗。待章太炎一出马，凭着对梁启超的了解，以及丰富的笔战经验，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迫使《新民丛报》停刊。致使海外华侨纷纷脱离保皇会，投入革命队伍。

《民报》时期，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相当不错，常常一起商谈革命方略，处于政治上的蜜月期，但仅维持了一年多。1907 年底《民报》被禁，章太炎想将《民报》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这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在各地搞武装起义，无暇顾及，也很难拿出大笔经费，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孙中山又命汪精卫在东京秘密筹备《民报》复刊，并出版了一期。得知这一消息，章太炎怒不可遏，将内部争吵公诸于世，还提议要免去孙中山总理职务，并开除出会。

1911 年，武昌起义打响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身处日本的章太炎异常

兴奋。他立刻乘船回国，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提议由黎元洪和黄兴分别担任元帅和副元帅，由宋教仁任内阁总理，由汤受潜、蔡元培、张謇、伍廷芳分掌邮传、学部、财政、外交诸部。这是一个由各派力量联合组成的中央政府的设计。章太炎之所以有此主张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报纸上得知欧美国家政党争权的种种弊病，二是亲身经历同盟会内部的斗争。因此，他固执地认为，革命成功后，不应当再有政党存在。从中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章太炎论政的幼稚，但却不得不承认他的道理。

当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归国后立即对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进行了批判。而章太炎随后将光复会实际领袖陶成章的死归咎同盟会，双方成见日益加深，章拒绝担任总统府枢密顾问。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

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袁世凯的真实形象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这时候，章太炎又一次患了政治幼稚病。他认为，当时唯一能与袁世凯抗衡，取而代之的理想人物是黎元洪。于是积极游说黎竞选总统职位，并为其奔走呼号。当明哲保身的黎元洪要求章太炎北上打探袁世凯的态度时，章太炎欣然前往，旋即被袁世凯打发回上海，重新回到革命党人中。

1913年，为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内部意见不一，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当孙中山、黄兴先后逃往日本的时候，章太炎又一次选择了留下，而且亲入帝京，要跟

袁世凯当面问个明白。他的单纯与固执再一次显露无遗。这一去又是3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了北京，直到1916年袁世凯殒命。3年中，孤独、愤懑的章太炎，不惜大闹总统府，并以绝食相抗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却与段祺瑞为了政治利益斗得不亦乐乎。章太炎深切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惆怅和忧伤。这时候，孙中山又一次站了出来，发动"护法运动"，章太炎毅然加入斗争行列，奔走于广州、香港之间，劝说各路军阀参加"护法运动"。但此时的中国已经陷入到军阀混战的泥潭，面对派系林立的军阀，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章太炎开始为"联省自治"叫好，他希望能在中国建立联邦制。这是他早年"分镇"思想的死灰复燃，仍旧是纸上谈兵的理想，不久便在军阀间的枪炮声中偃旗息鼓了。

1922年，55岁的章太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梦想破灭之后，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讲学成为了他晚年抚慰心灵的主要方式。尽管期间他也不可避免地发表一些政论，如"反赤"、"反蒋"，但显然已不再是学问家章太炎的人生主题。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但也许是因为30岁前埋首书斋所造成的不谙世事；也许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使章太炎无法厘清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因而他的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化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的努力显得可笑而为人所诟病。

但这显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

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在革命上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从他在诂经精舍的两部"涂鸦之作"和后来的政论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学问根基的扎实程度。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 20 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 20 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 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章太炎有三个女儿，他为女儿起名：㸚㸚(lì)，叕叕(chuò)，㠭㠭(zhǎn)。三个女儿成人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来提亲。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章太炎知道后，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在席间“无意”说出自己给三个女儿起名的意义和读音：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写了文章，取了名字，却故意让人看不懂，以示其“曲高”。这虽然为章太炎赢得了上层知识分子的钦佩和门下众弟子的追慕，但同时也造成了才高知音稀的遗憾。

有了这些直观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章太炎的著作。章太炎的国学成就大致可分为小学①、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等方面。

小学是章太炎学术的立身之本。章太炎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作风，“究语言之源”、“综方言之要”。他所撰写的《文始》(1913 年)、《新方言》(1909 年)、《小学答问》(1908 年)、《国故论衡》上卷(1910 年)等著作，成为近代语

①小学在汉代被称文字学。隋唐以后，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

言学的奠基性著作。《文始》是一部汉字语源学的创始著作，用因声求义[①]的训诂方法，对许慎《说文解字》中 9000 多字的源头进行了理论的解释；《新方言》通过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以今音证古音，以穷其声转之原；《小学答问》共 122 条，每条从《说文解字》中的一个字开始，征引相关古籍，阐明其本字、借字如何演变；对于字音相关、字义相同或相反者，则努力揭示其内在联系；《国故论衡》上卷论小学，阐发音理，以音理诠解转注假借之义。

此外，章太炎还创造了 58 个注音符号，声母 36 个，韵母 22 个，上声下韵，相切成音，是中国第一套汉字注音方案。辛亥革命后，被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一致决议采用，沿用了 40 多年，直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

章太炎治经学，笃守古文经，强调"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这与今文经学派"通世致用"的目的正相反。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多次说明，我们需要重点强调的是章太炎的"经学史学化"的观点。章太炎继承了清朝章学诚"六经皆史"和龚自珍"六经为周氏宗子"的基本精神，认为"六经皆史之方"，"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因此，对章太炎来说，治经就是治史，治史就是治经。同时，他还将历史学从行褒贬、正名分的传统观念中分离出来，赋予历史学以"知古今进化之轨"的功能。

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国故论衡》中卷，这本书清楚地表明了章太炎所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想——并不是唯古是从，而是要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中，发掘、整理出适于现代民族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学与艺术。推翻了当时古文家狭隘的文学观念，为之后新文学浪潮的到来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源泉。如整理国故思潮中的"国故"，陈独秀文学革命提出的"三大主义"，胡适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文学改良八要"等，皆源于此。

章太炎的"诸子学"则主要反映在《国故论衡》下卷，该书集中了章太炎

---

①是一种通过对汉字声音线索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它主要是用来推求语源、解释联绵词和解决文字上的通假问题。

在东京讲学期间对诸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章太炎认为，诸子学说最具独立精神。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尤为不满，直斥为矫言伪行的“国愿”。这一观点，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批判儒家最为犀利的文字，直接开启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闸门。

为了进一步理解学问家章太炎，我们可以将章太炎与他的老师、同辈及后辈学人做一番对比。

章太炎继承了老师俞樾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但却不像老师一样只知埋头钻研学术。在他走向革命道路后，与老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于是写下《谢本师》，宣布与俞樾脱离师生关系。章太炎谢本师的举止，不仅表明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的追求，而且也揭示出他这一辈学人与上一辈的区别所在：并不是埋首书斋一心做学，满足于在学术上穷尽前人所不能。当民族面临危亡之际，救亡压倒了求学。为开辟一条新的救国之路，章太炎辈能够潜心钻研西学、佛学，将其与中国的旧学相结合。正因如此，章太炎辈的学问才能够超越前辈，产生更久远的影响。

在同时代的国学大师中，能够与章太炎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王国维。同样是学问成就斐然的国学大师，在思想立场上却有着泾渭分明的表现。王国维是一个远离革命漩涡，一意殉清的人，他认为大清朝“三纲六纪”的统治秩序是最好的，西方所谓的共和、立宪，都是不足取的。当北伐的大军即将彻底颠覆末帝的前夜，怀着忠义之心，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一生积极主张反满，提倡民族革命，并且不惜以死相抗争。这死，与王国维的自杀谢国不可同日而语。在对国学的信仰上，王国维似乎比章太炎要更加的坚定；但在对革命的理想上，章太炎的坚决又非王国维可比。

比章太炎晚一辈的学人，可选胡适与之对比。胡适曾称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胡适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著述史，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他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归入。而且，照胡适的论定，中国两千年来的学问之才，章太炎占尽三成。与之截然相反，章太炎

认为胡适没有学问，他说："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于。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征……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歷史。"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壤之别呢？主要是两人治学方法不同所造成的。胡适的治学之道，与章太炎完全不同。他受的是新式教育，走的是留学道路，所信奉的是西方的实验主义，没有国学家必须的经学出身和小学训练。

章太炎一生不仅勤奋著述，还积极讲学，传播国学，为其精深的学问找到一个传播的通道。其生平比较集中的讲学有三次，第一时期是1908年流亡日本，第二时期是1913年被袁世凯禁锢于北京期间，第三时期是晚年在上海、无锡、苏州三地讲学。每一次都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造就了不少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人才。

这其中，成就最为集中的是东京授业的一班弟子，后来皆成为中国新旧文化的翘楚。太炎先生评价这个班的弟子们说：

> 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即：钱玄同)、海盐朱希祖狄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狄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恨岁月短浅，他学未尽宣宜。

黄侃是最为章太炎喜爱的弟子，在音韵训诂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与章太炎并称"章黄学派"，其著述《音略》、《说文略说》、《声韵略说》、《文心雕龙札记》等被誉为传世之作。

钱玄同从章太炎治"小学"，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废除古文，自号"疑古玄同"，力主"文学革命"，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

朱希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是北京大学成立史学系后的首届系主任，在促进中国史学走向近代，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等方面，均

有贡献。

章门弟子的学术成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章太炎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这批弟子（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鲁迅）民国初年自日本返国，都被罗致北京大学，代替桐城文人并进而转变了北京大学文科乃至民初学术之风，在确立中国现代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成为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

大师亡矣

1936 年 6 月 7 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6 月 13 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 40 度。14 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章太炎夫人）、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 点 45 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 7 月 9 日发布国葬令，称：

>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

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

弟子们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痛失良师的哀伤之情。灵堂内悬挂着挽联：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下署马裕藻、徐寿裳、吴承仕、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等6人。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当时，北京已经成了抗战的前线，因此，参加追悼会的人，心中又有另一重哀伤。

和他那个时代的杰出革命党人一样，章太炎的一生都和日本相关：他们的革命大本营不得不建在这个邻邦，他们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最深刻的危机也是来自这个咄咄逼人的邻邦。章太炎死后坟墓的安危荣辱，也最终取决于这个邻邦的一个小小军佐。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逼近苏州，后方变成了前线。章太炎的灵柩无法下葬，只好暂停放于苏州锦帆路章氏寓所后园的防空洞内。立张大千画章太炎像于墓碑，像下有马相伯题词：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录陈子昂诗。太炎先生像赞，叹吾道之孤也。九十叟马良。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

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 20 年。

1955 年 4 月 3 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刘伯温因为抗元、匡复华夏而为后人所景仰。1936 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

张苍水明末起兵抗清，拥鲁王监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官至兵部尚书。抵抗异族斗争长达二十余年，宁死不为清朝子民。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轶事

“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

> 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

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

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烟癖

一次，太炎先生讲到兴奋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转身写黑板时，拿手中的纸烟在黑板上猛划，写完，也不看是否写上了，转过身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另一只手中的粉笔也就被误认为是香烟，只见太炎先生把粉笔伸到口中，猛吸几口。学员们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先生却全然不知，依旧神情自若地讲课。

讲学盛况

章太炎先生到北大讲学，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北大风雨操场座无虚席，来得晚的只好站在窗外"旁听"。太炎先生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吴检斋等五六人围绕着老师登上讲台，然后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侍立在老师旁边。满头白发的太炎先生穿着绸子长衫，个子不高而双目炯炯有神，向台下望了望，就开始用他的浙江余姚话演讲。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于是由刘半农翻译。又因为太炎先生讲话引经据典，钱玄同不时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书名，有拿不准的，担任翻译的刘半农会和写板书的钱玄同当场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师旁边的其他人询问，就是不去烦扰老师。商量定当之后，再翻译和写板书。

与胡适的是与非

在赵家铭先生的《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中，曾讲过这样一个

有趣的故事：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之一，担心国人不理解，胡适还专门在此书的《凡例》中对新式标点的具体使用办法作了详细说明。书刚一出版，胡适便特地送了章太炎一本，还恭恭敬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四个字的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

不料，章太炎接到书，翻开一看，见自己的名字旁多了一条黑线，竟生起气来，开口骂道："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再往下一看，又见"胡适"两个字的旁边，也有同样一条黑杠，气才稍微消了一点，自言自语道："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章黄"二疯子"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而且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章太炎关系图

章太炎

师

俞樾
1890年，章就读诂经精舍，深得俞樾喜欢和器重，被当成衣钵传人。但章以救国重于治学，民族危亡高于师生之义，于1897年离开。章后来作《谢本师》，断绝师生关系。

谭献
信奉今文经学，工诗、词、文、赋，以词见长，通古今治乱典故，是著名的词学大师、文学家、藏书家。章太炎文词颇受其影响。

黄以周
章太炎关于古代典章制度的学问多得于黄。

孙怡让
孙的《周礼正义》86卷，是研究《周礼》的集大成之作，另外他还精通墨子。章太炎曾跟他研习音韵、训诂之学。

宋衡
精研佛学，章太炎对于佛学的兴趣即由他引起。

友

孙中山、黄兴
1899年，章太炎流亡日本，于梁启超座上"始得见孙中山"。此后，与孙、黄热切讨论革命大计，共同与保皇派论战。后因政见不合而时有龃龉。及至袁世凯称帝，重修旧好。

异姓四兄弟
1903年，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邹容在上海结识，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称为"四帝"。

刘师培
1904年在上海经章士钊引见与章太炎一见如故，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作为经学大师，章、刘二人齐名，时有"二叔"的说法。

马叙伦
辛亥革命前，时常与章太炎讨论国事。1911年专程去日本拜访章太炎，经章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筹办《大共和报》，由章太炎任社长，他为总主笔。

蔡元培
《苏报》时期，二人交好。1904年再度合作，发起成立光复会。蔡不仅是章事业上的好友，也是生活中的好友。1913年，经蔡元培介绍，章太炎娶得汤国梨为妻。

论敌

康有为
章太炎与康有为之间展开的经学今古文之争的界限基本上不在于"革命"与"改良"之别，而是经学的史学化与儒学的宗教化，民族主义与孔教主义的分道扬镳。

吴稚晖
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些巴黎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刊物发表文章，主张废汉文而以万国新语代替之。章太炎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反驳吴的观点。

徒

黄侃
章的大弟子，有乃师之风，被称为"黄疯子"。最为章器重，在训诂学研究上最能继承先生的学术。

朱希祖
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地，回国后和胡适合作，推广白话文运动，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

钱玄同
曾从章习国学，初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字》研究，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

吴承仕
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受业于章门，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与黄侃有"北吴南黄"之称。

鲁迅
留学日本时听章讲授《说文解字》等课程，鲁迅杂文风格与章《民报》时期的论辩文文风一脉相承，颇有魏晋文章的笔调风格。受章启发，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研究感兴趣。

周作人
留学日本时师从章，曾写《谢本师》抗议章的"落伍"。

顾颉刚
在章太炎羁留北京期间前往听学，为章的学识所折服。

马裕藻
留学日本期间，师从章学习文字、音韵学。

章太炎人生轨迹图



①杭州。1868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自幼在外祖父的督导下，习文字音韵学。1883年，奉父命赴余杭应童子试，中途癫痫病发作，从此不问科举，一意治经。青年时读《东华录》及《明季稗史》，“排满思想始盛”。1890年，父亲去世，入杭州诂经精舍从俞樾、谭献等习古文经、文辞法度等。

②杭州——→上海。1897年，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鼓吹维新改良，成为有影响的政论家。但在学术上不屑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对康门弟子尊康为圣人极端反感，不久离开。转而将希望寄于李鸿章、张之洞等汉臣，被张之洞邀至门下，后因不同意“中体西用”而离开。

③上海——→台湾。1898年，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逃往台湾。排满思想逐渐强烈，编定《訄书》初刻本，正式提出“逐满”。

④台湾——→日本。1899年6月，应梁启超之邀赴日本，得见孙中山，对孙所言“革命必经流血”大为赞同。

⑤日本←——→上海。三个月以后，悄然返回上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章对清王朝彻底失望，剪发明志，成为江浙地区反清革命第一人。1901年写《谢本师》，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发表《正仇满论》，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公开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文章。

1902年，再度逃亡日本，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密切往还，共商革命大计。

⑥日本——→杭州。同年5月，从日本带大量西学书籍回杭州，着手修订《訄书》，确立了经学史学化的古文经学思想，为行将到来的革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⑦杭州——→上海。1903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期间大量阅读佛经。

⑧上海←——→日本。三年监禁期满，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总编辑，与保皇派论战。但与孙、黄间渐起龃龉，最终导致同盟会分裂。1908年春开始为留学生讲授国学，相继完成《新方言》、《小学问答》、《齐物论释》、《国故论衡》等文集的编撰。

1911年，武昌起义，上海光复，章太炎返回上海，倡导“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寄望袁世凯统一全国。

⑨上海←——→北京。4月，追随袁前往北京，逐渐认清袁的真面目。1913年返回上海，7月，“二次革命”失败，冒死进京，大闹总统府，被袁世凯软禁，期间修订《訄书》为《检论》，口授《菿汉微言》，讲授国学。1916年袁世凯死，方获自由，返回上海。积极参与护法战争，鼓吹联省自治，反对蒋介石北伐，攻击新三民主义，积极呼吁抗日。

⑩上海——→苏州。晚年渐入颓唐，1934年在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讲“国学”。1936年，因鼻衄病和胆囊炎病逝。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

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林语堂《悼鲁迅》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七七岁高龄的大文豪萧伯纳（左二）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之邀抵沪，仅呆了七八个小时。鲁迅（右一）作为民权保障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应邀前往。幽默的萧伯纳在见到鲁迅时，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则诙谐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半个国学大师

2006年6月，据说全球有130万的华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结果公布后，立刻引起了一番争论，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郭沫若和鲁迅的入选。关于鲁迅，反对者认为，鲁迅是文学家，而不是国学家，更谈不上是“国学大师”，因为他在国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论著。“挺鲁派”则针锋相对地举出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并且引述了另一位入选的国学大师对该书的评价：“（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反对者大约对《鲁迅全集》缺乏全面的了解，被“挺鲁派”一下打了个正着。“挺鲁派”进而举出鲁迅的另一部学术专著《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嵇康集》、《后汉书》、《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一大堆经鲁迅校勘整理过的古籍，增强己方的说服力。结果争论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而告终。不过这妥协、让步是看在“史”和“古”这两个字的面子上做出的，至于“小说”、“文学”、“校勘”、“整理”，反对者骨子里仍然是反对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国学”是以“经”、“史”才变得尊贵，小说之流，即便允许它踏一只脚到“国学门”的门槛里边来，终属末流。所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是极不情愿的。不过，鲁迅却因此在去世70年之后得了一个新称号——“半个国学大师”。

笔者在此无意加入这场热闹的辩论，不过由此却对国学根底深厚的鲁迅不研究“经”、“史”而转投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这两个“非正统”领域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国学修养的三个层面

鲁迅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是同治辛未科的翰林，做过江西金溪县令，后调任内阁中书。周家的大门上有一块“钦点翰林”的匾额，大长周家

在绍兴城中的身份地位。周福清大有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所以，从鲁迅5岁开始，就让本家兄弟周玉田教他读经。11岁时，又把鲁迅送到绍兴城内的三味书屋跟寿镜吾继续读经，这一读又是5年。鲁迅在读经时期基本读完了《十三经》，包括非常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这可以说是鲁迅国学基础的第一个层面。

有学者曾说，鲁迅有“三绝”，指的是鲁迅在创作、翻译和辑佚三方面的成就。其中的“辑佚”是指鲁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鲁迅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委实不少：校勘古籍主要集中在1909年至1927年之间，从《古小说钩沉》到《唐宋传奇集》达10多部；抄古碑研究拓本主要集中在1915年至1920年间，包括金石拓本、汉唐石刻造像和墓志拓本，搜集种类达数百种，可以装4个皮箱。这两样工作实际上是版本学的范畴，在清代就叫“辑佚”，是所谓‘汉学’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验一个学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能力。鲁迅的抄写能力是从小养成的。他从私塾之初就抄写《康熙字典》，然后从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耜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这是鲁迅国学修养的第二个层面。

鲁迅国学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佛教的独特研究。许寿裳的话一直是研究鲁迅与佛教关系的指南：“民三之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就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从鲁迅的日记可知，1912年购买《观无量寿佛经图赞》，1913年购买《释迦谱》，别人赠送了他一本《劝发菩提心文》。1914年是他购买阅读佛书的“疯狂期”：

1至3月，购《翁松禅书书谱》。4月18日、19日先后购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说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经》各一部，以及《华严经》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5月23日“往琉璃厂文明书局买《般若灯论》一部三册，《中观释论》一部二册，《法界无差别论疏》一部一册，《十住毗婆沙论》一部三册……这种疯狂购买、借阅佛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十月，共计购买阅读81部、211册。

如此大规模而猛烈地阅读佛书，在同时代学人中非常少见。在中国，佛

教文化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猛烈的研读中，佛教教义中的精髓也渗透到了鲁迅的思想深处。

抛弃“经史”

讲到这里，想必反对者们已经对鲁迅的国学修养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那么，让我们再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基础上，鲁迅为什么没有去搞其他国学大师研究的“经学”和“史学”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浅薄的见解是：第一，鲁迅对“经学”中的“经义”历来持批判的态度，而且老而弥坚；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一乱一治，一治一乱”、“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大循环历史结构的秘密所在，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就是说，他不愿为那些被自己内心深处抛弃了的正统的“经义”和“历史”作更多的无谓的注解，搞所谓的国学研究。

鲁迅幼时念的十三经，多是儒家经典的原文，而不是后代学者的注疏，所以他对这些经文尽管不如其他杂经、杂书感兴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谈不上愤恨。但读到后代特别是宋代的学者如朱熹的著作时，他就感到“经义”的可怕了。在鲁迅心中，宋代是中国文化衰弊陵夷的转折点，他十分犀利地指出：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则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提到朱熹编辑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刺激。

关于“郭巨埋儿”的故事，《二十四孝》中说道：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鲁迅为此写道：

“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对“礼教”的恶感大概种因于此。

说到中国的历史，最能说明其演变规律的，就是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代学者夏曾佑于1904年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普及最广，影响一时）就此做了深刻的分析：

> 中国历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以后，隆盛约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乱象；又酝酿数十年，遂致大乱，复成革命之局。汉、唐、宋、明，其例一也……大乱之后民数减少，天然之产，养之有余。而豪杰敢乱之徒，并已前死；余者厌乱苟活，无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若为君相者，更能清静不扰，则效益者矣。

“余者厌乱苟活，无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这个解释已经触及了一个历史时代的变迁与这个时代民众心理的关系问题。

鲁迅则将这个关系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外敌入侵之时，康、梁发起维新运动，以图自强，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于是潜伏了300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满意识重又抬头。当时的学术界在修订历史时，也设置了“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科目。鲁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间，他东渡日本学习，就曾加入兴复会，并接受过暗杀任务。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认识到民众的愚昧才是症结所在。他写于1919年的小说《药》，就描写了秋瑾被杀害后，一名普通中国人华老栓不仅丝毫没有感觉，而且为给儿子治痨病，到刽子手那里买来救亡者的鲜血，用蘸馒头吃。

鲁迅对于学者们的“民族意识”诚然是可感的，但认为措辞太绕弯子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中国的历史，其实是——

一、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是乱世，可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鲁迅引了一段《左传》昭公七年的文献加以说明：

>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可"臣"的等级，不是太苦了么？鲁迅说：

> 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此，鲁迅就把中国历代学者所阐发的"经义"与中国历史大循环结构的逻辑关系衔接起来了。太平盛世以礼教秩序制定奴隶与主子的规则，到了盛世衰败时，社会动荡，人们不是去打破这礼教，而是急着去寻找新主子，为他们制定稳定的奴隶规则。于是新盛世来临时，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乱的"种子"。这"种子"便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

这就是鲁迅不搞所谓"经学"、"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进行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的原因。

欲以小说启民智

小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始终是末流，甚至根本算不上"流"。《汉书·艺文志》对"诸子十家"进行了排列，小说家排在最后。又说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不可观的就是小说家。其余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心目中，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为君主王侯服务的学术，而小说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内容之一。一个是官方的、正统的，一个是民间的、非正统的。从语言上也形成泾渭分野，一个是书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为可信、可传承，这就衍生出文字学和考据的功夫；另一个则是口头语言，虽便于传播，但与学术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救亡”成为时代第一大主题。然而怎么“救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解决“救亡”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的人们开始由“救亡”转向“启蒙”，但是启蒙运动开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间发挥了作用，在民众中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原因就是启蒙者来自传统的学术领域，所使用的工具仍然是“经”、“史”，所说的话，仍是书面上的文言。章太炎与梁启超二人同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章太炎的语言过于古雅，连高端学术圈内的人读起来都费劲，更别说去影响普通民众了；而梁启超“笔端常充满感情”的文论，则影响了一代有志青年。

鲁迅参与启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第三样的时代”，重点是对民众的启蒙，为此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民众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小说。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道：“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那么小说究竟具有怎样的力量呢？

比如《三国演义》中把曹操描写成一个白脸的奸臣，这与正统史书《三国志》的记载不符，但是，老百姓看不懂或者不愿看《三国志》，于是千百年来，就认定了曹操是个奸臣。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要为曹操翻案，但没有人关心，依然是一想起曹操，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白多黑少的京剧脸谱。为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小说的力量。

近代史上批判封建礼教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对上层社会的批判，鲁迅的不同在于对大众的批判，他将他们称作“庸众”，历史走到今天，“庸

众”不是无可指责，或者说，奴隶并不因为是奴隶而没有历史的责任。因此要改良。这正是鲁迅眼光独到之处。当然，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也非鲁迅一人，但是枯燥的说教多，而鲁迅则采用了“庸众”们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也由此将数千年处于边缘的文学门类抬入了正统的殿堂，成为一门“显学”。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一个贡献。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那么，看透“国民性”的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他人呢？

鲁迅的书读多了，笔者每每会闻到一种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很少见的精神气味。似乎他并不是中国人，或者起码不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刘半农说过关于鲁迅的一句话，“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自己对这一个说法感到满意。“托”是指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尼”指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尼采。刘半农的话，从字面上理解，是指鲁迅接受了“托”、“尼”的学说，文章风格接近魏晋时期。但实际上是指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中既有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成分，又有尼采存在主义色彩，精神气质与魏晋时期的人物非常相像。否则鲁迅不会感到满意。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并不全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他的性格、情感、思维方法、思想更多地来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鲁迅是一个顽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

8岁那年，父亲与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鲁迅在旁边观看，一位伯伯问他：“你希望谁赢啊？”言下之意，8岁的孩子一定会有亲疏之别，希望自己的父亲赢。谁知鲁迅答道：“愿大家均赢。”其善良之心使长辈们为之动容。

但到13岁那年，“天就塌下来了”。鲁迅的祖父因为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而下了监牢，被判“斩监候”。第二年，父亲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大舅父

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为“乞食者”。鲁迅的内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亲去世，周家落入困顿。父亲的死，让鲁迅有了学医的念想，当然也与他发现日本通过发展医学变得强大有关。但后来，一次观影经历让鲁迅选择了弃医从文。在仙台学医时，有次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之时，有同学大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这一印象太深刻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对环境进行反击的机会了。他迅猛地写出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时翻译了俄国和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截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为此他一度参加暗杀团。一次，上级派他回国执行一项暗杀行动，一再犹豫之下他拒绝了，理由是“一旦自己死后母亲将无人赡养”。这颇不像一个革命者甚至刺客的口气，也说明了他不可能走向这条道路。

革命道路走不了，只能专心搞文艺运动。他联合了几个人想办个刊物《新生》，但由于筹办者纷纷离去、资本逃走而搁浅。这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和矛盾。加上国内家庭生活拮据，催他回国，于1909年黯然返家。

在杭州和绍兴当了两年教员之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革命党人王金发接手绍兴之后，任命鲁迅为绍兴师范学堂校长。鲁迅在日本被压抑下去的革命热情再次迸发，腰挎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还支持学生办了《越锋日报》，亲自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但不久，革命政府就变得官僚化了，学堂经费停发，《越锋

日报》被军政府捣毁。正巧此时他接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是就到了教育部工作。

不久蔡元培不满袁世凯政权而辞职，然后教育部内开始清理“蔡党”，不断捕人。同僚们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由蔡元培引荐入部，自在被疑之列，他在苦闷之余，潜心抄写古碑、研究拓本、整理古籍、阅读佛书。

另一件令鲁迅阴郁的事情是，在日本时期，由于母亲的安排，鲁迅娶了没有感情基础的朱安为妻。到北京后，母亲多次来信劝他把朱接到北京同住，他没有回应。为了抑制性欲，他不得不在冬天穿上单薄的衣服。思想上的苦闷和感情上的痛苦，使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30多岁的青年，埋头古碑之间，更像一个世故老人。

但从汉唐的碑帖、魏晋文章以及佛教经典中，鲁迅却汲取了大量精神养分，使他的“个体精神”扩张到了最高的境界，成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为中国人创造了一种既非西方也非古人的新的精神框架。这种精神框架外表看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和虚无主义色彩，但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他默默的信念，即生活中总能找到一些积极与美好的东西，却从未动摇过。这足以说明他“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理想。这八个字来自他的《文化偏至论》：

>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鲁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时期，正是他思想成熟的时期，因此，当钱玄同代表《新青年》杂志向他约稿的时候，他能厚积薄发，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闻名文艺界，后又在其他杂志发表《阿Q正传》、《社戏》、

《祝福》、《伤逝》、《故事新编》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也正因鲁迅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成熟，因此能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依然一个人坚定地走在“荒漠”中，以“匕首”（古人曰“寸铁”）式的杂文（后汇编成集的有《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与各方论敌战斗不已。也正因如此，当他对曾经寄望创造中国“第三样的时代”的青年失望以后，依然能够孤独地与虚无主义做斗争，直至死亡。

“速死”

鲁迅晚年，已经处于以彻夜创作为“速死”的战斗的精神境界中。他“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一个都不宽恕”，包括死亡。

他的散文集《野草》里面有一篇短短的《墓碣文》，形象地描述了他与死亡的不妥协的关系：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6月17日，正值北京发生"女师大风潮"。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虽是留洋出身，但治校却颇为传统（鲁迅后来以绍兴师爷的笔法命名为"寡妇主义"），遭到青年学生反抗，发起"驱杨"运动。后来发展到反对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为代表的北洋政府。鲁迅介入此事时已是1925年，主要是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开展论战。此时的鲁迅，已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虚无的泥潭，对启蒙产生怀疑，但又不愿走向天国，他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很是失望，认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鲁迅去世的最后十年，他始终孤身战斗，这战斗实际上是对虚无的逃避。特别是蛰居上海租界之后，他用于逃避虚无的方式极端到了"速死"式的"战斗"：熬夜录碑，纵酒无度，还有那鲁迅式的"拼命的做"。

据许广平回忆，那时鲁迅经常夜间只和衣睡两三个小时，拼命写作。这不仅是在压制内心的虚无与苦痛，更是在践行"速死"之道。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1913年因参加讨袁在北京被捕，曾手书"速死"二字以示心迹。辜鸿铭在去世前一年（1927年）也曾"日惟祈求速死"。大约都是极端绝望的表示。不同的是，鲁迅的"速死"是绝望，更是绝望中的战斗。

在"速死"中，鲁迅进入到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初，他的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

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

1936年9月，鲁迅写了一篇《死》的杂文，其中留了一份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写完之后，鲁迅“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他继续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份，他的病体似乎好一些了，体重也增加了。

17日下午，顶着大风，鲁迅去了《鲁迅杂感选集》的日文译者鹿地亘家，帮助解决几个翻译的问题。在鹿地亘家，鹿地看有风吹进来，想关上窗户，鲁迅阻止了他。鲁迅走时，拒绝鹿地送他出门，在清冷的风中，头也不回。

傍晚，鲁迅来到内山书店。日本牙医奥田杏花尾随鲁迅进了书店，内山老板不在，店员镰田以日本茶接待鲁迅。奥田从鲁迅后面用手轻扣他的肩头，鲁迅回头：“呵！久违了！”于是他们饮茗座谈，鲁迅又燃起烟卷，话题围绕在当时亦极为敏感的中日关系。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

说到这里，鲁迅翘起八字式胡须成了“一”字式地笑了。

这天，与往日不同，鲁迅很早就离座。奥田在分手时关心道：“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着别受了风邪。”

到家之后，周建人来了，跟鲁迅谈到11点。

次日凌晨1点，方才睡下。3点半，坐起来。许广平发现鲁迅呼吸异常，

赶紧服药，但气喘并不见好。

天亮之后，鲁迅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托他请医生。内山打了电话，马上就赶到鲁迅家里，帮鲁迅按摩背部。

须藤医师来了。他感到事态严重，请松井来会诊。

松井仔细诊查后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要特别注意，应该用氧气治疗器。

吸氧之后，鲁迅的病情看起来减轻了一些。

19 日凌晨 4 时，鲁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便是鲁迅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两个字。在这之后，鲁迅就处于弥留状态。

几个小时里，看护给鲁迅连着打了好几针，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许广平回忆说："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时为 1936 年 10 月 19 日 5 时 25 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侧。

那天早上，7 岁的海婴醒来之后，佣人许妈上楼来，低声对他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海婴奔下楼去，看见父亲安详地睡在床上，但屋子里的气氛十分低沉压抑。许广平过来拉着海婴的手，海婴回忆说："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

那天下午，鲁迅的遗体移到万国殡仪馆，当晚布置灵堂，20 日开始接受公众吊唁。当天瞻仰遗容的个人有 4462 人，团体有 46 个。治丧委员会原计划安排一天时间，但来人实在太多，临时决定延长到两天。第二天来吊丧的，个人大约有五六千，团体超过了 80 个。

21 日下午 3 时至 4 时，举行小殓仪式。鲁迅的遗体被放入铜棺，棺盖的上半是玻璃的，可以看见鲁迅半身遗容。

22 日下午 2 时，出殡仪式开始，灵柩由巴金、胡风、萧军、黄源、靳以、张天翼、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等十几人抬着，放到灵车上。

参加送灵的人大约有五千，路上不断有人加进来，最后有一万多人。

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徒步送灵，后来在再三苦邀之下，才上了汽车。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等人跟在行列最后。送灵的还有电影界名人赵丹、陈波儿、欧阳予倩、柯灵、唐纳、蓝苹、郑君里、司徒慧敏等。

送灵的群众唱着挽歌，挽歌由麦新（《大刀进行曲》词曲作者）根据当时流行的《打回老家去》填词。

队伍到达万国公墓时，天已灰黑。公墓大门挂一横幅，上写“丧我导师”四个大字。

奏过哀乐之后，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做了墓前致词。蔡元培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的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宋庆龄一向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这天，她说：“鲁迅先生虽死，其精神仍不死，吾人纪念鲁迅先生，在集合真正革命之同志，以从事于反帝之运动，为被压迫民众而奋斗。”

之后，由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代表上海民众，为鲁迅先生献旗，白底黑字，字为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这旗子就覆盖在灵柩上。

暮色四合，鲁迅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穴。许广平撒下了第一捧土，哭声和挽歌响彻万国公墓上空。

70年后，北京东北四环芍药居附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入口处左侧立着一面铁铸的鲁迅头部塑像，眼睛显然用极锋利的刻刀划过，斜笔向上，比照片中的更加“横眉立目”，由于只有一只，使人难以猜测他的神情。塑像上没有写那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是在背面录了那篇《墓碣文》。整个塑像用没有任何涂料的铁铸成，显得乌黑，且有锈迹。据文学馆研究中心负责人说，每当下雨，就有水从鲁迅眼中流过，像哭一样。

我不知道，当70年后的今人在讨论所谓“国学”，讨论鲁迅是“国学大师”还是“半个国学大师”的时候，如果鲁迅活过来的话，会怎么想？而所谓的“国学”，所谓的“国学大师”，所谓的“国学大师之死”，对于我们，对于当今，

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轶事

林语堂评说周氏兄弟

周作人和他的文字笔调儿一样,声音迂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词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能针针见血的。周氏兄弟之间,人人都知道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兄弟之间误会很深。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从来没打听过。但是兄弟二人都很通达人情世故,都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巧妙的运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

鲁迅与许姓

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好友:许季上、许寿裳、许钦文、许羡苏、许广平。许广平后来成为鲁迅的爱人伴侣。

有一次鲁迅去曹聚仁住处,看见曹的书架上堆积了鲁迅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鲁迅就以为曹聚仁准备替他写传记。曹聚仁笑着对鲁迅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

许寿裳为鲁迅编年谱

鲁迅逝世3个月后,上海文化界同人拟印一本纪念集,大家认为书中应有一份“鲁迅年谱”。商定民国以前由周作人写,南京、北京时期由许寿裳写,上海部分由许广平写,最后由许寿裳总其成。许寿裳秉笔直书鲁迅的婚

姻和爱情生活："（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收到年谱初稿后，当即将自己写的一份初稿寄给当时在北平的许寿裳，附信说："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彼此间情投意合，互相信任……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在她自己拟的年谱初稿中，坦然自陈："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同居。"许寿裳欣然认可。

鲁迅"瞪"萧军

有一次在鲁迅家里闲谈，萧军看见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钓鱼的人型玩具。为了试试钓竿到底有多大弹力，就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摁起来，终于"咔"的一下钓竿断了。鲁迅先生望了萧军一眼，萧军直觉到先生"瞪"他，便感到自尊心受伤害了，从此就不到先生家里去了。

萧红却照样欢欢喜喜地前去。鲁迅先生很快察觉了，问萧红："那一位（指萧军）怎么好几天没有来？"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

鲁迅先生温和宽厚地笑了，说："告诉他，还是来吧！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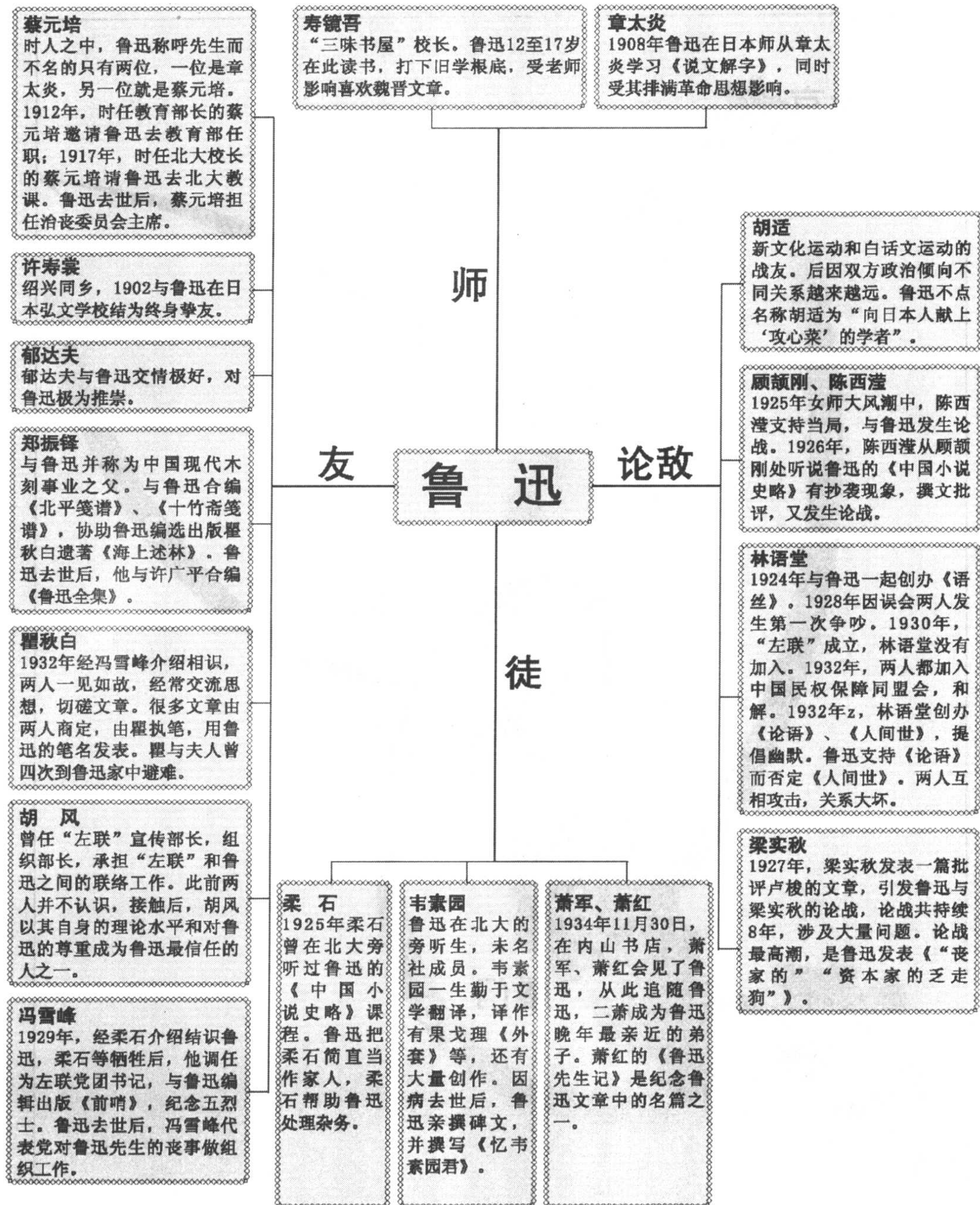
萧红回来转达了先生的话，萧军正想去先生那里苦于找不到台阶，一听这话，第二天赶忙跑到先生那里。开始他还有点不自然，但鲁迅压根就不提萧军怄气的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渐渐地萧军又恢复常态，同鲁迅先生高谈阔论起来。

鲁迅母亲读《故乡》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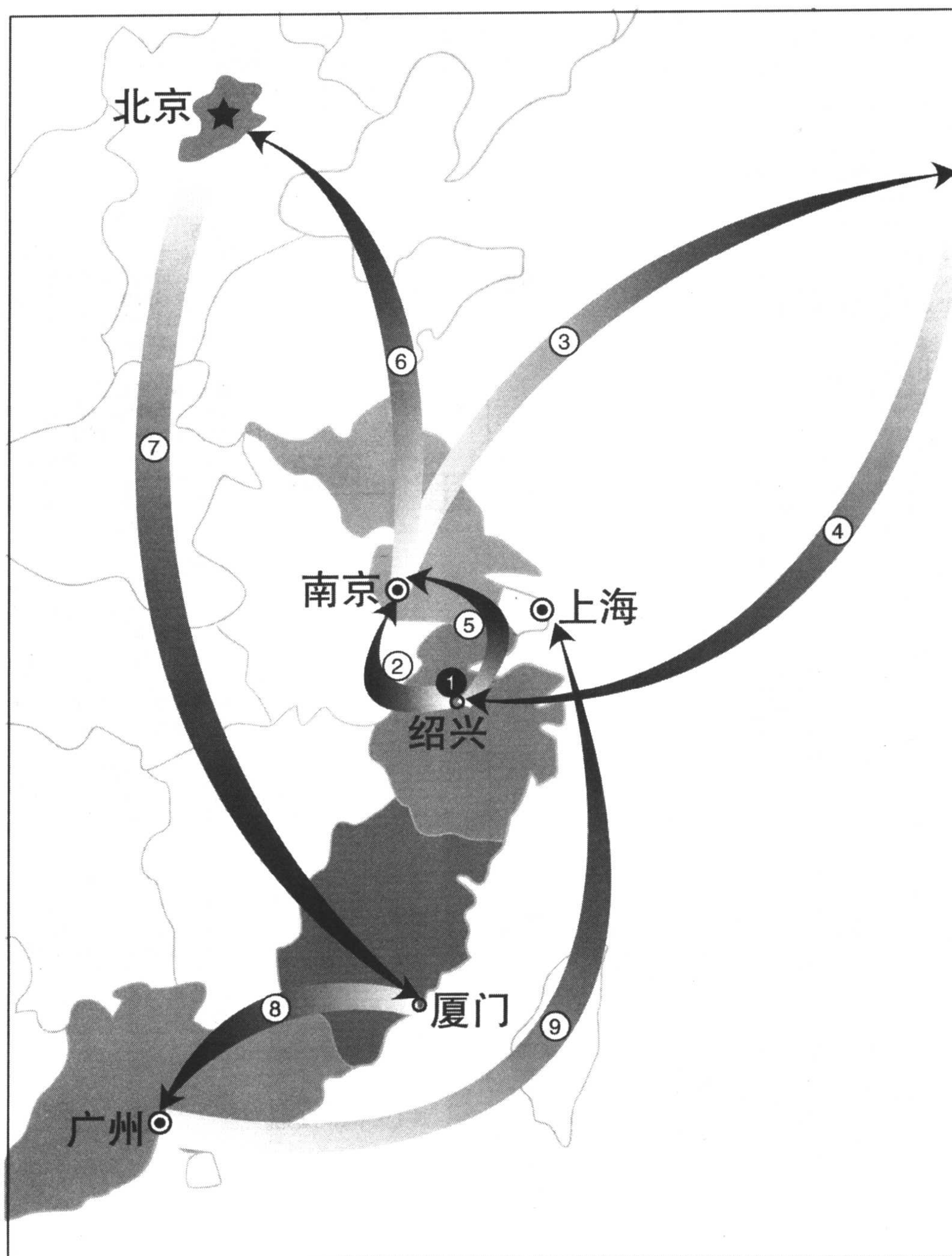
《呐喊》出版之后，有人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迅关系图



鲁 迅
师
友
论敌
徒
寿镜吾
“三味书屋”校长。鲁迅12至17岁在此读书，打下旧学根底，受老师影响喜欢魏晋文章。
章太炎
1908年鲁迅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同时受其排满革命思想影响。
蔡元培
时人之中，鲁迅称呼先生而不名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就是蔡元培。1912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去教育部任职；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鲁迅去北大教课。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
许寿裳
绍兴同乡，1902与鲁迅在日本弘文学校结为终身挚友。
郁达夫
郁达夫与鲁迅交情极好，对鲁迅极为推崇。
郑振铎
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木刻事业之父。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鲁迅去世后，他与许广平合编《鲁迅全集》。
瞿秋白
1932年经冯雪峰介绍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经常交流思想，切磋文章。很多文章由两人商定，由瞿执笔，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瞿与夫人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胡 风
曾任“左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承担“左联”和鲁迅之间的联络工作。此前两人并不认识，接触后，胡风以其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对鲁迅的尊重成为鲁迅最信任的人之一。
冯雪峰
1929年，经柔石介绍结识鲁迅，柔石等牺牲后，他调任为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纪念五烈士。鲁迅去世后，冯雪峰代表党对鲁迅先生的丧事做组织工作。
胡适
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战友。后因双方政治倾向不同关系越来越远。鲁迅不点名称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策’的学者”。
顾颉刚、陈西滢
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支持当局，与鲁迅发生论战。1926年，陈西滢从顾颉刚处听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现象，撰文批评，又发生论战。
林语堂
1924年与鲁迅一起创办《语丝》。1928年因误会两人发生第一次争吵。1930年，“左联”成立，林语堂没有加入。1932年，两人都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和解。1932年z，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提倡幽默。鲁迅支持《论语》而否定《人间世》。两人互相攻击，关系大坏。
梁实秋
1927年，梁实秋发表一篇批评卢梭的文章，引发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论战共持续8年，涉及大量问题。论战最高潮，是鲁迅发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柔 石
1925年柔石曾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鲁迅把柔石简直当作家人，柔石帮助鲁迅处理杂务。
韦素园
鲁迅在北大的旁听生，未名社成员。韦素园一生勤于文学翻译，译作有果戈理《外套》等，还有大量创作。因病去世后，鲁迅亲撰碑文，并撰写《忆韦素园君》。
萧军、萧红
1934年11月30日，在内山书店，萧军、萧红会见了鲁迅，从此追随鲁迅，二萧成为鲁迅晚年最亲近的弟子。萧红的《鲁迅先生记》是纪念鲁迅文章中的名篇之一。

鲁迅人生轨迹图



①绍兴。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893年,祖父因行贿主考官被判"斩监候",家道就此败落,受尽冷眼。12岁开始在三味书屋读书。

②绍兴——→南京。1898年,因家贫退学。不久前往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书,半年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读《天演论》,接受进化论。

③南京——→日本。1902年春,矿路学堂毕业,被选为五名赴日留学毕业生之一,进东京弘文学校,学习日语和基础课。频繁接触革命党人,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强烈;次年,毅然剪掉辫子,为本班剪辫第一人;1904年秋改学医术;1906年4月弃医从文,回到东京;同年夏,回国成亲;婚后第四天,携周作人一起回东京,加入光复会;1908年,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同时深受章太炎排满思想影响。

④日本——→绍兴。1908年,结束七年留学生活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和化学教师。1910年7月,就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辛亥革命爆发,组成"演说队"上街。绍兴光复后,出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⑤绍兴——→南京。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从此开始14年的教育部职员生涯。

⑥南京——→北京。1912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对国事深感失望,在业余时辑录和校勘古书,看佛经,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心绪极为寂寞。

1918年4月,应钱玄同之邀参加《新青年》;同月发表《狂人日记》,声名鹊起。

1920年受聘为北大讲师。此后六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小说史,后将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打破中国小说历来无史的局面。

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运动,"三一八"惨案后写《记念刘和珍君》,不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

⑦北京——→厦门。应林语堂之邀,1926年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后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出版。

⑧厦门——→广州。1927年春,辞去厦门大学教授职务,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参加革命活动,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冷拒,愤而辞职。

⑨广州——→上海。1927年10月,携许广平到上海。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领导工作。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0月19日,于上海家中去世,丧礼极尽哀荣。

假如没有蔡元培

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先生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先生无愧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杜　威

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傅斯年

他（指梁启超——编者注）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梁漱溟



这是蔡元培（左）生前最后留影，摄于一九四〇年，右为出版家王云伍。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元培寄居香港，得王云伍多方照顾。蔡逝世后，衣衾棺木费用及所欠一千多元医药费，都是王云伍代付的。

1940年3月5日，这一天，蔡元培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通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在香港溘然而逝。

同一天，蒋介石发来唁电。

两天后，毛泽东发来唁电，褒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同日，蔡先生遗体入殓，由蒋介石代表吴铁城主祭。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

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

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4月14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电请国民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先生。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①，命内政部依法筹办，定期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走了，走得异常的安静，连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嘱咐②。今天的我们虽可以从各种资料中寻找到举国哀悼的情形，但却无法还原当时国人的悲痛与惋惜之情。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足见蔡元培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

①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云：“国民政府故委员蔡元培，兴邦耆宿，群士导师，生平致力教育文化事业，于国家贡献伟大，贻泽至深，追念仪型，予宜特予国葬，以昭崇报。着内政部依法筹办，定期举行。此令。”（《申报》1947年5月10日）

②我们迄今所知的“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来自于蔡夫人的侄子周峻之口。蔡先生昏迷过程中，周峻很清楚地听到他曾几次吐出“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一些字。后来，中央通讯社记者吴东正问周峻蔡先生临终有无遗言，周峻便把蔡先生这两句说话交托给中央社，转告国人。

假如没有蔡元培

蔡元培的地位来自于他的成就，而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作为北大校长而获得的。即使在今天，只要谈起教育改革，言必称蔡。

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

历史的重任交到了蔡元培的手上。

1916年12月26日，刚刚宣誓就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一次极其普通的任命，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

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顾颉刚[①]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冯友兰[②]说："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评价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教授的水平和学生的素质。可惜，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无意学习，老师无心教学。摆在蔡元培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纠正学风，蔡元培刚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颤了一颤的就职演讲：

>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

---

①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考入中国哲学系。

②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

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出任北大校长时，给自己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的校长尽管也是政府任命，但蔡元培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

蔡元培深知，要改变学风，需从整顿教师入手。学生不喜欢听课、不爱好学术，教师自然难辞其咎。蔡先是三顾茅庐，请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之后又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这两人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曾俏皮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为什么呢？因为蔡、陈、胡三人均属兔，各相差12岁，可谓是老中青三只兔子。后来又相继聘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这些人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同时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此外，还有章士钊、李四光、梁漱溟等等。这些闪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上空的巨星们，齐集北大。

经此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当时北大共有教员217人，其中教授90人，从其中76名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教授仅25岁，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这样的年龄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罗家

伦、顾颉刚、冯友兰等。正是有了这批教授与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正是这批教授和学生，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脊梁。而将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独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

假如没有蔡元培，当时的北大学生可能还会继续做着“升官发财”的大梦，哪管国危民困。正是在蔡元培的治理下，北大才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他把德国大学的模式、治学理念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有一二年时间，就把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的新的精神的摇篮，于是北大才开创了中国的二十世纪。

假如没有蔡元培，可能就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此，顾颉刚含蓄地说：“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 1919 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赵家璧则直白地说道：“‘胡适陈独秀一辈人’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做他们讲学的地盘，他们的主张所能发生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大；那时的北京大学，假如没有如蔡元培先生那样崇仰法国革命，主张学术自由，实施民主教育的校长，五四运动就不会如此的自由发展。这是每个熟悉这一运动经过的人所共同承认的。”

假如没有蔡元培，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可能就不会这么早地萌芽。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保护下，使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得到了开放的空间，有利的条件。蔡元培同意在北大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允许大学讲堂公开讲授马哲，使北大培养出了一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为什么是蔡元培

蔡元培成功了，他没有重复前任们的命运。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蔡元培而不是其他人呢？换言之，他的前任们为什么不行？

京师大学堂至民国初年的北大，几乎是桐城派的天下。著名的桐城古文大师吴汝伦就曾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严复、林纾、姚永朴、马其昶等桐城派代表先后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2 年，严复被任命为校长，文学科

因严复主政而以桐城派为主，林纾、姚永朴、马其昶均处主导地位。后来在严复的建议下，经学科并入文学科，整个文科都由桐城派把持。严复当然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可他毕竟已属于"旧人"，思想还停留在洋务派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上。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严的思想渐趋落伍，主张尊孔读经，赞成帝制，反对新文化运动，为时人所诟病。加之当时的政府，屡屡以经费困难为由想停办北京大学，因此在他 8 个月的任期内，精力大都耗费在筹款以及与政府扯皮上。最后不可避免地获罪于教育部，被迫辞职。

严复辞职后，31 岁的章士钊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章士钊正在上海办《独立周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遂以事务繁忙难以脱身为由，"迟不赴任"。后又借口自己太年轻资格浅而推辞。虽是托辞，但也说出了实话，做北大校长没有资格怎么能行？

代理章士钊的是马相伯，在知识界也有一定影响，但与严复一样，不得不面对经费缺乏的局面。为此，马相伯向比国银行商借贷款 40 万法郎，约定以学校地产作抵押。学生闻讯，群起反对，有的指责马"盗卖校产"，并聚众到校长寓所外抗议。于是马相伯在干了 3 个月后也辞职而去。

接任者是当时的工科学长何燏时，仍旧是教育部拖了他的后腿。在他任职期间，教育部提出要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作为一校之长，怎么可能容忍这种做法，最后只好辞职。

胡仁源是这几个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历时约 3 年。胡在当时的思想界有相当地位，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留学，归国后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在他任内，陆续招聘了一批国外留学生和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任教，如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黄侃等，而与此同时，作为桐城殿军的林纾、严复、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人大多先后离开北大或文学科。据沈尹默回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胡仁源任校长后，预科学长由胡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是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任北大校

长，是出于沈步洲的策划。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他想把胡仁源从北大校长的位子上拉下来，于是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向北洋政府推荐。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据马叙伦的回忆，在胡任期的最后，有点做不下去了。

章士钊不肯上任，是对自己的学识没有信心；严复、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等人的去职，是因为与教育部不合。所以，要想稳稳当当地做好北大校长，首先必须在学问上过得了关，其次还得有政府的支持。同时具备这两大条件的，在当时的中国，除蔡元培外几无第二人。学问上，蔡元培是前清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又较早地接触了西学，留学德国四载，被同时代人誉为“学贯中西”；政治上，蔡元培是民国革命元老之一，他出任北大校长不仅得到了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支持。国民党内部虽有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人反对，但孙中山先生则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于是慨然受命，“我不去整顿，谁去呢？”

当然，学问与政治上的地位，只是蔡元培能够当好北大校长的先决条件。上述几任校长，他们都有办好北大的良好愿望，也为之积极努力，无奈在诸如什么是大学，如何办好大学等根本性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和通盘考虑。这时的北大，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精通教育的“大家”来主持，蔡元培就是在这一情境下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留学德国，精通德国的办学理念，后来又担任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倡导了多项改革，对于如何办好高等教育有着独特而成熟的想法。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的回答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如何办好大学？蔡元培的做法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国学不厚焉能领袖群伦？

“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

疑,说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此话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盖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领袖群伦,兼容并包,开一代学风。

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蔡元培出生于商贾之家,虽不是书香门第,但祖父佳木公从小刻苦读书,因家贫买不起熏蚊烟,夏夜把双脚放在甏里读书的逸事,给蔡家子孙以深深的影响。蔡元培自幼聪慧,5 岁入家塾读书,像他的祖父一样,蔡元培每天都要复习到深夜,母亲周氏常常不辞辛劳地陪着他。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 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①]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 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

①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

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此外，王子庄经常向学生讲述明末清初那些坚持民族气节、反对苛政的侠义英烈之士的故事。据蔡元培回忆，王先生“尤佩服吕晚村(留良)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地讲过”。[①] 王子庄经常阅读宋明理学家的书，向学生讲授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学说的异同；对于明儒，他最佩服刘宗周。蔡跟着王修行了4年，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蔡元培说自己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与王推崇宋明理学密切相关。他后来走向反清革命道路，主张民主共和，也同他所受的有关刘宗周、吕留良、曾静等明清之际反清志士的熏染不无关系。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最初的兴趣在辞章，以后又转向考据与训诂，在小学、经学、史学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当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等书。

20岁那年，蔡元培的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他的散文与骈文得到同乡前辈田春农的首肯，便被介绍到绍兴的藏书大家徐树兰[②]、徐友兰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4年。蔡在徐家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还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

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编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

①吕晚村即吕留良，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明朝灭亡后，他散家财结客，图谋复兴。事败，家居授徒，誓死不仕清朝，后削发为僧，保持民族气节。雍正时，湖南人曾静读了他的书，受其思想影响，密谋反清，事泄被清政府逮捕杀害。早已去世半个世纪的吕留良也受株连，被剖棺戮尸，著作被焚毁，子孙或被杀，或被发配边疆，成为清朝一大文字狱。

②近代图书馆事业家、藏书家。光绪举人，授兵部郎中，改知府，以母病辞官归，遂不复出。热心于文化公益事业，创办绍兴中西学堂，出资、捐书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全楼藏书7万余卷。徐友兰为其胞弟。

26 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方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已经是翰林院庶吉士的蔡元培视野并不狭窄，他开始读西方的书籍。其中包括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几何原本》、《电学纲目》、《化学启蒙初阶》、《星学辩证》、《农家新书》等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他的必读书籍。此外，他还特别注意阅读介绍日本振兴国力方面的书籍，如《日本新政考》之类。

没多久，通过中文翻译书本来了解西方已不能满足蔡元培的求知欲望。为了读懂原著，他决心自学外文，于是从 1898 年夏天开始，与家乡的几位好友一起学习日文。

为了近距离地研究西学，蔡元培于 1903 年想赴德国留学，但因经费问题直到 1907 年才成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德国，他先花了 1 年多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 3 年。3 年间，他一共修课 37 门，侧重于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和美学，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研究。

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伦理学时用的就是该书，毛泽东读这本书时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如“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此外，凭借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还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0 年)，该书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蔡元培在学界的地位与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

早在清代晚期，蔡元培就认为：中国历来重视伦理学，可是至今尚无伦理学史，于是立志写作《中国伦理学史》。

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从厘定伦理学、伦理学史等概念入手，对中国从上古到宋明时期的伦理学作了系统的探讨，不仅叙述了各个时代的特点，而且就各时期的重要流派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蔡元培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就已经开始关注伦理领域，注重人的道德存在，以儒家为伦理学

之大宗，是中国伦理学的主流；儒家以外，能自成一家之言的有八家，以墨、道、名、法为主的各派别均以伦理思想为主。书中把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三个阶段。

蔡元培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在评价《中国伦理学史》时曾说："在这快要到民国的时候，蔡元培既非正统派，亦非今文学家，即已开始用西洋形式和思想来编述固有思想。他在此时，著有《中国伦理学史》一书，实是用新体裁著中国思想史最早的一个人。"倘若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没有考据的功夫，那么蔡元培所搜集的材料一定会有很多错误；倘若没有学习西学，就很难跳出历代著作的窠臼，寻找到一种新的写作思想史的方法。这两点也正是他后来称赞胡适所做《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理由："胡适既有相当的汉学根底，又专门研究过西洋哲学史，几乎是当时唯一的人选。"

寓革命于教育的政坛元老

蔡元培在民国政坛的地位，缘于他较早地参与了反清革命，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的革命道路始于戊戌政变后，那时的蔡元培刚过而立之年，官授翰林院编修，可他却选择了弃官从教。其原因在于，他认为戊戌政变之所以发生，康有为等人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意识到培养维新人才的重要性，而只想通过少数人控制政权，来达到排斥顽固势力的目的。而正是在办理教育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最终走向了反清革命道路。

蔡元培辞官后的第一站是到徐树兰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出任总理，推行新学。一年后因旧派教员的不满辞职。接着到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任特班总教习。除正常的教学之外，经常对学生进行民主思想教育、爱国思想的灌输，培养出了黄炎培、邵力子、柳亚子等众多革命后辈。任职期间，蔡元培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后来又创办了爱国学社。这些机构在公开办理教育的同时，暗中又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成为当时

重要的革命秘密机关,蔡元培由此真正走向革命道路。

特别是爱国学社,与其他学校的明显区别就是"倡言革命":定期举办张园演说会,结合时局发表反清演说;总理蔡元培、学监吴稚晖、教员章炳麟轮流为《苏报》撰文,极力宣传革命。

从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到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爱国学社,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一度发生转变。他把教育和革命相结合,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反清人才。他自述:"自 36 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在爱国学社,聘请教员进行军事训练;在爱国女校,请人专门教授理化,指导学生制造炸药。蔡元培自己也参加了杨笃生等人的暗杀团。

1904 年 11 月,暗杀团被改组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1905 年 8 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蔡元培于当年 10 月加入,接着就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

1905 年 9 月,暗杀团成员吴樾准备用杨笃生提供的炸弹暗杀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最后炸弹提前爆炸,没实现目标反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经此事件,蔡元培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政治方式,仍旧回到原来的路子上:通过教育,传播新知,拯救国家。之后蔡元培就去了德国继续深造。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从德国回来,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领导和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创建了新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此时期,他还被孙中山任命为迎袁专使团的领队,亲赴北京请总统袁世凯南下就职。从这两次任命看,足见蔡元培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地位。后来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有人就说他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

中西合璧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离不开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究其

根源，这一方针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

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于此。”“普”是普鲁士，“法”指法国。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蔡元培将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普鲁士有一大批小学教师，强调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还明确表示：要以德国大学为参照系，经过调整和改革，使北京大学能与柏林大学相抗衡。

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蔡元培的这一办学方针，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在他任中西学堂总理的时候，就因为在新旧两派之争中，“往往偏于革新方面”，得罪了旧派教员，引起他们的忌恨，最后愤而辞职。在他出任北大校长之后，吸取了此次事件的教训，没有出现胡仁源治下太炎门人对桐城派的“赶尽杀绝”的文化惨剧。而是采取“兼容并包”之策略，一方面继续聘任章门弟子周作人、刘文典、鲁迅等人，另一方面聘任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派人物及章士钊、吴梅、黄节、刘师培等旧学名家，从而改变了章门弟子的独霸局面。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之所以能保持思想自由、教育的相对独立，有赖于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相对软弱的特定历史条件。1917 年，军阀混战，各派忙于争权夺利；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刚被挫败，张勋复辟的闹剧即将上演。一句话，权力这只黑手还没有伸进大学校园。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北大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蔡元培才能为北大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向。

等到当局开始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时候，蔡元培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他曾多次因政府干预学校教育而请辞。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当局逮捕学生提交辞呈，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1923 年，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粗暴干涉"罗文干"案，蹂躏人权，再度愤而辞职，离校而去，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说："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两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一为自由，二为正义。

长眠香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这是他在 1928 年倡议创建的中国第一个统一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 70 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

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 年 12 月 26 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 156 号租房居住。

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的。

蔡先生在港的生活来源仅靠中央研究院的薪水，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了。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蔡元培逝世后，衣衾棺木的费用及所欠一千多元医药费，都是别人给代付的。

香港地位特殊，环境复杂，因此蔡元培对外都用“周子余”的名字，外间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很少。仿佛隐于闹市，门可罗雀。他在香港仅有一次公开演讲——1938 年 5 月 20 日，保卫中国大同盟（由宋庆龄创立）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的美术品展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居港期间，蔡元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38 年 2 月的最后一天，蔡先生主持了在香港举行的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在枯燥、清贫、寂寞中，蔡元培的生命渐渐地走到了尽头，这盏光照中国思想界的明灯即将熄灭。

1940 年 3 月 3 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

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又将蔡元培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寇克博士认为，这种反应情形非常良好，令人兴奋。

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

轶事

征婚启事

1900 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他才 33 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的择偶条件为：(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

给陈独秀伪造简历

1917 年 1 月 11 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求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在函后开具的陈独秀履历是这样写的："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其实，独秀虽曾多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

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不拘一格聘梁漱溟

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

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

“我跟你们决斗！”

蔡元培乘势加快了北大改革的步伐，当然由此也引发了一场“讲义费风波”，这件事居然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特大新闻。因经费紧缺，学校决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这让部分穷学生不高兴。有个叫冯省三的就跳出来带头闹事，振臂一呼，纠集了一帮人，欲找校方讲理。他们先是在会计室找到蒋梦麟，后又跑到文科教员休息室找到蔡元培，在门外叫嚷：“坚决要求免费！让蔡校长出来！”

蔡元培惊诧地走出门外，他耐下性子与学生解释，这是评议会的决定，不能通融。红楼门口顿时秩序大乱，冯省三气势汹汹地指着他鼻子大声责怪。蔡元培终于发怒了，来北大这几年还从没人敢这样蔑视过他。见他突然痉挛着挥拳作势，向学生怒目圆睁地咆哮道：“我跟你们决斗！”

他说完真的向前迈进一步，摆出一副决绝而略显滑稽的架式。包围他的学生终于清醒过来，怏怏地后退而去。后来蔡元培毅然将冯三省开除。

蔡元培关系图

蔡元培

师

王子庄
1880年受业于王约四年。王为八股名家，好读明季掌故，崇尚宋明理学。蔡耳濡目染，十分崇拜宋儒。

马相伯
1902年，蔡为进一步研究欧洲文化，登门拜马为师，学习拉丁文。

友

徐树兰
捐资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和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蔡18岁始为其校订所刻图书约四年。徐家藏书甚丰，蔡因此得以博览群书，学问大进。

张元济
张长蔡一岁，同为前清翰林。1899年，同办《外交报》，介绍国际知识和动态。1902年张组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聘蔡任所长。蔡留学海外的经费多得张资助。

吴稚晖
吴与蔡均为国民党“四元老”，交好四十年。1901年于南洋公学相识；1902年，蔡发起成立爱国学社时吴出任学监；1903年“《苏报》案”中章太炎怀疑吴告密，蔡挺身而出为其辩白；1913年共同创办《公论》报，抨击袁世凯。

章太炎
1903年，应蔡之邀，至爱国学社任教，参加中国教育会活动；1904年，在章的推动下，蔡元培、陶成章建立光复会。

孙中山
1905年10月，蔡加入同盟会，被孙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孙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邀蔡担任教育总长。

吴玉章
早年加入同盟会，国民党核心人物之一。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遭通缉，被迫流亡法国，与蔡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后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延安五老之一。

陈独秀
蔡上任北大校长伊始，即聘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两人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下斗争情谊。

论敌

胡　适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红学宣战，其中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石头记索隐》的作者蔡元培。

林　纾
1919年初，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蔡元培毫不示弱，当即撰写文与林纾展开论战，明确阐明自己的办学主张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徒

黄炎培
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遇到了他精神上的终生导师蔡元培。用黄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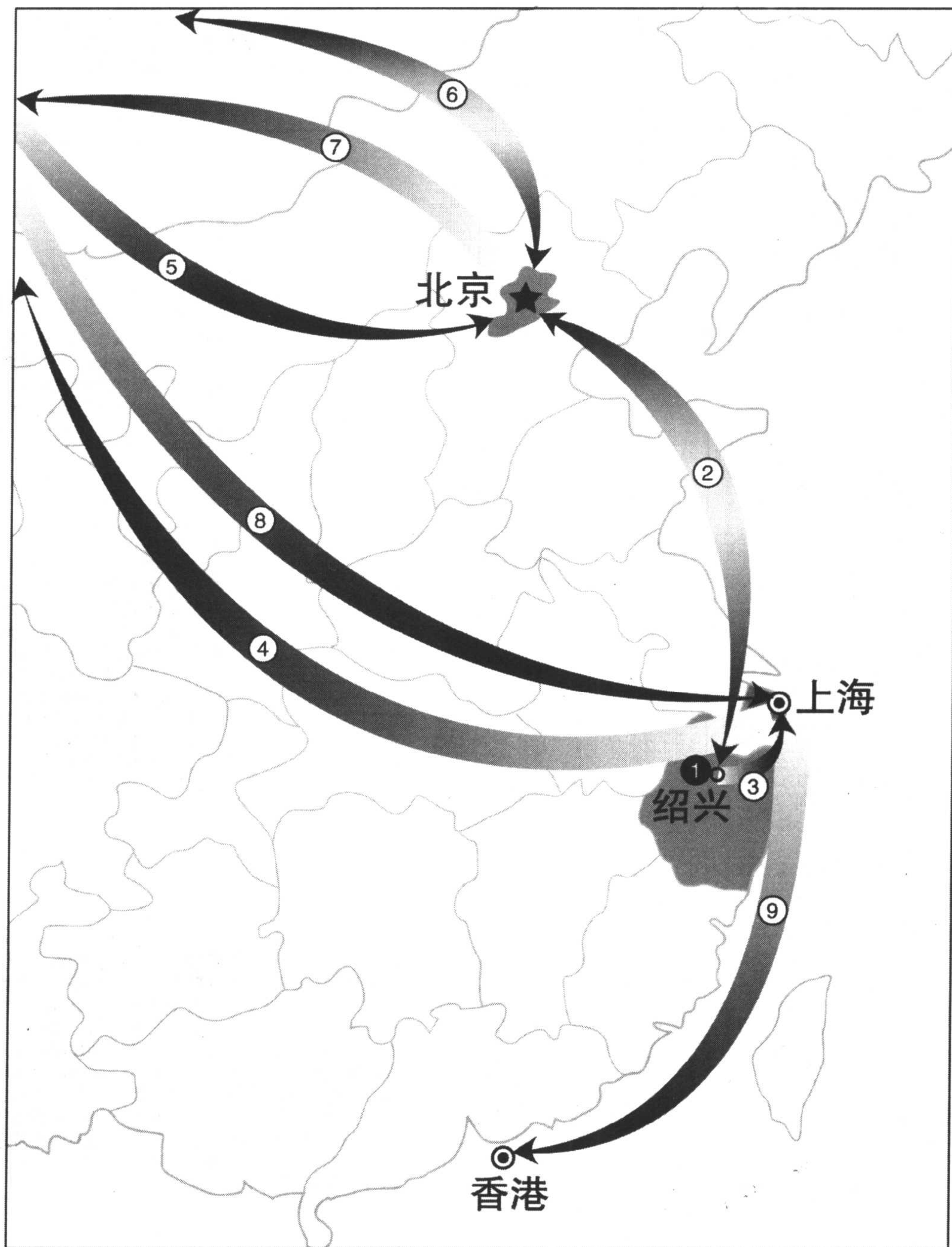
邵力子
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和平老人”。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受教于蔡元培。

李叔同
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著名佛教人士。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钻研法学。蔡亲自指导李学习日文，翻译《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部日文法学著作。

柳亚子
著名诗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民主人士。17岁时加入爱国学社，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开始革命生涯。

许德珩
九三学社创始人，社会学家，教授。1915年初考入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与蔡私交甚深，称其为老师。

蔡元培人生轨迹图



①绍兴。1868年1月11日出生，自幼喜欢读书，至死仍手不释卷。六叔铭恩将所有藏书向蔡元培开放，同乡徐树兰家所藏4万多册图书也随他取阅。13岁时，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服膺宋学，并习得一手怪八股，凭此在科场平步青云。17岁中秀才，22岁即中举人。

②绍兴←——→北京。1890年会试中贡士，因故未殿试。两年后补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戊戌政变后，深感清政府"无可希望"，始有"教育救国"之念，于是弃官出京，返抵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③北京——→上海。因提倡新学与旧派人物不和，于1901年9月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特班总教习。第二年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创办爱国女学，任校长；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社总理。于教书育人之外，暗中鼓吹革命。1904年11月，在上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

④上海——→德国。1907年6月，以四十之龄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习德语一年，后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1910年出版《中国伦理学史》。

⑤德国——→北京。1912年1月，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倡导教育独立，改革教育制度。半年后因不满袁世凯专制而辞职。

⑥北京←——→德国、法国。辞职后，蔡元培再次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一年后又赴法国，学习法语，从事译著。期间与留法学生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往来密切。1915年与李石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次年与吴玉章等组织华法教育会，任中方会长。

1916年10月，回国就任北大校长，锐意改革，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⑦北京——→欧美。因在"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得罪当局，被迫辞职。1921年1至8月，先后考察、访问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英国、美国，拜晤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倭铿等人。

9月回北京。第二年，撰写《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针对胡适的观点展开争辩。3月20日，发表《教育独立议》。1923年1月，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粗暴干涉"罗文干"案，再次请辞北大校长一职，出走欧洲。

8月底，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始编写《哲学纲要》。1924年1月，由比利时移居法国，一面著述，一面协助办理华法教育会事务。11月，赴德国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

⑧德国——→上海。1926年2月回上海，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工作。后出任大学院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拥护国共合作。

⑨上海——→香港。1937年上海沦陷后，欲取到香港到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因病滞留香港，于1940年3月5日逝世。

胡适：近代学术思想的枢纽

你在这几十年来的论战里，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爱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不断地用世界的水准衡量我们民族的内心和物理的生活，所以在你七十岁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壮盛的时代一样，你都不怕逆着风向，挺身高呼，你要国人痛切觉悟我们东方老文明的衰朽，你要国人热诚赏识西方新文明的成就。我们懂得你的用心：你是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选自《中央研究院同仁的祭文》



一九一七年，胡适与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江冬秀完婚，在「悍妻」的「淫威」下，不情愿地与这个小脚太太走完一生。时人讥笑胡适「惧内」，他不在意，反而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发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认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图为胡适一家，中为胡适夫人，左为长子胡祖望，右为次子胡思社。

胡适凭什么成为大师？

在诸多国学大师之中，论学问，胡适也许并不是最好的，论人格魅力，胡适也并非最优秀者，但是，他有两点却足以笑傲同侪：

一是门生众多。顾颉刚、傅斯年两位大师级的徒弟立于旗下，就足以光耀师门。其他如俞平伯、罗家伦、毛子水、罗尔纲、吴晗、周汝昌、唐德刚等不一而足。这一点只有章太炎可以比肩。不过，与章太炎不同的是，胡适的弟子中不只是文史学人，还有经济学家千家驹、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这一点，胡适一生颇为得意。1962 年 2 月 24 日，也就是胡适心脏病突发去世的那一天，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刚刚选出了四位新院士（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胡适在酒会致辞时非常高兴，这不仅因为他是研究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两位吴姓的新院士均出自他门下。他兴致极高地讲道：

>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第四代就出了两个诺贝尔。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另一个人所不及之处，是他以二十六七岁的年龄就暴得大名。他的弟子顾颉刚虽然与乃师相仿，以一部《古史辨》一夜成名，但 1926 年该书出版时顾已经 33 岁，终究逊了老师一筹。这方面，能与胡适相提并论的只有梁启超。不过，梁启超的少年成名，是因为追随老师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这和胡适的全无凭借、以一己之能而得名大为不同。

那么，一个学问并非最好、人格魅力一般的年轻人为何能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一举成名，成为众相追随的大师呢?

思考这个问题，人们很容易想到"时势造英雄"这五个字。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1891 年生于上海，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两岁时随母亲去台湾到父亲胡传任职处(胡父时任台东直隶州知州)生活了 3 年。5 岁开蒙，在绩溪老家受过 9 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国学基础。1904 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9 年因所就读学校解散，在上海过放荡生活。1910 年 5 月到北京，7 月参加庚款留学考试，以胡适名字考中第 55 名(共录取 70 名)。8 月坐船去美国，9 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科。1912 年，开始对政治大感兴趣。1915 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

这就是胡适在 26 岁回国之前的简单经历。但是与一般的留学生不同的是，胡适在国外依然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与国内友人时有书信往来。证据之一就是与当时主持《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通信探讨文学改良问题，这才促成了他在 1917 年 1 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 9 月在陈独秀的邀请之下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18 年 12 月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胡适积极为之撰稿。1919 年 1 月在他的支持之下，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1919 年 2 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5 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胡适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名扬天下。

于学术思想空白期横空出世

说胡适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并没有阮籍所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意思。因为 1917 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不能说没有"英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都还

健在。其中年龄最高的严复是64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45岁。但是，这几位在晚清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到了1917年虽然名气仍然如日中天，但是实际的影响力已经处于衰退期。也就是说，胡适回国之时，恰恰是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力空白阶段。这个"空白"，恰恰让胡适填补上了。

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呢？难道说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溯其源头，可追至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曾国藩(1811～1872年)、左宗棠(1812～1885年)、李鸿章(1823～1901年)、张之洞(1837～1909年)为代表的一批封疆大吏，实施"同光新政"，在"自强"、"求富"口号下推行的以举办近代军用及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涉及外交、军事、经济、文教等领域，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这种纯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改革，在胡适三四岁的时候，也就是1894～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彻底失败。

于是乎，政治家们以及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这些内心充满政治诉求的学人们，开始把引进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西方政治体制的输入。但是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体虽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一切实质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见混乱。引进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学"。其实早在1861年冯桂芬所写的"采西学议"一文(见《校邠庐抗议》)就已主张"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2年郑观应撰"西学"篇说："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也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死于民国前夜的张之洞在1898年总结前人所说，写了著名的《劝学篇》，明确指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并详细解说道："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句话的意思被总结为近代史上的一句格言——"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是晚清至“五四”这个阶段学术思想史的主干。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句话上。关键在于其中的“西学”二字。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基本来自严复的翻译作品，没有真切地学习过。虽然“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于 1872 至 1875 年先后派出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但学习的都是科技知识，而且于 1881 年以“沾染外洋习气”为由全部撤回。自 1898 年维新变法之后，学人们倒是因为参与政治避祸频频出国，但由于近便，去的都是日本，虽然拼命学习西洋学术，但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张之洞就说，西学都是“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的，因此不得要领。梁启超说得更明白：“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适这个在美国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名校实地学习过农业、政治、哲学的博士横空出世了。

胡适留学用的是“庚子赔款”。“庚子赔款”的来历是 1900 年 6 月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1901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各国总计白银 9 亿两多。其中美国近 3300 万两。1900 年旧历为庚子年，所以叫“庚子赔款”。到了 1909 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宣布减免赔款，用于中国留美学生费用和在中国建学校和医院。清华大学即为庚子赔款所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第一批留美学生。第二批中就有胡适，还有赵元任、竺可桢。

由于是美国政府实施的主动措施，因此，胡适这样的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就相当自由，想学什么学科全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反而容易得到“真经”。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打断了晚清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格局，关键之处就在于胡适提出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把

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制（张之洞所谓“西艺”、“西政”）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从此以后，“中学”、“西学”的旧名词基本上便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所取代。李大钊的《东西文化根本之异点》（《言志》，1918年7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3月）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都是新格局下涌动的新思潮。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

胡适能够填补时代的空白，开创思想上的新纪元，有一个盟友就是陈独秀。陈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没有胡适来得真切，但是陈所具备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革命精神和超乎一般人的敏锐观察力，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大大推进了“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念在中国的影响。

考据功夫获取上层学术圈的认可

仔细研究“新文化运动”，会发现思想层面的革命，首先来自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以胡适的旧学根底，他似乎不可能直接从高深的国学学术层面向国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发起挑战，但正是他提出的“白话文学革命”，一下子点燃了学术思想革命的导火索。

提倡白话，改革中国语文以普及教育，自清末以来早已有之，并非自胡适始。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士大夫”的心态，写出来的白话文都是有意写给下层人民看的，目的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将中国的文化无形中划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将高级知识分子和“引车卖浆”的普通百姓在文化层面截然分开，形成对立。胡适在美国受了7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典文学，使通俗文化有凌驾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这一全新的态度受到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的

广泛支持，但同时激起当时守旧派的强烈反感。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叫林纾，他把白话文称为“土语”，声称如果加以推广，那么商贩甚至“引车卖浆”的体力劳动者都可以成为教授了。当有人提到《红楼梦》、《水浒传》也是白话文时，他则说那是“博极群书之人”，非一般人可比。他的话逻辑上是不通的，明显看出是对白话文进入上层学术领域加以抵抗。早期提倡进化论的严复更是坚决捍卫上层文化的一人。

由此可见，胡适思想的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西化”一词所能简单地概括得尽的，虽然取近代西方文化为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

如果胡适的胜利仅仅体现在白话文的胜利，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宽广和深刻。其实，他在中国近代史的上层文化领域造成的震荡更为激烈和深远。

两千年来，儒学内部各层面已先后吸收了许多其他学派的成分，而且，自晚清以来已因受到西方观念的冲激而摇摇欲坠，因此，儒学作为一种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言，早在清末民初已经破产了。即便是袁世凯这样的人也对它失去了信心。但是，它在上层文化或大传统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以学术术语说，当时昌盛一时的“中学”或“国故学”中，“经学”仍高踞首座，以下才是先秦诸子学、史学和文学。在经学领域内，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正处于尖锐对峙的状态；前者有章太炎、刘师培，后者有廖平、康有为、崔适，都卓然成家。在子学领域内，则章太炎和梁启超的影响最大。此外更有以最精密的方法、最新颖的观点开拓新学术疆土的王国维。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但都是“内部矛盾”，其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基本上则多来自儒家。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如果在国学的范畴内没有任何建树，是无法向旧的学术思想发起挑战并领袖群伦的。

胡适幼年就接受了旧学的私塾教育，打下了不错的国学根底。从胡适在美国期间的日记来看，他并没有被西学的“五光十色”迷住眼睛，刚刚进康

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一年级，他在一般功课之外，还不断地私下自修中国旧学。他所点读的旧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各部，如《左传》、《诗经》》、《杜诗》、《说文》、《陶渊明诗》、《谢康乐诗》、《王临川集》、《荀子》、《颜习斋年谱》等。他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诗三百篇言字解》。他经常阅读国内的《国粹学报》，留心国内时事，比如宋教仁被刺一案，他剪贴了所有报纸上登载的证据。这和当时多数留学生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专业方面有成绩的人很多，但是在专业以外同时还能严肃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却寥寥可数了。胡适留学期间结识了德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留学生。他发现，这些国家的学生都深刻了解本国的历史和政治，通晓本国的文字，只有两个国家的学生对本国的文明、历史、政治处于"懵懂"状态，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他深以为耻。

1911 年学校举行过一次基督教学生会夏令营，期间讨论"孔教之效果"，主讲人居然是外国人。之后，另一位外国老师发言，指责中国学生将来会有大隐患，因为没有人研究中国的旧学了。胡适听了"如芒在背"。在美国，他还碰到了相识 9 年的老师马君武，马曾经与康有为、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一起闹过革命，但是后来在德国改学工科。胡适见到他的时候发现，马的思想眼光近 10 年来没有什么进步，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深为可惜。后来参加文学革命的朱经农当时曾问胡适："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适感触颇深，他《日记》中记道："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

当时国故学界虽有经、史、子、集几种传统的分野，但是各家研究都是建筑在乾嘉以来考据、辨伪的基础之上。胡适留学期间对考据之学格外注意训练，留美考试第一场国文考试中便以考证"规"、"矩"出现的先后而得了 100 分。他在留学期间所发表的几篇学术文字，如《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宫论》也都是考据之作。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使他的考据功夫大为增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 1917 年 4 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章对当时学者皆从章太炎而主于九流

出于王官的说法深表不满，是他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它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一点不亚于《文学改良刍议》。

贯通中西的“胡适方法”

不过，胡适在中国上层文化中造成革命性的震动却是他到北大任教之后。胡适在北大主讲哲学、修辞学等。之前，中国哲学史课由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考古家陈汉章教授，陈与章太炎、崔适同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门下。陈汉章按部就班，从三皇五帝讲起，一年下来也讲不了多少。胡适接手以后，抛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它当时只二十六七岁，跟许多学生的年龄差不多，不少旧学根底好的学生根本不服气他，而他开课便打掉了学生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皇五帝的概念，让学生们目瞪口呆。

胡适的课和陈汉章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们所讲的课最大不同点是，胡适以从西方学来的新方法、新观点建造了一个新的系统，赋予古代的知识以现代的意义。

顾颉刚的旧学根底深厚，见到胡适以前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的堂奥之间，傅斯年则是大师级人物黄侃的门生、章太炎的徒孙，但是被顾颉刚拉去听了胡适一课后，立刻改换门庭，与顾双双被胡适“收服”。1919 年 2 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胡适在上层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快地从北大传布到全国。蔡元培为此书作序，特别针对旧学人物林纾等人的心理，强调了胡适在考据学方面与乾嘉学派的渊源。1920 年梁启超则对胡适写的《墨辨新诂》大加赞赏，综论清末的考证学时竟以胡适为“殿军”。经过当时最有影响力人物的认可和推荐，《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年之后，胡适终于跻身于考证学的“正统”之内了。

胡适的授课何以能征服那些桀骜不驯的学子，他的著作又何以能震动那些各为一派宗师的学术大家呢？答案很简单，就在于他为当时的学术界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体系，或者说是研究学术的一种新方法。这些体系恰恰来自于他学贯中西的文化背景。

人们常说胡适的思想就是美国哲学家杜威哲学思想的翻版。胡适的确是杜威言传身教的弟子，他也承认自己的思想来自杜威，但是，胡适所提出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新方法，却不完全来自杜威，或者说胡适并没有完全照搬杜威的思想，而是从中找到了解决中国学术问题的线索而已。甚至比如杜威思想中所受黑格尔的影响的成分，胡适则弃之如遗。

在这一点上，胡适的大脑是清醒的，他并不完全遵从谁的学说，而是从各家学说中取来自己需要的成分。除杜威之外，胡适受赫胥黎的影响也比较大，从赫胥黎那里胡适学到了怀疑精神，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其实，怀疑精神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基调之一，比如王充《论衡》的批评态度，张载、朱熹注重"学则需疑"的精神等，特别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证据"观念。胡适在跟随杜威学习之前，已经继承了传统的学术思想，只不过这些思想不够系统罢了。直到他细读了杜威的著作之后才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思想结构。这个结构的核心就是杜威的哲学方法——实验主义。胡适将它称为中国学术的"起死之神丹"。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归纳的理论；二是历史的眼光；三是进化的观念。具体说包括两部分：

一、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杜威先生与中国》）

二、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

在接受了实验主义的胡适看来,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成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他提倡文学革命,开辟国学研究的新疆域,以致批判中国的旧传统,都用的是实验主义的方法。

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这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适的方法论现在看来似乎太简单了,但较之清代考据自然是更精密了,更严格了,也更系统化了。这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有说服力,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东西,有吸引力,则因为其中又涵有新的成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了。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一级,这个方法的应用范围便随之大为扩展,不复限于几部古经典的研究了。这便是它的弹性之所在。它可以用来研究小说、戏剧、民间传说、歌谣,可以用来辨古史的真伪,也可以用来批评传统的制度和习俗。胡适的思想因此能够风靡一时。

今天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实事求是"最初是由清代考据学家提出来的(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在"五四"以后曾经胡适特别着力地宣扬过,从此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字面上是取自毛泽东的《实践论》,但是它和前面所引胡适的那句话——"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

胡适出名以后，一直到1962年去世，不断地有人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抛开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从政治角度进行的批判，不少人认为他的学术水平实在有限，甚至难以称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的确，在中国学术思想方面，他的兴趣限于清代的考据学，对于宋明理学，以及他专门研究的禅宗也没有相应的了解。不仅如此，他对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也缺乏认识，甚至在英美经验主义一派的思想方面也未能深造自得。金岳霖曾公开指出：“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中西方两个学术领域均称不上所谓“大师”的人，却由于融会贯通了中西方的思想史，一方面提倡“科学方法”，另一方面鼓吹民主自由，希望把中国引上他所向往的现代化的方向，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启蒙大师”。

身后哀荣与“三不朽”

胡适对中国现代史的启蒙，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因而对于如何改变世界的主题的思考流于空泛，1930年以后，中国各党派对于如何“改变世界”这一重大的问题，无论在目的或做法上都存在着根本而严重的分歧，胡适的说法已很难发生作用。但是他所发挥过的历史作用也是后人无法从人们的思想中抹去的。

写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胡适去世当天的情景。

那一天，胡适情绪饱满。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出院。医院知道，一个72岁的老人，而且像他那样的身体，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会前，台大医院打算派出医护人员到会议现场照料胡适，但胡适拒绝了，他觉得在那样的喜庆气氛中，白大褂的出现根本就不和谐，他说：“今天的会是喜，你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

然而到了下午六点半，有一些院士要告别了。胡适站在刚才讲话的地

方，一手拿着酒杯，一手跟要告别的人握手。

他转身过来，似乎要和别人说什么的时候，身体忽然一晃，向后倒下。脸上笑容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逝，手中酒杯已然落地。胡适的后脑碰到桌沿，身体摔在石板地上。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旗手，45 年来大名声震海内的胡适博士，再也没有醒过来。

不过，人们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忘记对这位启蒙大师的敬意。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 103 人。

夜半时分，胡适的遗体被送到了台北市极乐殡仪馆，灵堂也就设在这里。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

蒋介石 3 月 1 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

上款：适之先生千古

上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下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下款：蒋中正敬挽

3 月 2 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 75 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 38000 余人。

下午 2 时大殓。3 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 10 余万人。

胡夫人江冬秀在悲伤中对她的长子说：“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民国七年，即 1918 年，27 岁的时候，胡适曾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不朽——我的宗教》的文章。探讨了人死之后会有什么东西留在世界上的问题。那么，56 年之后，入土为安的胡适究竟有什么东西留给后世了呢？

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人们对“不朽”的理解，一种是灵魂不灭的意思，一种就是《春秋左传》上说的“三不朽”。他说，灵魂不灭对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他赞成“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即不管死后灵魂能不能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著作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从这一点上说，如果用“立德”（胡适的人品）、“立言”（胡适的学术、著作）来描述胡适的死后不朽，还不能令所有人完全信服的话，那么，他打通中西学术门径，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贡献的里程碑式的方法论，则完全可以当得起“立功”的价值判断。

不过，胡适从宗教层面所认识的“不朽”，含义似乎更进一层。他说“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历史、社会是“大我”，个人是“小我”。“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

因此，他说：“以我个人看来，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胡夫人对儿子所说的“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中的“做人”，也许正可以做胡适上面一段话的通俗注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感，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精神价值所在。

轶事

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头衔最多的人

胡适在1922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时候，署名为“胡适博士”。其实，胡适的博士学位当时还没有正式拿到。当1917之年，他参加博士论文口试的时候，因为主考的5位教授只有一位略懂汉语，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论文，论文没有立即通过。如果要拿到博士学位，至少还要苦读2年。

1927年，胡适正式获得博士学位。胡适在哥大注册的英文名字是Suh-Hu，拿学位时，由于中文姓名的拼写习惯发生改变，胡适的名字是HuShih。这也是空前绝后的佳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胡适奔赴国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极力游说美国各界，寻求对中国抗战的帮助。美国大学为了对浴血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纷纷给胡适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胡适总共获得了35个名誉博士头衔，成为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头衔最多的人。

胡适在北大的立脚

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马上就成为全国文化界的焦点人物。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大，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了胡适，蔡元培聘请胡适做北大的教授，向远在美国的胡适发了聘书。

当时的胡适，正值博士论文口试不顺，没有正式拿到博士学位。此时恰好蔡元培的聘书到来，胡适也就不理会博士学位了，立即订票下船，回国做了北大的教授，时年26岁。

胡适被我们称为“国学大师”，其实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功底并不扎实。

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第一年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时候，他跟上年度讲授此课程的老师完全不同，商朝以前的都不讲，直接从西周晚年开始。学

生们都以为是思想造反，舌挢不已。学生对胡适的讲法有意见，想要有所行动，还不能确定，他们请傅斯年来听听课。那时候，傅斯年是名教授黄侃的高足，学生中的名人，在学生中影响极大。新文化运动的大师、旗手，在北大的命运就取决于真国学大师之弟子的一句话。

傅斯年听了之后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在北大站住了脚跟。

傅斯年一帮人，本来是旧学大师的弟子，因此服膺胡适先生的思想与方法，虽未反出师门，实际已经宗奉胡适为真正的导师。胡适的幸运也在于此——开课伊始就争取到了北大最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终生是他的学术的追随者、思想的传播者甚至行政上的助手。

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很多年里，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胡适与黄侃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

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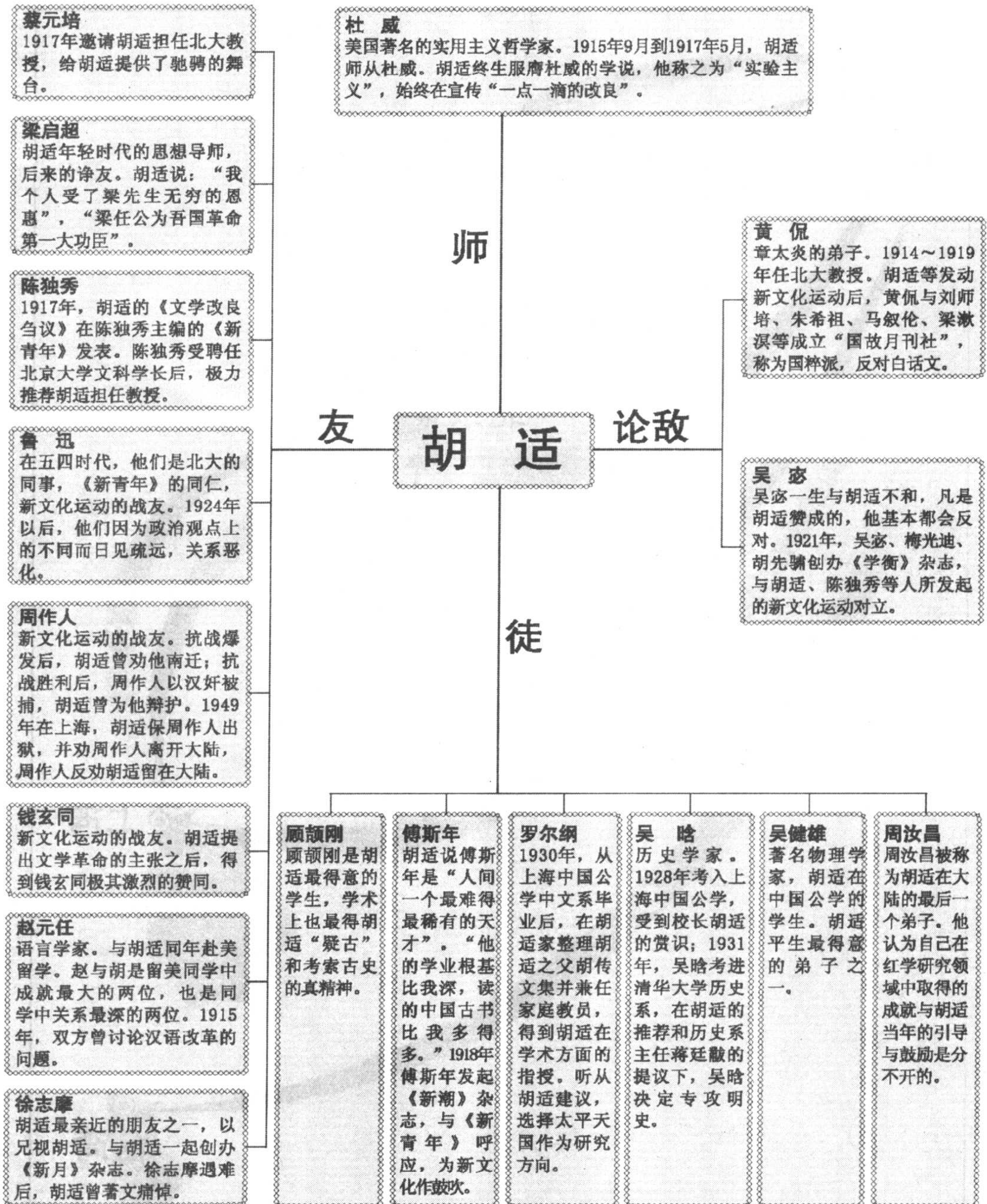
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不管胡适，扬长而去。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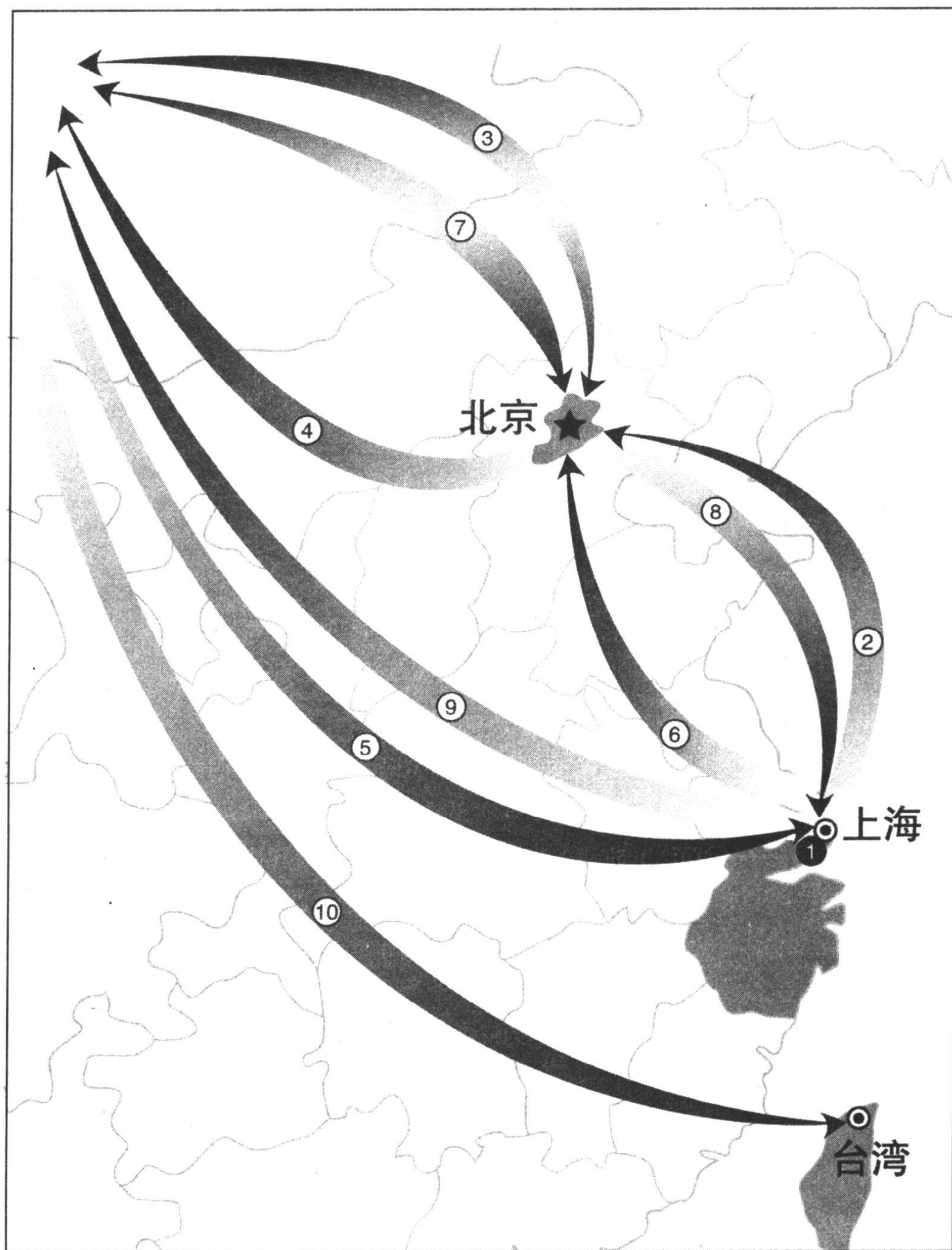
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适大使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柬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即使不知道主人姓名也是可以应付得来的，因为只需"大使"、"阁下"叫将去，一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说说"欢迎到敝国旅游"等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

胡适关系图



胡 适
师
杜 威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1915年9月到1917年5月，胡适师从杜威。胡适终生服膺杜威的学说，他称之为“实验主义”，始终在宣传“一点一滴的改良”。
友
蔡元培
1917年邀请胡适担任北大教授，给胡适提供了驰骋的舞台。
梁启超
胡适年轻时代的思想导师，后来的诤友。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
陈独秀
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陈独秀受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极力推荐胡适担任教授。
鲁 迅
在五四时代，他们是北大的同事，《新青年》的同仁，新文化运动的战友。1924年以后，他们因为政治观点上的不同而日见疏远，关系恶化。
周作人
新文化运动的战友。抗战爆发后，胡适曾劝他南迁；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被捕，胡适曾为他辩护。1949年在上海，胡适保周作人出狱，并劝周作人离开大陆，周作人反劝胡适留在大陆。
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之后，得到钱玄同极其激烈的赞同。
赵元任
语言学家。与胡适同年赴美留学。赵与胡是留美同学中成就最大的两位，也是同学中关系最深的两位。1915年，双方曾讨论汉语改革的问题。
徐志摩
胡适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以兄视胡适。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杂志。徐志摩遇难后，胡适曾著文痛悼。
论敌
黄 侃
章太炎的弟子。1914～1919年任北大教授。胡适等发动新文化运动后，黄侃与刘师培、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称为国粹派，反对白话文。
吴 宓
吴宓一生与胡适不和，凡是胡适赞成的，他基本都会反对。1921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创办《学衡》杂志，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立。
徒
顾颉刚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
傅斯年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1918年傅斯年发起《新潮》杂志，与《新青年》呼应，为新文化作鼓吹。
罗尔纲
1930年，从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毕业后，在胡适家整理胡适之父胡传文集并兼任家庭教员，得到胡适在学术方面的指授。听从胡适建议，选择太平天国作为研究方向。
吴 晗
历史学家。1928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受到校长胡适的赏识；1931年，吴晗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的推荐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提议下，吴晗决定专攻明史。
吴健雄
著名物理学家，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胡适平生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周汝昌
周汝昌被称为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弟子。他认为自己在红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与胡适当年的引导与鼓励是分不开的。

胡适人生轨迹图



①上海。1891年，生于上海。幼年随母亲到台湾父亲任所生活三年，随后回安徽绩溪老家。1904年，到上海读书，5年后因所就读学校解散，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②上海——→北京。1910年5月到北京，7月考得庚款留学名额。

③北京←——→美国。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越两年，开始对政治大感兴趣。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

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学成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五四运动前夕，被聘为《新潮》顾问，5月陪同来华的杜威在北京、山西等地讲学，未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被蔡元培任命为北大教务长。1924年，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院长。

④北京——→英美。1926年7月，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访问团，经西伯利亚到英国。1926年底，离开欧洲赴美。次年在纽约、费城等地巡回演说，接受博士学位。

⑤美国——→上海。1927年，由西雅图经日本回国。因时局变化，暂居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第二年，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⑥上海——→北京。1930年5月，因《新月》风潮受到国民党压力，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11月，全家搬到北平。次年，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到武汉讲学，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次年7月赴美，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此后，在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10月回国。

⑦北京←——→美国。1937年7月参加庐山谈话，9月受蒋介石委托赴美，开展非正式外交活动。次年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四年后辞去大使职务，移居纽约，开始学术研究。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同年9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由傅斯年暂代。

1946年6月回国，就任北大校长。

⑧北京——→上海。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12月仓皇飞离北京，到南京、上海、台北，旋回上海。

⑨上海——→美国。1949年1月，蒋介石聘其为总统府资政，受蒋之托，4月赴美，11月《自由中国》创刊，做发行人。次年，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

⑩美国——→台湾。晚年，往返美国与台湾。1958年、1959、1960年，三次到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1952年、1954年回台湾一行，195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与唐德刚一起做《胡适口述自传》。1958年4月离美回台就任院长，直至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吴宓《空轩诗话》

陈寅恪为后世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

——陆健东

陈寅恪强调中国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近代学人中，他是少数能自践其信念的一个人。他对西方和印度的经典能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他的心灵从来没有为西方所征服。相反地，他却能以不同文化为参照系统而发展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

——余英时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

——陈寅恪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开展『抢救学人』计划。傅斯年屡促陈寅恪（中）赴台，陈寅恪不就，而是选择陈序经（左）任校长的岭南大学。陈一生既不『北上』，也不赴台。右为同在岭南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姜立夫。

陈寅恪之死

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

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

第一批大字报贴出来了。不过不是来自陈寅恪所在的历史系，而是来自学校的后勤部门。贴大字报的人强烈谴责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多年来大肆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还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

所谓大肆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血汗钱，是指陈寅恪4年前在洗澡的时候滑倒，右腿股骨颈折断之后，广东省政府拨专款给他补充营养；而“每月三个半护士”，是指三个专职护士24小时轮换护理和照顾他的生活，半个则是指中山大学保健室能随时安排出护士去陈寅恪家里值班。

对陈寅恪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大字报。7月，陈寅恪晚年的得力助手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了“三个半护士”，陈夫人唐筼只好自己出资聘请护士护理陈寅恪。

10月，破四旧之风蔓延到了岭南，人们开始随意进入陈宅。陈寅恪的书籍和一些未刊的书稿、手稿被查封，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走，尤其是他精心保存的祖父陈宝箴和清朝官员来往的信札也被翻了出来。

当时还未完全靠边站的中山大学领导，将情况反映给了广东省委和已经上调北京的陶铸。陶铸历任广东省长和省委书记，一直对陈寅恪照顾有加。情况反映给他之后，他先后38次对广东省委做了“遥控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但鞭长莫及。对陈寅恪的大字报照样铺天盖地而来。秋冬之际，大字报已经快把陈寅恪淹没了。东南区一号的楼房被贴满了，红色的砖墙都已经看不见了，整幢大楼显得阴森恐怖，活像一口纸棺材。大楼四周的树木上挂上了长幅标语，风一吹来，像片片白幡“沙沙”作响。

高音喇叭是陈寅恪最害怕的一种声音。住宅对面的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高音喇叭每天不间歇播放。平常日子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样一来睡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1945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双目失明。所以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造反者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20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1967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长女陈流求回到广州来照顾母亲。半个月后，她走的时候，陈寅恪对她说："这次算是生离死别了。"语气十分悲凉。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

5月5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

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

另一种设想

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人们忍不住设想：如

果1953年他接受了郭沫若和李四光的邀请，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话，是否会有另外一种结局呢？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

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他的声名不仅仅在学术界。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的学识连敌人都征服了。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由此可以想见，如果1953年陈寅恪北上的话，他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但历史不容想象。

1953年受邀北上的时候，陈寅恪提出了这样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提出这两个条件，并不意味着陈寅恪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他就在瑞士读了《资本论》。他拒绝的主要理由在于他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坚持。这大概与他的家世有一定关系。

陈氏一门可谓三代风流。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21岁时参加乡试，得中举人。父亲陈三立是晚清有名的诗人，“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据说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了两位中国代表参加，一个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个就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在这书香之家，陈家子弟很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古典经典的训练。在《寒柳堂记梦》中，陈寅恪曾经谈及儒家教育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絅”是单衣或外衣的意思。绣有花纹的锦衣外面加上单衣，是嫌花纹太显露了，用此来说明君子之道应该韬光养晦，内蕴深藏不露。由此可见，对于儒家经义，陈寅恪并不是单纯背诵记忆，而是有所感悟并铭记于心，作为自己价值取向的标准。

儒家价值观之所以能在他心里生根，还得力于他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祖父的“吏能廉洁”和父亲的“气节文章”都是活生生的人格示范。

陈宝箴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曾称赞他为“海内奇士”。1851年，洪秀全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兴起。1861年陈宝箴到江西跟席宝田去作战，屡建奇功。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克了天京，洪秀全的儿子洪福瑱率众逃往福建，陈宝箴建议席宝田派兵在路上伏击，出敌不意，果然生擒洪福瑱，立下了大功。后来陈宝箴在曾国藩的举荐下以知府到湖南候补，之后平定了朝廷非常头疼的苗族叛乱，立刻声名远著，成为大臣们共同举荐的对象。

陈宝箴还是推行变法的先驱。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出版的

《校邠庐抗议》撰序。《抗议》一书可能是晚清第一部倡议变法的著作，出版后，光绪皇帝曾颁旨印发翰林院参阅，而 10 年之后才有康有为公车上书、维新变法之事。1895 年，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施行新政，设时务学堂并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当时曾经有人向陈氏父子推荐康有为。但是陈宝箴认为康有为心术不够纯正，也并不欣赏他激进的做法，认为梁启超的学说要胜过康有为，于是就邀请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湖南新政在陈宝箴的领导下卓有成效，以致有些外国人把湖南比作促使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萨摩和常州。

然而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因为举荐"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的缘故，陈宝箴被革职，永不录用，在抑郁中于两年后去世。

和父亲陈宝箴一样，陈三立也以维新变法、开风气为己任。实行湖南新政之时，他随侍父侧，许多新政多出于他的建议。

虽然都推崇维新变法，但他们父子的思想和做法，和康有为、梁启超并不完全一样。思想上，他们和张之洞较为接近，讲究缓缓图之，对康附会孔子改制之说并不赞成；方法上，他们认为康尤为心术不正，谭嗣同等人才能虽强，但是资望不够，主张用有经验而稳健的大臣来领导变法，希望张之洞入主军机，领导全国改革。因为张之洞既为慈禧所喜，又有经验和资望，实在是推行维新的不二人选。但是张之洞最终为翁同龢阻挠，未能进军机，而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不可收拾，酿成戊戌惨案。

变法失败后，陈三立也遭到了革职处分。从此，他便寄情诗词一道，不再过问政治。1903 年，慈禧七十大寿，为了庆祝寿辰，实行大赦。戊戌党人，除康有为、梁启超外，其他人均可官复原职。当时各省设立提学使，朝廷拟定陈三立为湖南提学使，但陈三立无心仕进，拒绝接受。

1907 年，袁世凯入军机处，推行立宪，托陈三立的三位挚友邀请他到北京任职。为了不使陈三立感到突兀，同时也是试探，三个老朋友在信中只说邀请他北京一游，朋友聚会。陈三立回信说，聚会可以，但"绝不入帝京"。陈寅恪在 1953 年拒绝出任北京科学院中古所研究所所长，与父亲不在袁世凯政府任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家传的士人气节。在拒

绝北上的回复中，陈寅恪把这种“气节”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

史学三变

在学术界，陈寅恪是一位传奇人物，其传奇色彩一点不亚于他所推崇的王国维。1919 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吴宓和他交谈过后，当即惊为奇才。吴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氏子弟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他的侄子曾经回忆说：陈寅恪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中。“十三经”的大部分他都能够背诵。有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他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了惊人的广度和深度：胡适曾经考证出陶弘景《真诰》有窃取《四十二章经》之处，心中十分惊喜，认为

是上千年来古人没有看到的新发现。他的学生傅斯年也非常兴奋地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当即托傅斯年转告胡适,这一"窃案"早已为朱熹所破,《朱子语类》早就先著其说了。可见,陈寅恪虽然是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专家著称,但是宋明以下的主要典籍,他也是十分精通的。

陈寅恪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是他兴趣始终偏向史学。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解释说,陈寅恪治史的主要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在"在史中求史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历史选择也是乾嘉学派影响的结果。

清朝治史,莫不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乾嘉学派历来因为研究故纸堆而被后人诟病,但实际上乾嘉学派并不轻视经世致用。戴震以孟子的学说来讲明自己的思想,章学诚曾经说过,六经皆史,史在致用,不在空言训诂,不能离史谈经。经过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的时势变化,乾嘉学派不再是单纯的考据之学,微言大义的发挥逐渐取代名物训诂的考证,经世思想也得以大盛。在史学上,因为国势日衰、外患日益严重,边疆史地之学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陈寅恪初期以边疆动态为研究重点,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是受了乾嘉学派的影响。

陈家虽然是传统世家,但是教育思想并不保守,最明显的是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是要他们接受西式教育。陈寅恪 12 岁的时候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1909 年又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因此,他在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西方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留学德国的时候,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正是德国史学的主流。受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影响,陈寅恪学习和掌握了多种语言。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又随鲁斗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留学期间,他掌握了诸多语言,可以直接读原文,在这点上一般传统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陈寅恪除了东方古文字之外,还旁及希腊、拉丁以及英、德、法各国的文字。这使他在音韵训诂方面的功力大长,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语言本身。语言只是他用来治史的必要工具。五四运动时期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推崇西方学术

的时代，但是能够了解西方古典文字和近代语文的人却寥寥无几，所谓“学贯中西”，对于有的人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在陈寅恪则可以通过对十几种语言的掌握，自由穿梭于中西各国文化典籍当中。在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中，陈寅恪经常信手拈来，对比中西差别，如他的《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说：

> 《宗镜录》最晚出，亦最繁博。然永明之世，支那佛教已然衰落，故其书虽平正笃实，罕有伦比，而精采微逊，雄盛之气，更远不逮远基之作。亦犹耶教圣奥古斯丁与巴士卡儿，其钦圣之情，固无差异，而欣戚之感，则迥不相侔也。

《宗镜录》是宋永明延寿禅师编纂的一部佛学经典。而奥古斯丁是西方中古时期著名的神学哲学家，著有《上帝之都》、《忏悔录》等；巴士卡儿（现在一般翻译作帕斯卡）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和哲学家（他提出一个关于液体压力的定律，后人称为“帕斯卡定律”。他建立的直觉主义原则对于后来一些哲学家，如卢梭和柏格森等都有影响），著有《思想录》。这短短一句话便充分显示出他对东西宗教思想与宗教情感的历史变迁的深刻体会。

此外，受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史学的影响，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一贯注重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作用。所以他论唐代的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和水路运输的中断。他的结论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王室，遂不得不倾覆矣。这是一种很明显的社会经济史观。

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究其原因，国势日危直接影响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1]

---

①《寒柳堂集》，页144。

在这段时期内，他的研究主要是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唯一一个成功的典范，为了搞清楚中国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化的，他将佛教作为研究重点；第二个方面是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的交涉史。这一阶段，他主要从事考证和写跋文，每一篇篇幅虽不长，但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如他在 1929 年至 1931 年之间曾经发表了四篇《蒙古源流》的研究文字，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博引汉、藏、蒙文资料，运用审音堪同的方法进行考释，纠正了《四库全书》中《蒙古源流》的诸多错误。

30 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在西北史地之学中窥见堂奥之后，他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领域，欧洲的东方学绝对居于领先的地位。东方学在欧洲早已经形成有规模的传统，后起者除了在某些点上寻求新的突破外，很难取得大成就。此外东方学偏重于个别史实的建立，不重视司马迁所谓的“通古今之变”的宗旨，这也是无法让在“历史求知识”的陈寅恪满足的，于是他毅然退出这个领域。

另外一个刺激陈寅恪转向的是当时中国史学的衰落。当时中国史学系的毕业生要到日本去留学，这在陈寅恪看来是奇耻大辱。1929 年 5 月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因此他发愤自出机杼，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在这段时期内，他完成了两部博大而精深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稿》。这两部书一脉相承，前者集中讨论隋唐各种制度，如刑法、官职、财政、音乐等制度的渊流及其演变；后者集中讨论唐代的政治史，如安禄山的叛变问题，武后崇尚进士科与所谓初唐党争问题等。两部书彼此呼应，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等问题，从魏齐、魏周、梁陈三个渊流中去观察，为中世史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的研究也成为后人研究中世史避不开的奠基之作。

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寄"心史"于"红妆"

《再生缘》是最受人们称赏的长篇弹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全书共20卷,前17卷为杭州女诗人陈端生作,后3卷为梁德绳所续。《再生缘》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卸职还乡的大学士孟士元之女孟丽君才高貌美,原许配给云南总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华,国丈之子刘奎璧也欲娶孟丽君,却遭孟家拒绝,于是设计陷害孟家和皇甫家。孟丽君女扮男装出逃,后考中状元,并因连立大功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在朝中与父兄为同僚,纳丈夫为门生,成为朝廷重臣。皇甫少华亦因丽君之荐立功封王。但是孟丽君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拒绝与父母相认、与皇甫少华成婚。当身份暴露后,皇帝因其貌美,欲纳其为妃,孟丽君气苦交加,口吐鲜血。陈端生遂就此搁笔。梁德绳便在陈端生的基础上加以继续,使孟丽君几经曲折,最后与皇甫少华重缔再生之缘,从而敷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收场。

柳如是是另一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她是清末的一个名妓,很有文才,得到很多风流才子的赏识,和复社文人陈子龙等都有交往,后来嫁给了当时著名的文人钱谦益。钱谦益降清,她勃然大怒,劝他保持气节,和她隐居,无奈之下,钱谦益就托病辞官回到家乡。后来钱谦益因门徒写诗讽刺清廷被牵连入了大牢,柳如是冒死上书,愿意替夫受刑,总督被感动,将钱谦益放了出来。钱谦益死后,为了家产一事,同族的人与她纠缠不清,她失去了依靠,觉得生活无趣,以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陈端生和柳如是都是女子,因此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颇受人们的关注,研究者认为他是以这两个女子自比。而这两部著作就是他的"心

史”。所谓“心史”，并非陈寅恪自造的一个词汇，而是有出处的：

南宋末年，元兵南下，太学上舍郑思肖忧国忧民，上疏直谏，痛陈抗敌之策，被拒不纳。郑思肖痛心疾首，孤身隐居苏州，终身未娶。宋亡后，他改字忆翁，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他还将自己的居室题为“本穴世界”，拆字组合，将“本”字之“十”置于“穴”中，隐寓“大宋”二字。他善画墨兰，宋亡后画兰都不画土，人问其故，答曰：“地为人夺去，汝犹不知耶？”

《心史》是郑思肖将一生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的汇编，是郑思肖独立特行的证据。郑氏自35岁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40年间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操的诗文，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250首，杂文4篇，前后自序5篇。共命名为《心史》。当时形势，无法刊行。所以，他在晚年将《心史》重缄封，藏于苏州承天寺智井中。

笔下写的虽然是历史的世界，心中念念不望的却是现实的世界。陈寅恪在历史的著述中纳入了自己的兴亡之感。

在《论再生缘》中，陈寅恪说“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他对柳如是的赞扬也是因为独立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出自这样一个“婉娈倚门、绸缪鼓瑟”的少女。

陈寅恪生于1890年，战争、维新、立宪、革命、复辟、民国、抗战，他一一经历。虽然他绝不参政，但是国势日危和社会的动乱却不能不影响到他。他的一生安稳的日子极少，清华国学院做导师的那段日子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时光，他不仅生活安定，还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这些同声相求的朋友，可以互相切磋学问。但不久抗战爆发，父亲陈三立拒绝服药、进食，在日军进入北京第二天后去世。国事和家事的变故让陈寅恪悲痛欲绝。此时，他的右眼已经出现视网膜脱落的痕迹，急需手术。但是陈寅恪决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踌躇之余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用唯一的左眼继续教书。

之后，他辗转西南，在艰苦的条件下，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继续读书教学。战时由于物资不足，经常停电，他唯一的左眼更加模糊。1944 年，左眼失明。双目失明，对一个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学者来说，痛苦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从此以后，他的研究只能以耳代目，以口代笔了。建国以后，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虽然生活安定，但由于双目失明，研究艰难，心情十分悲凉，"身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

这种时候写成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便不可避免地溶入了他的历史沧桑感。

不过这种历史的变迁和沧桑，只是让陈寅恪找到了和陈端生、柳如是建立共鸣的历史契合点，除此之外，陈寅恪采用这个"心史"的典故似乎还另有深意。

郑思肖《心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宋亡元兴，特别是中国的"胡化"。在陈寅恪看来，所谓的"胡化"并不单纯从种族上划分，其文化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他始终深信中国文化有其特质，虽然西风东渐成为时代大趋势，中国文化已然不得不变，但是这种改变不能也不应脱离民族文化原有的轨道。

陈寅恪虽然以史家立身，但其"史识"与"史观"却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在文化思想上，陈氏三代均讲究革新，但陈寅恪却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这并不是意味着他认同咸丰时代的保守思想，而是认同咸丰时代变法思想先驱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稳健前进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社会冒进太快，社会、人心、经济、政治等方面反而不进而退。这种观点在他是一贯的，从不曾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做过改变。1961 年吴宓去拜访他，事后在日记中写道：

>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但时代一直在趋新，不断革命，始终变化，唯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处，

这种巨大的矛盾、反差，怎能不让他叹息呢？

在两部以才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陈寅恪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建了兴亡的“心史”，在柳如是和陈端生的悲剧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叹，使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一个阶段发生了跳跃。

轶事

既非博士，又无著作，如何成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寅师为太老师矣

1929年，陈寅恪改任清华学校中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他上课很精彩，吴宓风雨不误一定去听讲，称其“吱吱精金美玉。”他的助教也去，朱自清还有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听讲，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就不来，因为听

不懂，只有他一写，才知道，哪是德文，哪是俄文，哪是梵文。清华园里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当时下面有个听课的学生梁嘉彬见清华“文学方法”课的教授孔繁也常常到讲堂旁听，于是就和同学开玩笑说：“寅师为太老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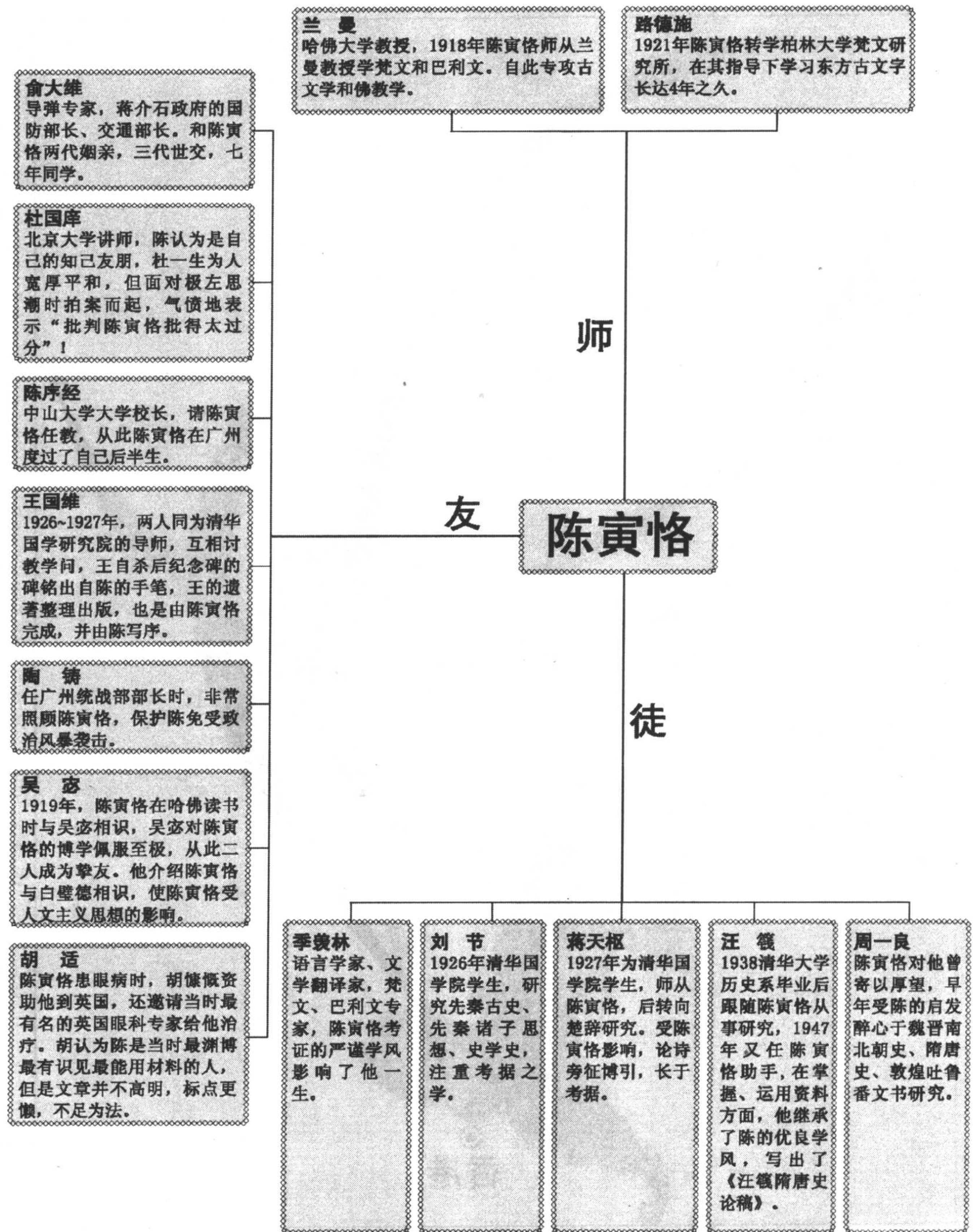
儒将风流

在清华任国学导师是陈寅恪一生中最安适的日子，他性情中的幽默表现出来。一天，国学院的很多学生到陈寅恪家中，陈寅恪说，我有一副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完大家哄堂大笑。因为康有为号为南海圣人，他是梁启超的老师，而王国维当过南书房行走，算是溥仪的老师，所以陈寅恪就戏称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为“再传弟子”和皇帝的“同学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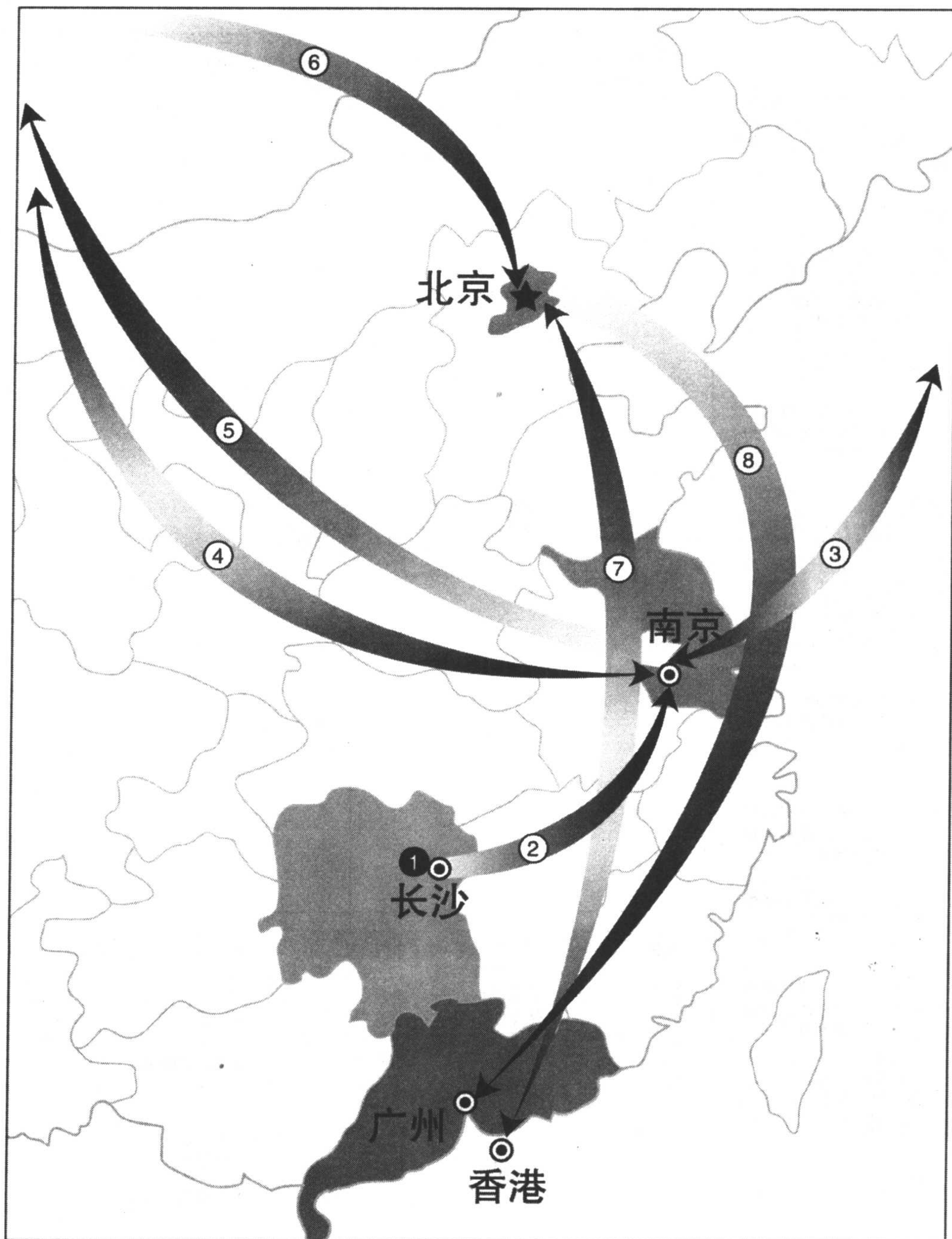
保存国粹

1946年的一天，尖利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只见刘文典（刘文典是驰名中外的国学大师，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是抗战前后的北大、西南联大的一块“牌子”，中外不少学者都听他那如数家珍似的讲课。还在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鸿铭之后。）带着几个学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原来，刘文典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外跑，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地佩服的陈寅恪来，想起他身体羸弱，且目力在慢慢衰竭，行动更为不便。于是，便折回来，率领几个学生，搀扶着我们这位“海龟”往城外跑去。刘文典自恃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因此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陈寅恪关系图


兰 曼
哈佛大学教授，1918年陈寅恪师从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自此专攻古文学和佛教学。
路德施
1921年陈寅恪转学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其指导下学习东方古文字长达4年之久。
师
友
陈寅恪
徒
俞大维
导弹专家，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和陈寅恪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杜国庠
北京大学讲师，陈认为是自己的知己友朋，杜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时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
陈序经
中山大学大学校长，请陈寅恪任教，从此陈寅恪在广州度过了自己后半生。
王国维
1926~1927年，两人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互相讨教学问，王自杀后纪念碑的碑铭出自陈的手笔，王的遗著整理出版，也是由陈寅恪完成，并由陈写序。
陶 铸
任广州统战部部长时，非常照顾陈寅恪，保护陈免受政治风暴袭击。
吴 宓
1919年，陈寅恪在哈佛读书时与吴宓相识，吴宓对陈寅恪的博学佩服至极，从此二人成为挚友。他介绍陈寅恪与白璧德相识，使陈寅恪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胡 适
陈寅恪患眼病时，胡慷慨资助他到英国，还邀请当时最有名的英国眼科专家给他治疗。胡认为陈是当时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是文章并不高明，标点更懒，不足为法。
季羡林
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陈寅恪考证的严谨学风影响了他一生。
刘 节
1926年清华国学院学生，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注重考据之学。
蒋天枢
1927年为清华国学院学生，师从陈寅恪，后转向楚辞研究。受陈寅恪影响，论诗旁征博引，长于考据。
汪 篯
1938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跟随陈寅恪从事研究，1947年又任陈寅恪助手，在掌握、运用资料方面，他继承了陈的优良学风，写出了《汪篯隋唐史论稿》。
周一良
陈寅恪对他曾寄以厚望，早年受陈的启发醉心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陈寅恪人生轨迹图



①湖南长沙。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家学渊源，少时即能背诵《十三经》，且每字必求正解。期间随祖父任职不断搬迁，先后至湖北、湖南长沙等地。

②长沙——→南京。1900年，随父搬至南京。6月祖父辞世，父亲不排斥西学，于私塾外办家学堂，讲授西学。

③南京←——→日本。1902年，13岁随兄陈衡恪自费至日本留学，学日语，对日本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三年后因脚气病，回家疗养，入复旦公学受西学教育，同时亦终日埋头佛书和古籍中。

④南京←——→欧洲。1909年—1914年，先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受历史语文学派影响，重视语言学习；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西欧各国语言文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就读。

因一战爆发，被江西教育司召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患神经衰弱失眠、消化不良等症，但换得江西省官费留学资助。期间到北京，任蔡锷秘书，参与讨袁。1917年为侍奉父母居住南京。

⑤南京——→欧美。1918年底赴美国哈佛留学，主修梵文、巴利文、希腊文等。1921年9月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藏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整个留学期间，不求任何学位，完全为读书而读书。

⑥柏林——→北京。1925年，经梁启超推荐，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主要致力于研究佛典的翻译及汉民族和西北民族的交往史，此时他的语言积累起到了关键作用。1926年，王国维自杀，做铭文倡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成为其一生的行为准则。

⑦北京←——→香港。抗战爆发，随学校迁往西南联大，视力开始出现问题。1940年至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右眼视网膜已现剥离，困难中写成《唐代政治史略论稿》。

1942年6月珍珠港事件后辗转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2月底始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学。生活艰苦，眼疾恶化，次年双目失明。1946年底回清华继续教学研究。内战继起，心情沉重。

⑧北京——→广州。1948年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到广州任教。1954年，因坚持思想自由，拒绝北上任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直对陈寅恪照顾有加，“文革”前未受冲击，全心撰述完成《论再生缘》(1954)和《柳如是别传》(1964)。“文革”后，陶调往北京，陈寅恪开始遭受批判，1969年10月7日被折磨而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

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王国维

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

——钱穆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确是个卓识。

——郭沫若

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余英时



顾颉刚既是『古史辩派』的领军人物，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祖。图为一九五七年顾颉刚（中）及其弟子谭其骧（左）、侯仁之（右）在青岛湛山寺合影。

一夜成名的“顾老板”

与“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后半生多无所成。对于这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以“江郎才尽”加以解释，但是阅读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巨大反差的命运转折中，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顾颉刚学术上的黄金时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从天而降，“顾颉刚”三个字一跃而起。当时的知名学者纷纷给予这个无名后辈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陆懋德说，《古史辨》第一册“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于青年心理者甚大，且足以使我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拱手把他让到了古史学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来了几十位学者加入到了古史学的研究潮流。钱穆形容顾颉刚当时的知名度说：“《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转述，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当年7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担任文科主任，聘任顾颉刚为国文系教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又让他去换聘书，改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的短短两个月内，顾颉刚的“学术地位突高”，“故而称谓亦须改变”。当时，顾颉刚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了一级，与沈兼士、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这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古史辨》中有一个大胆的观点：“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一经传讹，被舆论简化为“禹是一条虫”，虽被一些学者作为讥笑的口实，但由此传播更快更广。一向喜爱读史的毛泽东，当时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大约

也风闻其事，记住了顾颉刚的名字，抗战之初的1938年，曾将一册《论持久战》寄赠顾颉刚。1952年，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当陈毅提到顾颉刚生活困难时，毛泽东立即就想起"禹是一条虫"的故闻，于是一句话就把顾调到了中科院学部工作。

1934年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杂志，开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迎来了大师级的声望，前来归附者不计其数，今天历史地理学界几乎所有著名学者，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韩儒林、张维华等，全都是顾颉刚的学生，也全都是当年"禹贡"学会的成员。在民俗学、民族学、文献学、图书馆学、方志学和目录学诸领域，顾也都有一批追随者。顾颉刚颇有乃师胡适爱才如命的性情，所以"每到一处，这一处的学生就有许多归向到我一边来"。身边一时英才荟萃，胜友如云。

他当时的人马至少有三套：燕大历史系（1936年他出任主任）一套，北平研究院（1935年他出任历史组主任，任用了一大批门生）一套，禹贡学会一套。有人说，自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学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此话有些言过其实，但是顾在古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的"势力"确实牢不可破，声名如日中天。

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手中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左手有美庚款，右手有英庚款。都财力雄厚，有能力网罗人才。而顾颉刚没有这些资金背景，除了自己的教授薪金，就只有到处化缘。之所以被称为"老板"，与其骤得大名关系密切。

恐怖的家庭教育

顾颉刚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红"了30年，但之后的30年，顾颉刚在学

术上基本属于停滞阶段。30 年间，奉上方之命标点了《资治通鉴》、《史记》、《二十四史》。顾颉刚比较下功夫的《尚书》的整理、校勘、注释，也是中科院学部历史所和中华书局下达的项目。该项目始于 1959 年，顾至死也未能完成。此外，他的大量时间便花在了各种会议、发言、自我批判材料的撰写以及被批斗上面。晚年以及身后的知名度也仅限于古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界，远不如青壮年时期的声名远播。

少年暴得大名，与老来几无所成，固然与时代环境变迁有关，但个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强弱，强度不同，取舍不同，得失各异。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形容父亲的性格有两面性：外貌"十分柔和卑下"，生性却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听人家的指挥"。这是自家人语，在外人看来，并不十分恰当。

一个人性格中的"内核"多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顾颉刚的"十分柔和卑下"，来自于极其严厉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子虬公长年在外，母亲性格异常，对顾颉刚严厉无比，动辄就打，"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3 岁的时候，顾颉刚半夜尿了床，母亲就把他从床上扔了下去，疼得他痛哭不止。从那以后，顾颉刚就和他的祖母一床睡觉，直到 18 岁结婚。所以在顾颉刚幼小的心目中，母亲不是"母亲"，而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青奶奶"。

7 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生活照顾和家庭教育就由祖母承担起来。

祖母对顾颉刚有慈爱的一面，但严厉时和母亲一样。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用点心招待客人时，客人就分了一块点心给顾颉刚，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离去后，就关起房门把顾颉刚痛打一顿，直打得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人家吃东西。

有一次，家里的女佣上街，给顾颉刚带了一点广东饼和橄榄，顾颉刚兴高采烈地接过来，刚要吃，就被祖母发现了，一把夺过来全部扔上了房顶，顾颉刚禁不住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12 岁的顾颉刚被人拉去做媒人，在参加喜筵的时候大醉，全部吐在了人家的新床上。被人背回来后，祖母就把房门关起来，不让他上床，让他在堂屋里哭了一个通宵。

祖母对于顾颉刚的要求是：落到桌上的米粒要拣到碗里去；“菜过饭，不是饭过菜”，夹菜不许多；不到大寒不得穿棉衣。

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年幼的顾颉刚每当走过稻香村、采芝斋或点心铺时，再也不敢买零食吃了。

祖母的教育还有一“招”：每天临睡之时，祖母要求顾颉刚检讨一天的行为，如果做错了事，像说了谎话、脏话，或者和小朋友打架等等，便叫他写在纸条上，贴到帐顶上，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他把纸条上的过失诵读几遍，表示悔过。犯了再犯，要另加体罚。

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艺术品”之说，自然包含他对祖母慈爱的一面的报答感激之情，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严厉的家庭教育对顾颉刚个性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顾颉刚 6 岁入私塾，一直读了 8 年，读完了《四书》以及《诗经》、《左传》，《礼记》也读了相当一部分。私塾的张老师是祖父的朋友，对顾颉刚格外严格。《大雅》和《颂》的句子很难念，顾颉刚没有兴趣，可是越怕读，老师就越逼他读，念不出时，就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就乱打他的头。成年以后，每每想起来，顾颉刚依然感到战栗和恐怖。

顾颉刚出生时，祖父为他算过命，说他命里缺土、缺金，所以起名为诵坤，字铭坚。意思是希望他的个性中多一些坚定、硬气的成分。然而这样的教育，虽然使顾颉刚打下了很坚实的国学底子，行为更为规范，但是语言迟钝、手脚笨拙。6 岁时还要女佣喂饭。这也是传统家庭教育的利弊两面，只不过在顾颉刚身上更加极端而已。

卑柔下的桀骜

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

像许多民国学人一样，顾颉刚生于离乱之际。两岁逢甲午之战，6 岁逢戊戌变法失败，8 岁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2 岁逢日俄战争。14 岁时，国内革新运动勃发，开新式学堂，放足，造铁路，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等。在这样一个新生力量萌动的时期，顾颉刚这样一个内心总有冲动的人便活跃起来。当时梁启超的言论风靡一时，顾颉刚受到感染，“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那时的顾颉刚最希望做时务策论，爱借题发挥。

武昌起义爆发后，顾已无心念书，天天和同学们传阅上海的各大报纸，关注时事。11 月 4 日，上海光复。第二天，苏州巡抚改任江苏都督，宣布江苏独立。顾颉刚和同学叶圣陶兴冲冲地跑到巡抚衙门，看到整齐束装的士兵和书有“兴汉安民”的长方形白旗临风飞舞，“觉得前途有无穷的希望”。随即参加校中学团，胳膊上围着白布，背着枪，腰缠弹夹刺刀，巡逻于街巷和城头。受革命潮流涌荡，剪去发辫，编印报纸。1912 年 1 月，加入江亢虎[①]在上海创立的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担任文书干事；12 月参与组建天津支部。

“五四运动”爆发，当时顾颉刚正在苏州办理婚事。虽然没能亲身参与，但热情高昂，去信傅斯年、罗家伦两位先锋，劝其将风潮扩大。“此刻举国民气渐渐的腾起，正可就此结合为一国的中坚，至于营私卖国得官僚武人政客

---

①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曾任清政府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1911 年 8 月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同年 11 月成立中国社会党。1939 年协助汪精卫筹建伪政权，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54 年病死于上海狱中。著有《江亢虎文存初编》等。

正可就此为肃清的起点。""肃清"这样的字眼，从顾这样一个自认"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口中说出，恐怕仅此一次。

1931年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次年1月，顾颉刚趁寒假之机赴杭探亲，"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交通阻隔，因此滞留杭州4个月。他看到，每有前线消息贴至墙上，提菜篮的、拉洋车的、抱小孩的，皆聚精会神阅读。一天讹传日本白川大将阵亡，杭州城里放了半天的爆竹进行庆贺，比过新年都热闹。市政府说要送粽子给前线兵士，很快就捐来数万只；说要送炒米，一会儿功夫就是数万袋。有一天他到虎跑寺，看到和尚们在组织救护队到前线去。还有一些道士，也在他居所巷口的关帝庙内打醮（道士祈福和祭祀的一种仪式），祈祷和平。热血沸腾的顾颉刚看见这种情形，顿时觉得民心可用。"一地如此，他地亦必如此，我不信中国是终于失败的"。他提议学校以专业特长参加救国运动："国文系可以编民众读物，史学系可以编中国民族史，外国文系可作国外宣传，教育系可深入民间去……"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的中国教职抗日会，担任宣传干事。成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大鼓书词，教育民众。通俗读物编刊社原本叫"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其刚烈可见一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顾颉刚还与燕大同事分别致电国民政府和宋哲元，勉励其抵抗日寇。

说到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

"桀骜"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倔强"，用在学术研究上则可以理解为"从己不从人"，不惟不从同时代的学者，也不从古人之说。

中国的传统学术，源自战国时代的诸子学说，昌盛于汉代，然后经宋代学者的"理学"、清代学者的"朴学"，传至民国一代学人手中。这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传递，而是不断怀疑与批判前人观点并加以创新的过程。比如始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终于康有为、章太炎的"今古文经"之争，历时千年，一代学人否定前代观点而始有建树。这种"否定"所蕴含的精神，无不是

"从己不从人"，无不是内在的桀骜性情在作支撑。

顾颉刚性格当中的"桀骜"基因，在怀疑古人、古书方面得到了极端充分的展现。1913年考入北大之后，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叛逆"性逐渐显露出来。他经常被毛子水拉到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听后十分钦佩。但对于章他也禁不住要抨击，并且想努力去超过他，起了个笔名"上炎"。为此常常彻夜读书，就此得了失眠症。

崔述的观点是顾颉刚学术思想最直接的渊源，但是，他认为崔"仍不彻底"，他把以往所有学者的疑古辨伪做了彻底的清算，将"盘古、三皇五帝"等原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一笔划入传说，推倒中国人的祖宗观念。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就把经学彻底地定位在史学的位置上，成为革命性的一环。当时的人们无不以桀骜、激进视之，从"禹是一条虫"的时代关键词就可以想见。

桀骜中的无奈

然而，说顾颉刚"桀骜"固然不错，但说其"不驯"恐怕并不是很准确。

其实，顾颉刚的"桀骜"在碰到环境压力时则往往生出许多的"无奈"。

1912年，身为中国社会党党员的顾颉刚革命热情高涨，怕家人阻拦，"未告知祖母妻子实情"，"托词"北上，意志似乎很坚定，但当父亲从南京赶到北京，潸然泪下，动以亲情，顾颉刚便"难以拒绝"，无奈南返，并听从父意报考北大去了。

顾的第一任妻子吴徵兰生病后，顾颉刚在北京多次去信哀恳家人为她治病，但父亲在外，继母在家则爱钱如命，暴戾专横，祖母又与孙媳性情不合，故一直拖而不治。顾颉刚虽然性情中具有革命性的冲动，虽然在最高学府中具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面对家庭的压力，却没有反抗的能力。

回到家里他也没有办法，十分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子死掉。至此，顾颉刚对家庭的怨恨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发誓不再续娶。

但是祖母和父亲"垂泪相劝"，希望他延续香火。面对垂垂老泪，他"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亡妻入殓的次日，父亲就来商议续娶之事，他以心情不好为由推托。但随后休学期间，在医生、家人和纷至沓来的媒人的劝说之下，虽然觉得愧对前妻，但无奈之下，"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了"。

对顾颉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张静秋。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病死于1943年，一年之后，顾与中学教师出身的张静秋结婚。张静秋抗战胜利后曾任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处事极有主见，重要时刻每每迫使顾颉刚做出选择。1948年秋天，顾颉刚在兰州大学教书，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他写信给张静秋请她到西北来，而远在上海的张静秋则要求丈夫回到上海来，双方相持不下，张静秋发去电报一封，称腹中胎儿有早产、难产迹象。这一下，顾颉刚只好匆匆飞回上海，下飞机后才发现上了妻子的当。

1963年，国内外形势日趋紧张。顾颉刚在连续出席了学部会议和政协会议后便血住院，后赴青岛休养。精明强干的张静秋为顾全子女前途，希望丈夫能够跟上时代，因此经常督促他注意政治学习。顾颉刚在回复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你劝我早归学习，赶上这大时代，我何尝没有这要求，只是我的身体已像漏水的船，经不起大风大浪了……看你十二日的来信，好像嫌我在这儿享受舒适的生活，不做'大诰'和'孟姜女'两序，不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连'四清'[①]也没参加……"当时，顾颉刚已经73岁，多次便血，实在是带病延年。但在妻子强烈督促下，无奈只好加紧政治学习和参加运动。

---

①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次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准备。

1964年底，顾颉刚在政协小组会上提到了他和学部历史所所长尹达的矛盾，回家之后说给妻子听，张静秋大怒，立刻召集三个女儿批斗他们的父亲，无奈的顾颉刚为此写了检讨书。

1966年7月，学生运动轰轰烈烈，顾颉刚还在家里修改《大诰译证》，张静秋每天监督他开会、读报，不许他接近古物和古籍。7月6日日记："静秋禁不令吾读旧书"；16日日记："静秋禁止予看古书"；31日日记："静秋天天责备我不好好学习政治"。为此，他在里屋整理书稿，而在外屋摆放好《毛选》、《语录》以及报纸，随时准备学习。当年8月，红卫兵来抄家，将所藏数千张照片及数千封信札烧毁。红卫兵走后，顾颉刚又找出许多信札，张静秋担心旧信里有不合时宜之言，入冬以后借生炉子之机想全部烧掉。其中有王国维与顾颉刚讨论《顾命》一信，顾颉刚恳请留下，张静秋不许，几经争执方得幸存。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女儿顾潮发现在顾颉刚1955年1月份的日记中夹有被撕毁的一页日记残稿。但这一页内容仍由顾颉刚补抄后订入册中。起初顾潮不明白为什么，后来看到学部历史所退还给顾家的顾颉刚交代材料中，有一份1968年5月27日张静秋写的一份检讨书，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页被撕掉的日记上记载有顾潮的舅舅（曾任国民政府县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事情，顾颉刚有对当局不满的言论。张静秋"私心一闪"，随手就撕掉了那页日记。顾颉刚很生气，张静秋就让他重抄了一遍，但无奈之下，顾只好把那段不满的话删去了。后来张静秋向历史所交待了这件事情，并把所删掉的文字另纸附在了检讨书后面。

应该说，以上这些事例中，顾的家人出于家庭的考虑，动之以亲情，甚至如张静秋"挟"之以亲情，都不难理解。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顾颉刚有太多的"无奈"之举。亲情的压力之下，桀骜之态顿失，卑柔之性复萌。

结怨鲁迅

同事、朋友之间的恩怨，有时甚至是朋友们的一句话，对顾颉刚的行为

都有很大的影响。为此他也常常生出许多无奈之举。

1926年，顾颉刚赴厦门应聘之后，川岛（章廷谦）托鲁迅和顾颉刚推荐其到厦大任教。二人均认为此人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决定不推荐，顾颉刚还特别提醒林语堂不要聘任川岛。谁知林语堂后来偏偏聘请了川岛。于是顾颉刚便回信川岛说“事已弄妥”。鲁迅知道后，便骂顾颉刚手段阴险。其实是顾内心虽有主张，不如鲁迅坚定而已。二三十年代的北大学人中，尽管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环境中各讲各的，但是仍有派系之分。当时两个最大的派系是：胡适、陈源是“英美派”的中坚，“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二马（马裕藻、马衡）、鲁迅、周作人等是“法日派”的中坚。由于顾颉刚是胡适的弟子，所以难免被当作“英美派”的人（其实顾根本没有出过国）。鲁迅对顾颉刚的成见大概由此形成。

当林语堂与厦大校长林文庆因办学方针不同闹僵提出辞职后，鲁迅也提交了辞呈。离开厦大后，鲁迅受聘中山大学。傅斯年也延聘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顾颉刚不愿离开厦大，傅斯年去信说，“你如果不来中山，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怎么面对千万人的谴责呢?!”傅斯年与顾颉刚同为胡适的弟子，二人曾是北大室友，惺惺相惜，友情深厚。顾颉刚本来在马叙伦、蔡元培的劝说下决定留厦大，傅斯年这么一说，再加上鲁迅已经放出“顾来我即走”的话，同时川岛也在挑拨他和鲁迅的关系，感到“几面夹击”，“走投无路”，无奈只好投奔中大。

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之后，鲁迅果然离开。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顾仍然受到各方面的攻击。1928年分别接到燕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无奈之下，顾颉刚就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请。傅斯年极力反对，责备他“忘恩负义”，这是以往日情谊相挟。但顾决意离开，二人早年的友情出现裂缝。顾颉刚已经牺牲了和傅斯年的友谊，本应立即北上，但是经过副校长朱家骅和学生们的挽留，又感“相知之深”，答应再留半年。1929年2月，则趁正副校长戴季陶、朱家骅都不在校时携眷离开了广州。自北京至厦大，再至广州回北京，顾颉刚为友情、压力所累摇摆不定的特征表露无遗。

顾颉刚在学术风格上与他的老师胡适很相似，那就是“开风气”，涉足学术领域颇多，但他并没有胡适、傅斯年那样的官方资金背景，因此生活上和事业上经常处于困顿状态，这一情况，也经常使他作出并非本心的事情。

为了使通俗读物编刊社维持下去，他在 1936 年 1 月找到当时的交通部长朱家骅，朱表示支持，但说顾不是国民党员，党内不能信任，能否入党？顾颉刚只好加入了国民党，从朱那里搞到了 2 万元经费。

1948 年，徐州被解放军攻陷，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大选择时刻来临。此时的顾颉刚却茫然得很。先是决定赴广州，自荐于中山大学。郭绍虞邀请他同去台湾东方大学任教，他遂改变决定，应允下来。然后又有人转达郑振铎的话给他，“转告颉刚，不必东奔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这一来，顾颉刚就采取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凶吉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听之于天而已。”就这样，在大选择的时刻，顾颉刚以不选择的方式做了“选择”。

由于顾颉刚曾经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过职，所以，1949 年中国新史学会的筹备工作并没有邀请他参加。心中自是不快。在筹备上海分会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从中寻找自己的工作依据。

“批本师”

章太炎在参加排满革命后，曾受到恩师俞樾的严厉呵斥，认为章太炎毁坏经义，不肖于师门，章太炎就写了一篇《谢本师》，以示虽然恩情不忘，但此后不从老师之说。后来，他的两个弟子周作人和钱玄同一个认为老师思想落后、一个不从老师的“古文经学”，分别作了“谢本师”。这一幕也发生在顾颉刚身上。不过不是“谢本师”，而是“批本师”。

1952 年前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大公报》馆举行了“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顾是被点名要求参加，并被要求发言。会上气氛并不激烈，其他发言人仅针对胡适而没有旁

及作为弟子的顾颉刚，但顾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他在发言中说自己“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划清敌我”，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

没想到3个月之后，《文史哲》3月号上发表了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各一篇文章——《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由自己所感受到的压力，顾颉刚自然能体会到童、杨两人所受的压力。“（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这句非常体谅的话，让童、杨二人能有所解脱，同时也解脱了顾颉刚自己。当年禹贡学会的成员之一于鹤年看到这两篇文章后，为顾颉刚抱不平，顾在给他的复信中说：“《文史哲》上之两篇文字，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不知于鹤年是否同时为胡适抱不平，但顾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写照。曾经是授业解惑如坐春风、执弟子礼恭敬有加，而今以无情之打击进行回报，虽然是压力使然，毕竟不能使被批判者释怀。“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一句就颇有怨愤和讥讽之意。在给王树民的复信的抄件上加了如此按语：“一人之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其不痛快溢于言表。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胡适则屡屡拿出顾颉刚对他的批判文章公之于众，表示对当时的当政者的不满。师徒三代人的情谊似乎荡然无存。顾颉刚的另一位弟子张中行对顾有过微词。他曾坦率地表示：“我不愿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在最后30年，顾颉刚历经“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但在同等地位的人物中，所受到的冲击并不是最大的。据辛亥革命的宿将何遂说，曾经看到最高当局的指示，运动中“因保存戊戌变法之资料而得保护者，康同璧是也；因参加同盟会及辛亥革命而得保护者，章士钊、叶恭绰及何遂是也；因参加五四运动而得保护者，郭沫若、范文澜及顾颉刚是也。”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顾颉刚在历次运动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的无奈与行为上的顺从，也起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一生只宜书为伴

写到这里，以顾颉刚的性格为坐标往回看，可以看到《古史辨》的产生，固然有顾颉刚本人的卓绝努力，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方法带入20世纪的中国，通过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传递给顾颉刚，而顾本人又从古代历代学者中汲取了怀疑、批判的理性主义遗产和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中西两种学术精华在顾颉刚身上结合，又引发了潜藏在他本性中的性格力量，于是获得一片新天地。

而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又与蔡元培在北大所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密切相关，校风由蔡元培开始大变，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思潮。

时代的洪流，宽容的环境，得风气之先的老师、同学，彻底地将顾颉刚内心的那种革命性冲动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其精神达到了一生中的最佳境界。

“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顾颉刚读书笔记》)

“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颉刚又说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许我们比宋代学者作进一步探索——解除了道统的束缚；也许我们比清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学派的束缚。”

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时代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顾颉刚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但是同样的时代却有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这其中，个人的性格起着关键的作用。顾颉刚自幼便是一颗读书人的种子。他一生最适宜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读书，一是教书。他像他的老师胡适一样，以奖掖后辈为人生快事，一生弟子如云，都是各个学科中的当家人，堪称天下为人师者的楷模。而作为读书人，自6岁起，至87岁去世，无论革命、战乱，

还是政治运动中，他都片刻未离开书本。真可谓“一生只宜书为伴”。

1980年12月25日，是顾颉刚生命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他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大概他已经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上午对女儿顾潮说：“我快要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到了下午，他又坐在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书中夹着一些作记号的纸条。因为有人向他约稿谈谈我国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①]的材料。晚饭后，顾颉刚又向女儿顾洪说起第二天要写有关黄侃的回忆录。不料半个小时后，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医生全力抢救无效，顾颉刚溘然长逝。第二天，家属在医院整理遗物时发现，顾颉刚已经把日程安排填写到了12月31日。一张信纸上留有手迹：“黄侃，湖北蕲春县人”，“五四运动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学教中文系”，“1936年病卒，年50”，“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

总结顾颉刚的为人治学特点，他的女儿顾潮引用了父亲在《古史辨》自序中的自我定位：在世务上的“平庸”、“急躁”、“优柔寡断”，与研究学问时的“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心，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形成巨大反差，简直判若两人。其实这正是顾颉刚矛盾性格的弱点的外在体现。顾的性格中有独立、桀骜的勇敢倾向，也有柔和而软弱的一面，这两方面特征因环境的变化而时有体现，但由于过于受制于环境，本质上是软弱的。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可以套用在任何人身上，而放在顾颉刚身上，确让人不禁感叹唏嘘不已。一个五四运动中的弄潮先锋，一位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后半生几乎毫无建树，岂不令人黯然？当然，同辈学人也多数如此，这方面似不应苛责，然而，如果其性格中能像他的名字一样多增加一些“土”和“金”，多增加一些“刚性”，即无更多成就，也使风范长存。

①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夏朝以前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说：“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历代注家都说是“古书名”，贾逵说：“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郑玄说，“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

附录：中国传统流变

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至汉代“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开创“官学”之时，政府已没有先秦时期的读本，只好记录上代儒士的口口相传，以汉代的文字——隶书成书。是为“今文经”。后政府多从民间搜罗上古的原版图书，武帝末年，鲁恭王拆除孔子后代住宅时，在墙壁内发现了《尚书》、《论语》等用先秦蝌蚪文书写的经典。这些经典就被相应地成为“古文经”。汉代学者刘歆在帮助父亲刘向（时任诏光禄大夫）整理校对这些蝌蚪文时，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他注意到今古文经存在较大差别，前者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后者则注重文字训诂。他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西汉末年，王莽假借《周礼》托古改制，古文诸经得以立于学官，以与今文经博士对抗。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马融弟子郑玄既习古文经学，又研究今文经学，站在“通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整”而“齐”之。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

郑玄虽然沟通了古今文经派，但是多信谶纬，沟通多不合于理，所以到了三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位“遍注群经”的大经学家王肃与之抗衡，郑、王之学相争四百年之久。

至唐代，孔颖达以古文经家的身份于《周易》用王弼注，于《尚书》用伪孔安国传，于《毛诗》用孔传和郑笺，于《礼记》用郑玄注，于《春秋左传》用杜预注，五经融会贯通，以本书证本书，又是一大创新。

到了宋代，从欧阳修到刘敞，再到王安石、苏轼、程颐、郑樵，最后到朱熹，对汉代经学采取更为激烈的怀疑态度，吸收佛、道思想，使经学哲学化，

以义理论证伦常，创造“理学”。

明初继续宋人的辨伪之学，有宋濂《诸子辨》及晚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

到了清代，汉学因顾炎武的崛起，再为之一变，开创出新的疆域，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其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自汉唐至宋明，虽然也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但都是经学的附庸，这个阶段的学术门派林立，却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一生广览博学，对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都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一点为之后的乾嘉学派所继承；二、提出治音韵为通经义的关键，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乾嘉学派皆用心于音韵文字、训诂考证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学、经学高潮迭起，别开生面；三、在治学方法上善于采用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广征博引，援古论今，批驳谬误，辨正辨误。这也为乾嘉学派所用；四、提倡学术经世致用，反对空论无用的学风。

顾颉刚称，战国、秦、汉之世化古史料为经典，民国学人的人物则是复化经典为古史料。即结束经学开创古史学。其实这一先兆从顾炎武之后的阎若璩就已经出现，他以判断必凭证据的精神，写出《尚书古文疏证》，证明晚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东晋的作品，这一下就把两千余年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典拉下圣坛，被梁启超称为“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与阎若璩同时的姚际恒，疑古的态度比阎更为彻底，他作了160卷的《九经通论》，辨出许多伪书和伪说，可惜失传。

再后来，一个叫崔述的人独行于主流学术之外，孤寂地撰写着100年后才被主流学术界重视的《考信录》。他站在儒家立场上，以“考信于六艺”为标准，通过整理古代史实，揭露汉代所传先秦典籍的谬妄。

与崔述同时代的章学诚则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奋力喊出“六经皆史”，将从前对于经学的界说根本撤销。提出“史学”来和当时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经学相对抗。

到了清代学者俞樾，今古文经兼采，其两大弟子章太炎纯主古文经学，

崔适专主今文经学。与俞樾同时代的廖平崇今抑古，为康有为继承，崔适又引申康有为的学说，章太炎再与康有为抗衡。钱玄同虽是章太炎的学生，却改拜崔适为师。钱玄同与顾颉刚探讨疑古辨伪的问题。

从以上的学术流变看来，顾颉刚的确不是第一个疑古辨伪之人，也不是提出由经学转入史学的第一人。而是自汉至清已经形成一大历史河流，至19世纪末形成经学行将结束、史学已待崛起的大趋势。顾颉刚与这一河流、这一趋势不仅不可分割，而且有所继承，不仅有所继承，更有所创新。

轶事 顾颉刚

献鼎风波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鼎，铭文由刘起釪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

关于这件事，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蒋为什么会大为光火？问题出在九鼎的铭文上。朱家骅的一个政敌看见铭文后，对蒋介石说：最后四句话取首一字横读之，乃"我在献宝"也。川语献宝乃出丑之意，蒋听了果然大怒。

需要说明的第二点是：九鼎铭文的作者到底是谁？虽然在《顾颉刚年谱》1943年1月28日条有"作《九鼎铭文》"的话，但顾颉刚本人却不承认，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申辩说："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鼎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为重的意思。"

顾颉刚这番话既对也不对，铭文的起草者的确不是他，但并不等于铭文的作者就不是他，由于顾颉刚是铭文的定稿者，所以只能署他的大名，而他作为定稿者也就理所当然成了铭文的作者，理所当然要承担文责。

在很多人眼中，顾颉刚是个读书破万卷的书呆子，但为了从献九鼎风波中抽身而出，这个书呆子也显露出他“机智”、“狡黠”的一面。

劳方、资方与𥫗方

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五反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唯一的触动是使顾颉刚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他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想到自己仍是大中国书局总经理，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就形成脚踩两条船的局面，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况且他名为书局总经理，应算资方，但实际不当权，只任编辑部的工作，又应算劳方；当时主持运动者合“资劳”两字为一字——“𥫗”，读音如“糟”，称其为“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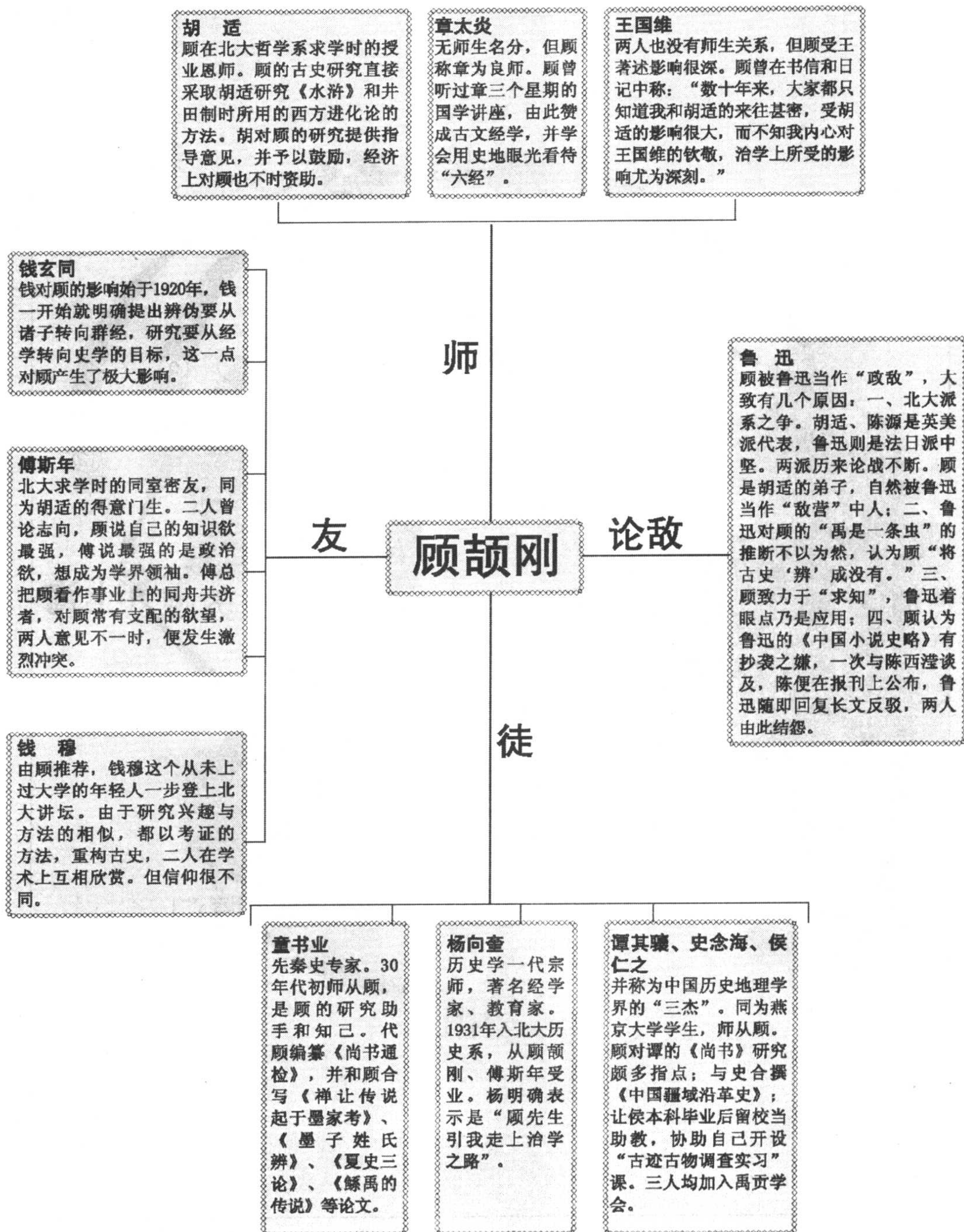
被鲁迅戏称为“鼻公”

鲁迅杂文中频频出现调侃，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的另一个侧面。顾颉刚是鲁迅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糟鼻子。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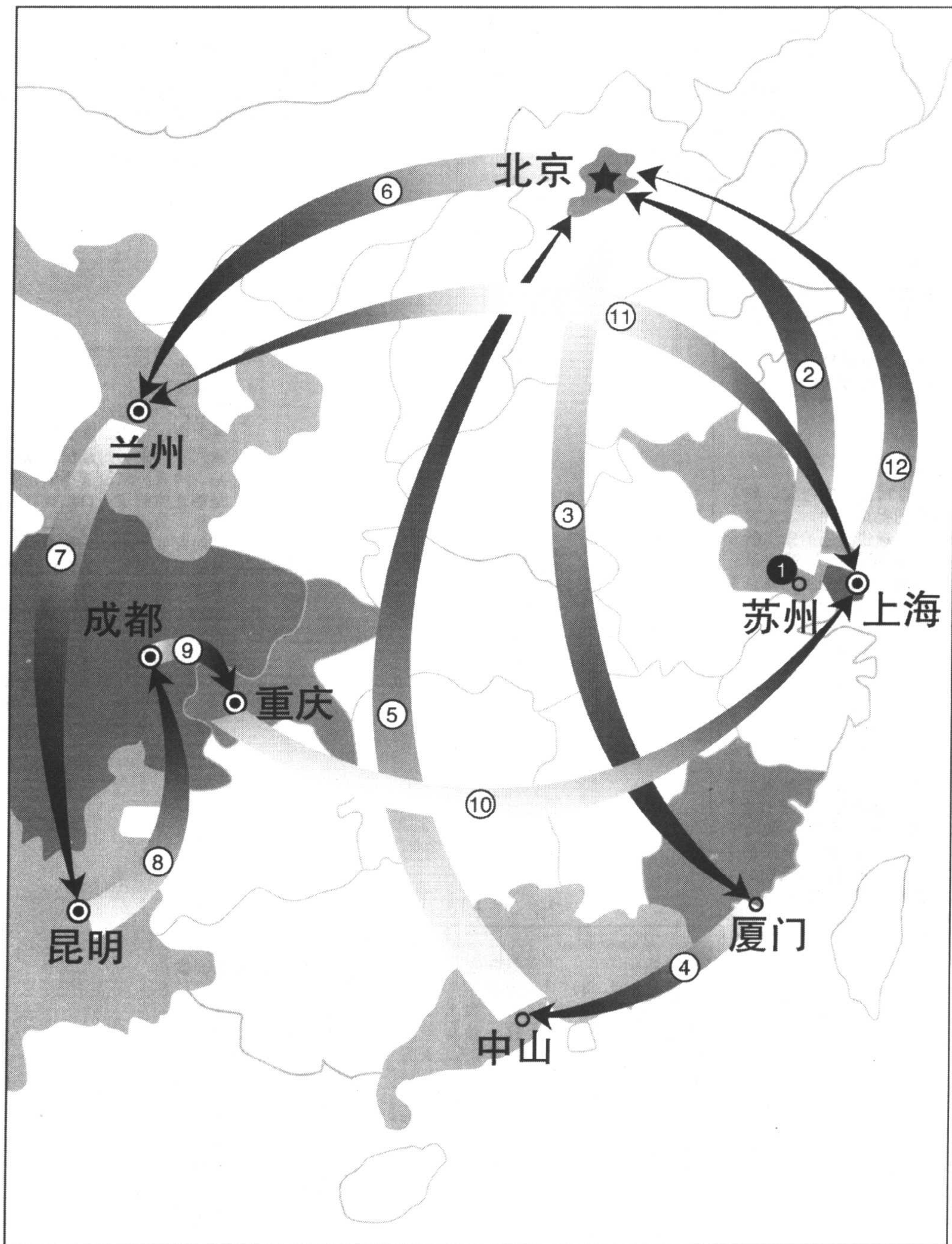
多写少讲，遮掩口吃

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

顾颉刚关系图


胡　适
顾在北大哲学系求学时的授业恩师。顾的古史研究直接采取胡适研究《水浒》和井田制时所用的西方进化论的方法。胡对顾的研究提供指导意见，并予以鼓励，经济上对顾也不时资助。
章太炎
无师生名分，但顾称章为良师。顾曾听过章三个星期的国学讲座，由此赞成古文经学，并学会用史地眼光看待“六经”。
王国维
两人也没有师生关系，但顾受王著述影响很深。顾曾在书信和日记中称：“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
师
钱玄同
钱对顾的影响始于1920年，钱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辨伪要从诸子转向群经，研究要从经学转向史学的目标，这一点对顾产生了极大影响。
傅斯年
北大求学时的同室密友，同为胡适的得意门生。二人曾论志向，顾说自己的知识欲最强，傅说最强的是政治欲，想成为学界领袖。傅总把顾看作事业上的同舟共济者，对顾常有支配的欲望，两人意见不一时，便发生激烈冲突。
钱　穆
由顾推荐，钱穆这个从未上过大学的年轻人一步登上北大讲坛。由于研究兴趣与方法的相似，都以考证的方法，重构古史，二人在学术上互相欣赏。但信仰很不同。
友
顾颉刚
论敌
鲁　迅
顾被鲁迅当作“政敌”，大致有几个原因：一、北大派系之争。胡适、陈源是英美派代表，鲁迅则是法日派中坚。两派历来论战不断。顾是胡适的弟子，自然被鲁迅当作“敌营”中人；二、鲁迅对顾的“禹是一条虫”的推断不以为然，认为顾“将古史‘辨’成没有。”三、顾致力于“求知”，鲁迅着眼点乃是应用；四、顾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一次与陈西滢谈及，陈便在报刊上公布，鲁迅随即回复长文反驳，两人由此结怨。
徒
童书业
先秦史专家。30年代初师从顾，是顾的研究助手和知己。代顾编纂《尚书通检》，并和顾合写《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等论文。
杨向奎
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经学家、教育家。1931年入北大历史系，从顾颉刚、傅斯年受业。杨明确表示是“顾先生引我走上治学之路”。
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
并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杰”。同为燕京大学学生，师从顾。顾对谭的《尚书》研究颇多指点；与史合撰《中国疆域沿革史》；让侯本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协助自己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三人均加入禹贡学会。

顾颉刚人生轨迹图



①苏州。1893年5月8日出生于苏州，时值离乱之世。6岁入私塾，8岁基本读完《四书》、《诗经》、《左传》、《礼记》，因患病自读《汉魏丛书》和《二十二子》，略识古书全貌。后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对旧书产生浓厚兴趣。

②苏州——→北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部，准备学农科。听章太炎国学讲座，思想发生转变，次年转入预科一部，苦读古书。三年后考入北大哲学门，为胡适学识所震动，成为胡的入门弟子。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后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聘为助教。1922年，公开提出"层累说"，引起轩然大波。1924年编辑《歌谣》周刊，出"孟姜女专号"，引起学术界震动。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轰动一时，暴得大名。

③北京——→厦门。1926年，受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研究教授，与沈兼士、鲁迅同事。

④厦门——→中山。1927年，应傅斯年邀请，赴中山大学任教。发起民俗学会，编《民俗》周刊。

⑤中山——→北京。1929年，受聘于燕京大学。次年，《古史辨》第二册出版。"九一八"事变后，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杂志》，开创历史地理研究先河，接连刊出西北边疆专号。1936年加入国民党，与胡适、钱玄同等发起风谣学会。

⑥北京——→甘肃。1937年"卢沟桥事变"，辗转至西北，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

⑦甘肃——→昆明。1938年10月，抵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创办《边疆周刊》。

⑧昆明——→成都。1939年，抵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次年，创办《史学季刊》及中国边疆学会。

⑨成都——→重庆。1941年，赴重庆主办《文史杂志》，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此后，相继担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⑩重庆——→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任教于复旦大学。次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同年脱离国民党。

⑪上海←——→兰州。1948年，赴兰州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年底返沪，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次年，《西北考察日记》出版，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兼震旦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初期，未得政府认可，研究工作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受上方领导保护，在建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未受到过重打击。

⑫上海——→北京。1954年，因毛泽东赏识，被聘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此后近30年间，学术上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受命标点了《资治通鉴》、《史记》、《二十四史》、《清史稿》。发表了《息壤考》、《禹贡注释》、《柳毅传说与遗迹》等论文。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1980年12月25日，因病逝世。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艾恺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

（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牟宗三

梁漱溟的逝世，成为充满『忧患意识』的儒者在历史上的休止符，像他那样能身体力行，为儒家精神做见证的人物，今后可能很难再见。

——韦政通



梁漱溟逝世后，长子梁培宽说：父亲临终前最感欣慰的，不仅仅是作为旧中国的民主斗士和新中国的犯颜直谏的『忠臣』而留下声名，而是他的思想学说得到了年轻一代的理解。图为一九八六年重阳节，梁漱溟（左）九十三岁生日时，与梁培宽在紫竹院公园大门合影。

晚钟即将敲响

梁漱溟的晚年即将来临。悄悄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早在1976年，即《人心与人生》基本写完时，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给儿子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培恕吾儿：

春节过后，我便是八十四岁的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多活几年（多也，少也，一切无所容心）。对于身后之事颇拟略作交代部署。你们两兄弟中，培宽有病在身，又居处稍远，不如你方便，所以先向你讲一讲，希望你空时多来我处作一些长谈。

父手字

他对尘世厌倦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1981年6月，终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他已不再需要为尘世的事挂念。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梁漱溟晚年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天风大，气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后，即感身体不适。4月25日，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这几乎等于判了他的死刑。

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他把长子叫到床前说："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听其自然发展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

接续三百年儒学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如此狂妄的还有章太炎,他说:“吾死,中夏文化亡矣。”

章的狂妄来自于自信,他觉得同时代中人,只有他继承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即使是他的学生,也未有全部学到手,因此华夏文化会随着他的去世而灭亡。梁的自信则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接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二是发展。由于清代学者关注的多是考据之学,对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挥,因此在新儒家看来,儒学可以算得上是断绝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现才有了新发展。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①]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

①1941年,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展开》一书中真正提出新儒家这一概念和初期理论。1957年,张君劢在纽约出版英文版《新儒家思想的发展》,真正确立了新儒家的地位。1958年,由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使得新儒家思潮首先在海外兴起。主要代表人物是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贺麟、张君劢和马 一孚。

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再版了五次，盛况空前。民国学人李石岑曾经描述道：

>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年，销售十万余册，有近百篇论文和十几本小册子同他辩论，大打笔墨官司。这样一闹，他这部书，居然翻成了十二国文字，把东西两个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五年之内同他通讯的信札有五千以上。

梁漱溟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教书，是因为他写过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但是他并没有上过大学，自信心不足，学生们对这个不到30岁的“中学生”身份的老师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很快，同胡适一样，他也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讲授“孔家哲学史”的时候，注册学生只有40人，但是实际听课的学生经常在200以上，既有北大的学生，也有校外慕名而来的旁听者。由于听课人数太多，原来安排的教室坐不下，只好临时改在大讲堂进行。梁启超曾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认为“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民国的一种荣耀”。

这本书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普遍关心的问题。冯友兰回忆道：

> 梁漱溟先生……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就是东西文化应该如何定位。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些人把失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产生了，并愈演愈烈，五四时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了

对立的局面，要一方必须抛弃另外一方。

而梁漱溟此时是北大的讲师，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也就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给他的压力：

> 兹数先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即彼时所谓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到压迫之严重。……《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过感觉到痛苦；彷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彷佛自己被敌人打了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

他找到的道路就是儒家。

他对儒家的找寻是有一个过程的。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开始对革命失望，思想悲观，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并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 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在他看来，在军阀混战，人民如处水火之中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大家不要争权夺利就平息了混乱”，从佛教“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见解，是“最错误的”，必须抛弃。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他在遗

书《敬告世人书》中写道：

> 吾固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植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济的死虽然表面上是殉清，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抗议西学传入和传统文化的衰落，他希望以此来唤起人们对传统道德的信仰和热情。

父亲的去世让梁漱溟在悲伤之余，开始反省。在《思亲记》中，他写道：

> 溟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

在这段文字中，梁漱溟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崇佛对父亲造成的伤害。梁漱溟和父亲的关系极好，对父亲几乎是亦步亦趋，他父亲曾经给他起过“肖吾”的爱称，但是他崇信佛教，让父亲十分伤心。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在研习佛学的同时，梁还在中学同学、哲学家张崧年推荐下阅读过一些介绍柏格森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其中一本叫《变的哲学》，主要介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因此在转向儒家时，他采用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理论重新解释儒学，使儒学和西方哲学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有某些相通之处，重哲学而轻科学，推崇直觉，讲究神秘，和宋明陆王心学有契合之处。尤其是直觉，梁漱溟十分推崇。他对直觉的推崇源于对理智的反对。受理智思潮的影响，唯科学论的思想在中国十分盛行，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都是唯科

学论的崇拜者和宣传者。他们主张把科学领域无限放大，从自然推移到社会人生，用自然科学领域中行而有效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一切社会人生的学问，如进化论本来是生物学领域的原则，但是他们将物竞天择的观念无限扩大，认为社会和历史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他们还认为有了科学，哲学和宗教就失去了存在价值，陈独秀曾经在《新青年》中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

梁漱溟则从柏格森那里获得了反对的理论武器。柏格森认为，认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智，认识科学的方法；一种是直觉，认识哲学的方法。理智只能认识静止的物质世界，不能认识永无休止的生命冲动。因此科学和哲学属于不同领域，不能像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主张的那样由前者取代后者。由此他也指出了科学逾越本分带来的后果，他认为科学本身就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不仅会破坏任何自然的和谐，人还会成为自然的奴隶，使人放弃对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导致人性丧失，成为一味追求物欲的动物。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上签字，国内和平无望。失望之余，他回到了重庆北碚，一边讲学，一边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完成了对东西文化及其关系的认识，那么《中国文化要义》则标志着梁漱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回归。

在这本书中，梁漱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由这特殊性出发，中国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秩序的维持不在武力，而在于以道德代宗教，

以礼俗代法律，以教化代政治。

梁漱溟再次凸显了儒家的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将此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

也正是因为对儒家道德观念的关注，梁漱溟在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中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对"人心"的关注上。在梁漱溟看来，人的社会建筑在人心之上，人类的一切成就都是"人心自觉之力"的结果，人自己必须认识人心。人心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是人生命的自然流露，而计划性即自觉是人心的基本特征，人之所以同动物有别就在于人有计划性。这相当于孟子的"良知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回归儒家的清晰脉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定位问题，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树立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中国文化要义》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和西方的不同，进一步回归到传统文化中；《人心与人生》则由社会进一步具化到人心层面。

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之后，梁漱溟觉得自己一生所负的历史使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可以安心离去了。

行动的儒者

在传统文化上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入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是一个积极入世、追求有所建树的人。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 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于是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

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

下层民众的状况更加重了他对革命的失望。“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摔出血来”。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自视颇高的梁漱溟思想极为混乱，对人生感到了厌倦和憎恶。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 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 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 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经过北伐战争建立的南京政府，由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各个大小军阀拥兵自重、战祸频仍。由于国内战争的破坏，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使贫困落后的中国变成民主富强的中国呢？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 1927 年到 1937 年的 10 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

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抗战的时候，为了团结国共两党共同抗战，梁漱溟于 1938 年北上延安，考察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转变是否真诚。在延安他和毛泽东有了数次长谈，认识到共产党抗日的诚意，同时也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和毛会面，给梁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记忆犹新：

> 此番会晤，(毛泽东)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亮称关美髯曰逸绝群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写来如飞。我一边说，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例清楚，句句到题。

然而国共两党的摩擦让梁漱溟忧心忡忡。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了一个调停之法，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方力量，用统一的立场和原则，居中调停。于是在他的倡导下，1939 年 11 月下旬，“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随后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一个政党联盟进一步统一为独立的政党。从此，作为第三方力量，民盟开始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起了重要的调停作用。梁漱溟和共产党的接触也密切起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但梁漱溟并没有认为中国问题就此解决。在 1952 年《我的努力与反省》中这样记述道：

> 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后唯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作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后盾。那么不足重视，亦或不引起敌视：他可能就放平心来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

建国以后，梁漱溟的这种观望态度并没有立刻改变。1950年，毛泽东派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邀请他进入政府，但是他并没有立刻答应。他思考了片刻后，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思考的：虽然共产党以武力统一中国成功，但他并不十分相信中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如果他现在参加政府，就会落在共产党一方，还不如中立，这样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他可以继续为国事奔走。

不久以后，看到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成就，他的思想逐渐发生改变。1950年10月，梁漱溟作了一个《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的发言：

我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但在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却是正确的；我的意见并没有对。两年来，无论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社会风气的变好，几乎多数人都表现出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较比某些具体成绩更重要的。因为这证明路子对了。路子对了是产生那些具体成绩的根本。我到此时不能不相信共产党。

梁漱溟在之后的《中国建国之路》一书中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这种观念：

不管说救国或者说建国，总要解决近百年来的中国问题。近百年间的中国人，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之下，提供了许多解决问题的途径，发起了许多解决问题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其中之一，我亦是其中之一。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

至此，对中国的出路问题，梁漱溟总算给了自己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并不是他提出来的。

外儒内佛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

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1]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少年时代的梁漱溟曾经是功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受清末新学思潮的影响,早在14岁,他便立定了自己心中的价值标准,“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认为人生就是去苦向乐、趋利避害而已。他的父亲梁济虽也曾中举,但最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做文章的人,时常叹息痛恨中国事情为文人所误。这种情绪对少年梁漱溟构成了强有力的引导,他上中学时非常讨厌传统学问和课堂灌输,只着迷于关涉时事的自学。这种功利思想,直到中学快毕业时才发生改变。当时一个叫郭人麟的同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令他折服。用梁漱溟的话说,他“天资绝高,思想超脱,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梁漱溟对他的崇拜到了痴迷的程度,称他为“郭师”,一有空就去向他请教。他还专门弄了个本子,郭讲问题的时候,他就在上面认真记录,题之为“郭师语录”。在郭的影响下,梁漱溟逐渐走出了早期的功利思想,不再轻视玄思的哲理。

前面说过,辛亥革命以后梁漱溟曾在《民国报》当过记者,所见所闻让他大失所望。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在《苦害呻吟录》中曾写道:“今日政界,乃不知下笔将从何处说起,其吾辈自认已无复气力写出此等千奇百怪千险万

---

①熊十力,1885年生,湖北黄冈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并颇有功勋,后因有感于“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并看到“福乱起于众昏无知”,遂立志“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他一度潜心佛学,后转归于儒,以《易》生生不息的动态思想为基础,承继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一系的儒家心学,又参之以王夫之的道器不离观和辩证思维方式,创构起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熊氏的这一思想体系,对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故被当今的研究者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

恶之社会也。”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某议员卖身于甲乙各党，有人代草了卖身文契一张，云：

有专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贵党，连皮带骨，一切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

政治的黑暗让梁漱溟对革命感到了彻底的失望，也让他对人生感到了厌倦和憎恶。

这种厌倦和憎恶，让他的痛苦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使他1912年两度企图自杀，最终以佛教为依归。从此“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并且开始茹素，立定了出家为僧的念头。1914年梁漱溟在写给舅父张耀曾的一封信中说道：“所谓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所谓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

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最能代表梁漱溟早期崇佛的态度。此文缘于黄远生的惨死，属有感而发。黄远生，民国初年的名律师、名记者，当时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后因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不得不避祸他乡，远赴美国，不料在旧金山，却因被视为袁党而遇害。对于黄远生的惨死，梁漱溟深以为痛，他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把“刚找来的真理献给他”，这个“真理”就是“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写成了《究元决疑论》。

《究元决疑论》批评了古今中外各家学说，惟独推崇佛学。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究元”，探求世界的本原或宇宙本体。他认为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空无一切的，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一切学术名言也就因此不可成立，道德行为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是非准则。第二部分是“决疑”，解决好是人应该怎么做。在梁漱溟看来，只有两条路能够提供希望的可能，一是“出世间”，即根除一切七情六欲，与世隔绝，一心一意从事精神上的自我铸造。普通大众做不到，可以退而求其次，也就是“顺世间”，追求与外在实际的通常准则一致的世俗生活。

由此，梁漱溟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开出了一副医治精神空虚、不安和焦虑的药方。

从1917年开始，梁漱溟的佛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他的出家意念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五四新文化的冲击、父亲的去世等等。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由佛到儒的转化，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佛家的思想。晚年他曾经这样声明："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变的是我的生活。"也就是说在行动上，他采用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国家危亡，他不能袖手旁观；但在精神上，他仍然是一个佛家。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梁漱溟虽被人们看成新儒家，但实际上在这部书中，却表达了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最终认可。他从文化路向上将东西文化划分为西方、中国和印度三大系统，同时还提出了文化三期说，认为人类文化会沿着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方向逐步前进。西方文化之所以现在盛行，是因为现在人类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将会复兴。而最终拯救人类、解脱人生痛苦的，将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它是人类未来文化的代表和最终归宿。

另外，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他在论及乡村运动时曾经说道：

>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

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

>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泊淡和寂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与世隔绝的隐遁状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惨痛经历，使得他重新思考世间的意义，对佛家的"出世间"重新定位，在儒、佛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就是他的《儒佛异同论》。

《儒佛异同论》写于196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梁漱溟住的四合院被红卫兵占领，夫妻二人被赶到南小屋去住。刚刚开了头儿的原稿不知下落，所有的参考书籍和资料也都被红卫兵付之一炬。每天白天他还被迫打扫卫生，或不时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只能是晚上坐在阴暗、潮湿、闷热的南小屋，忍受酷暑和蚊虫叮咬，专心致志写作《儒佛异同论》。

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是儒佛的异同点。在他看来，儒佛两家的思想，虽然一属出世，一属入世，而且从最基本的立场看，儒学认为人生是真实的，讲乐，或苦中求乐；佛学以人生为虚妄，为苦，应解脱悲苦，但二者又有明显的相通点。其一，两家都是对人说话，关注的都是人生的问题；其二，两家所说的内容都是关于生命修养的学问，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自己修养的一种学问。因此，儒佛两家虽然不是完全相通的，但是大方向却非常一致。如，孔子有"人生七十不逾矩"的说法，而佛家则常说"得大自在"。

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

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入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入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

轶事

妹妹不给我穿裤子

梁漱溟上有一兄，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别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同时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6 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家人听后哈哈大笑，这件事情也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

既无家室，何言回家

1934 年，梁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他矢志不再娶。没想到 1943 年，梁从香港避难到桂林时，已经 50 岁的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爱情。他偶然遇到了陈淑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据说，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

婚礼上，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讲了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话：“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如此自恃

1942 年，日本占领香港，在偷渡离港时，梁的同行者都面有惧色，惟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

当没有问题。”脱险后，给他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里面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与毛主席当面庭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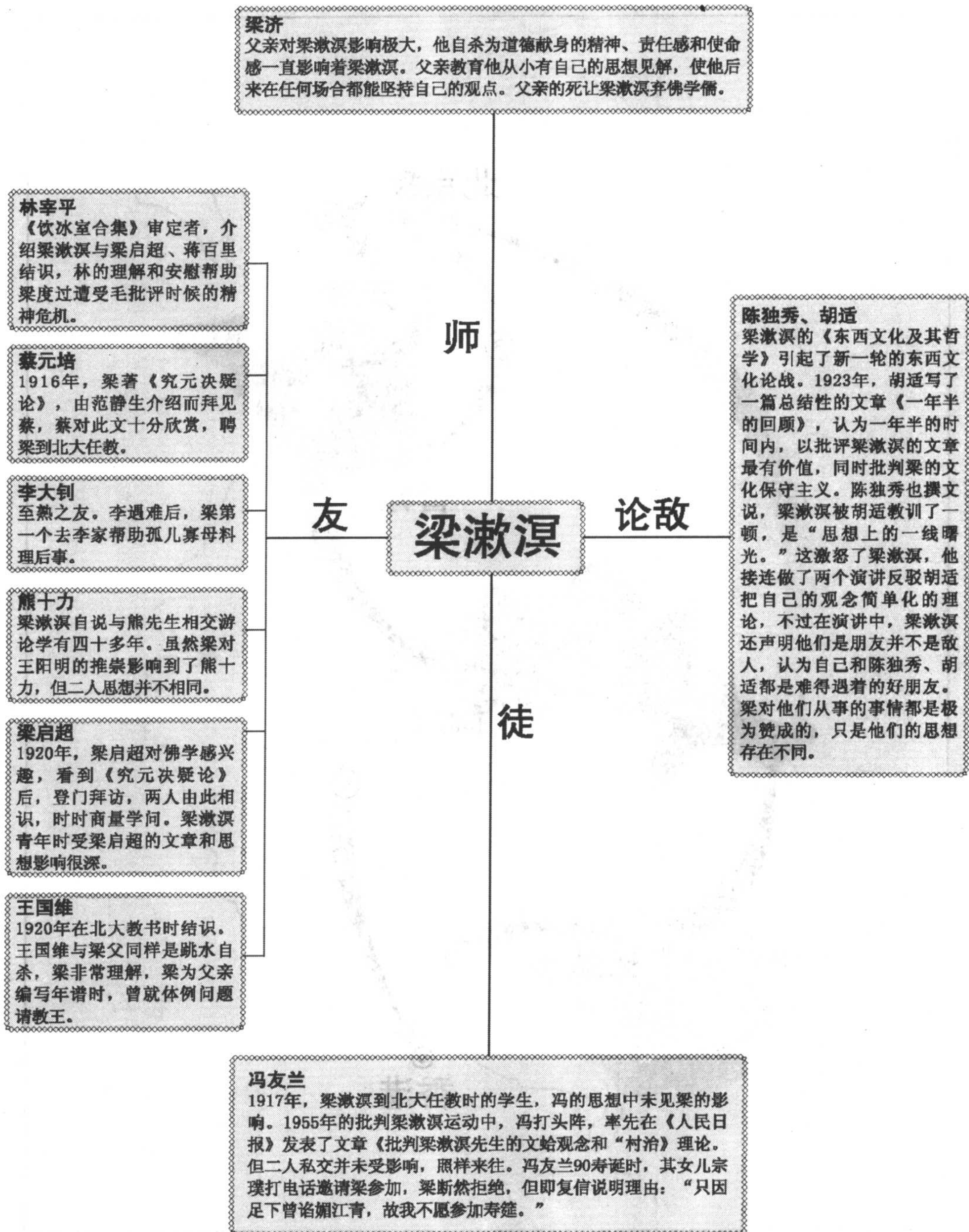
梁漱溟先生以他的耿直而为人敬重。他的颠峰之作是1953年在政协会议上面的发言，而后，被周总理批评为“政治上一贯反动”，毛泽东说他：“你虽然没有以刀杀人，却以笔杀人的”、“人家以为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下一届还推举你参加，因为你能够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然认识糊涂却是善意，可以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受了这个批评之后，梁漱溟当面跟毛泽东争论起来，认为毛泽东误解他的意思。于是他成了在那个年代里面，唯一一个敢当面指斥毛泽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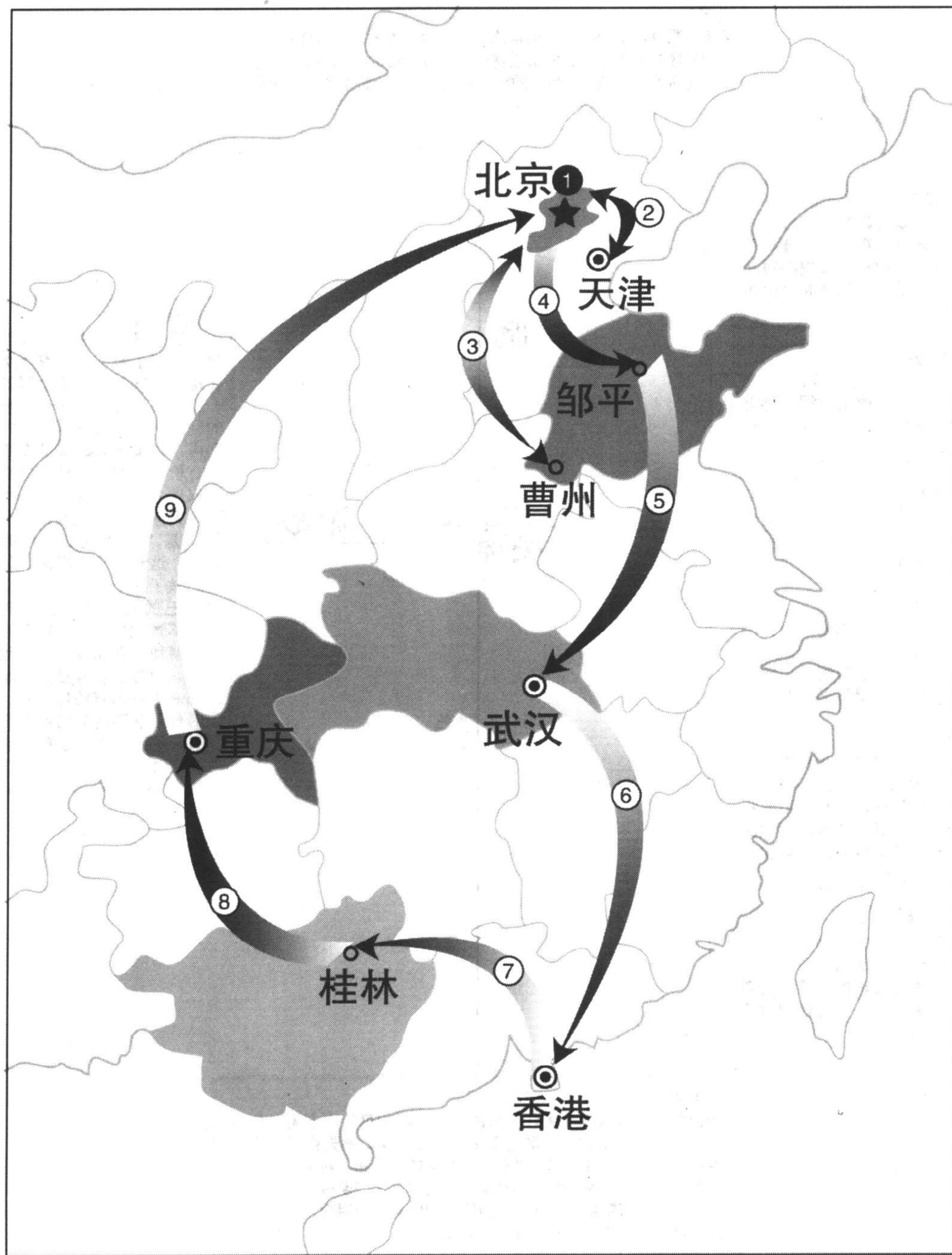
林彪没有路线可言

1973年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梁被逼要就批林批孔的课题发言。他先是拒绝响应，但被逼不过了，于是先声明他的立场是“不批孔，但批林”，说：“我的批林，与大众所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有很多，不管怎样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是甚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

梁漱溟关系图


梁济
父亲对梁漱溟影响极大，他自杀为道德献身的精神、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直影响着梁漱溟。父亲教育他从小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使他后来在任何场合都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父亲的死让梁漱溟弃佛学儒。
师
林宰平
《饮冰室合集》审定者，介绍梁漱溟与梁启超、蒋百里结识，林的理解和安慰帮助梁度过遭受毛批评时候的精神危机。
蔡元培
1916年，梁著《究元决疑论》，由范静生介绍而拜见蔡，蔡对此文十分欣赏，聘梁到北大任教。
李大钊
至熟之友。李遇难后，梁第一个去李家帮助孤儿寡母料理后事。
熊十力
梁漱溟自说与熊先生相交游论学有四十多年。虽然梁对王阳明的推崇影响到了熊十力，但二人思想并不相同。
梁启超
1920年，梁启超对佛学感兴趣，看到《究元决疑论》后，登门拜访，两人由此相识，时时商量学问。梁漱溟青年时受梁启超的文章和思想影响很深。
王国维
1920年在北大教书时结识。王国维与梁父同样是跳水自杀，梁非常理解，梁为父亲编写年谱时，曾就体例问题请教王。
友
梁漱溟
论敌
陈独秀、胡适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新一轮的东西文化论战。1923年，胡适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一年半的回顾》，认为一年半的时间内，以批评梁漱溟的文章最有价值，同时批判梁的文化保守主义。陈独秀也撰文说，梁漱溟被胡适教训了一顿，是“思想上的一线曙光。”这激怒了梁漱溟，他接连做了两个演讲反驳胡适把自己的观念简单化的理论，不过在演讲中，梁漱溟还声明他们是朋友并不是敌人，认为自己和陈独秀、胡适都是难得遇着的好朋友。梁对他们从事的事情都是极为赞成的，只是他们的思想存在不同。
徒
冯友兰
1917年，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冯的思想中未见梁的影响。1955年的批判梁漱溟运动中，冯打头阵，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始观念和“村治”理论。但二人私交并未受影响，照样来往。冯友兰90寿诞时，其女儿宗璞打电话邀请梁参加，梁断然拒绝，但即复信说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

梁漱溟人生轨迹图



①北京。1893年9月9日生于北京。自幼受父亲影响，6岁时，百日维新废除科举，父亲不让他读四书五经，将他送入西学堂，开始关心时事，要为中国寻出路，每日读报，接受革命论。14岁开始关注人生问题。中学毕业后加入同盟会。

②北京←——→天津。辛亥革命成功后，任天津《民国报》记者，对社会黑暗面了解增多，纠缠于人生和社会问题，思想斗争激烈，两次自杀未果。

1913年，《民国报》改组，自动脱离国民党回京。思想日渐消沉，闭门读佛经，做《究元决疑论》，求教于蔡元培，受邀至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期间完成《印度哲学概论》。"五四"时不满西化之风，始读四书五经，为之一震，思想开始由佛入儒，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新一轮东西文化之争。

③北京←——→山东曹州。1924年，因对大学只传授知识技能不满，到山东主持曹州六中，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进行教育改革。半年后因军阀混战回京，苦思中国出路，悟出救国要从乡村始。

④北京——→山东邹平。1927年，应李济深之约赴广州，筹办乡治讲习所，因国民政府互相推诿未果，到上海、江苏、河北、山西等地考察乡村建设工作。因广州动乱，转至河南村治学院。1930年中原大战，学院停办，此后七年都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

⑤邹平——→武汉。抗战爆发，乡村建设被迫中止，随政府撤到武汉，为国防最高参议员，参政议政。

⑥武汉——→香港。为团结抗战，至延安访问毛泽东，彻夜长谈后，对抗战前途充满希望。1939年，由重庆到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等游击区巡视，见到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深惧内战，创建"民盟"，协调国共两党关系。后为摆脱国民党钳制，到香港创办民盟党报《光明报》。

⑦香港——→桂林。太平洋战争爆发，从香港逃难到桂林，着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我的自学小史》，同时为策划两广湖南三省民众抗日奔走。

⑧桂林——→重庆。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参加旧政协，为和平建国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内战爆发后，闭门读书，完成并出版《中国文化要义》。

⑨重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回到北京，为保持中立拒绝毛泽东的邀请不进政府。后看到建国成就，开始认同中共，但不赞同轻视农业、重视工业的总路线，为此与毛泽东当廷面争。后因公开反对"文革"受批判，仍坚持完成《人心与人生》，自觉一生所负使命完成，停止著述。"文革"结束后，被平反，重新参政。在平淡中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以九十五岁高龄于1988年6月23日去世。

钱穆：最后的国学

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矣。

——陈寅恪

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蒙文通

一生为故国招魂。

——余英时



图为一九三一年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然而，百年近代史的变局似乎并没有随着落幕人的去世完全结束。这一点从三人的死亡情形的对比中可见一斑。

据《三松堂自序·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1983年—1990年)》(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记载：冯氏逝世当晚，"时有钟璞、仲德及外孙女冯枚、冯珏在侧，环跪床前，悲泣弃养。"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育有二子二女：冯钟琏(女)、冯钟辽、冯钟璞、冯钟越。冯钟璞为冯友兰次女，著名作家，笔名宗璞，仲德即蔡仲德，宗璞的丈夫。梁漱溟去世之时，身旁则有长子梁培宽、长媳以及两个孙子相伴。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

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 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已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读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已无可悬揣。然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妻子，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美琦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赴港，在新亚学院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北惊声堂讲演时被屋顶落下的泥块

击中头部，胡请假到医院陪护；钱转至台中休养后，胡下班之后就去照顾钱的饮食起居，遂产生“师生恋”，于1956年缔结连理。胡美琦小钱穆30多岁，对钱穆在大陆人生历程自然如同隔世。

《八十忆双亲》一书，成于钱穆80岁生日前夕，即1975年7月。

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49年的选择

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

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说道：

>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

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分别于14日、18日、28日为新华社撰写了5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于那些“走到反面”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随后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也做了举例说明: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即德生一人可例为证。”“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

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直吐胸臆,如见肺腑。”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兄弟二人与钱穆通谱不同支,钱穆通常称钱氏兄弟为叔,基博子钟书又称钱穆为叔。钱基博还是钱穆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时的同事。他对钱氏兄弟非常敬重,“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字)。”然而钱基厚虽然多次力劝,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钱穆描述当时劝人离去的情形说,“如此之类,难以缕举。”由此感慨: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17岁差点投革命军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时值1905年。

这一年,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有关的一件事是,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

这一年,与所有中国人有关的一件事是,1904年2月开始的历时20个月的日俄战争,在9月份以日本击败俄国告终,战争在中国东北展开,战后重新瓜分东北。

这一年,与激进的革命人士有关的一件事是,8月份,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掀起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从钱穆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05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内的思想转变,对钱穆的人生观和以后的治学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一天,他拉着钱穆的小手问道:“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74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

之。"(《八十忆双亲》)

当时，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但最后，他并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历史研究。在学术研究上，也走向了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化革命的时代潮流相反的道路。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呢？

关于钱穆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试举几例：

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辫，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高年级班上有一人名杨权，"倜傥有才气"。一天邀请钱穆在教室中密谈，说太湖沿苏州无锡宜兴一带港汊分歧，陆上多山岩洞穴可躲藏。湖中渔民都全家住在船上，终年不上岸，可以到船上设私塾，教育他们的子女，向他们晓喻民族大义。结语说："我辈果有志革命事业，太湖应为一理想根据地。默察同学中，如君宜可语此。"可见当时的钱穆身上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

退学后，钱穆转学到南京钟英中学。在钟英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1911 年夏，自幼体弱多病的钱穆一连病了 3 个月，10 月方才返回南京钟英中学。那一天早晨，自洪声里乘船赴望亭车站，再乘沪宁铁路火车赴南京。在火车上读报纸，才知道革命军已于昨夜起义武汉，即武昌起义。到达学校的时候，学校正下令全校师生离校。同学张寿昆跟他说，可等待革命军进城的时候去投军。钱穆答应了。这时寿昆得家中来电，告以父病，催他速

返，他于是告诉钱穆，去后即来，坚定地嘱咐他不要离校。后来张寿昆没有音讯，钱穆就乘上了南京开出的最后一班火车。

到了老家，无锡七房桥的世界对待革命的风潮则是另一种心理，自办起团练加以防御。钱穆的长兄钱声一当了团练的自卫队长，伯父叔父们都是团员，声一还和一叔父去上海购买了几十支后膛枪。钱穆在兄长的安排下，也当起了教官，教伯叔父们稍息、立正。钱穆时17岁，至此大约已没有了投革命军的想法。

第二年春，因“乡间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钱穆遂在兄长的安排下，停止学业，到七八里外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职。开始长达80年的教读生涯。

由革命转向“招魂”

钱穆此后革命热情的丧失，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受其长兄影响较大。1906年钱父去世，生活来源顿失。时长兄声一18岁，钱穆12岁，两个弟弟漱六7岁，起八3岁。孤儿寡母，家徒四壁，仅靠本族怀海义庄的抚恤生活。时上距“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8年，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6年，距日俄战争爆发及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两年。当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排满革命思想风行全国。而兄长为生活所迫，于第二年和弟弟钱穆一并考入常州府学堂。钱穆入中学班，而声一入师范班。学堂监督问声一：“汝尚年轻，当求深造，为何投考师范班？”声一答曰：“上有慈母，下有诸弟，家贫急谋自立。”学校感念他的孝心，就派他管理理化实验室，按月给奖学金一份。第二年毕业后，马上回到七房桥创立又新小学，自任校长，此后，钱母就停止领取怀海义庄的抚恤。

兄长声一急于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根本无暇理会当时的革命风潮。对于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必然隔膜。长兄如父，钱穆的升学、转学、生计、疾病、婚姻、妻与子的丧事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

大，对外界的时事变局亦多听从兄意。

二、钱氏弟子严耕望在《钱穆年谱》中说，“（钱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但这是指钱氏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对待外界时局，钱穆的性格却偏于内向和被动，多动摇，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因此，虽有革命冲动，无人带领便听任自然。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否则可能成为顾颉刚的同学。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当时，他已经每月必看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却决心重温旧书，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究其原因，其弟子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的纪念文章中说，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提出“中国不亡论”。这在少年钱穆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由此转入历史的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深具怀疑精神的钱穆很快发现了史学界的问题所在：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刘师培还是胡适等，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解决中国问题，或者全盘否定然后全盘西化；或者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或者干脆主张汉民族西来说。不过，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穆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特别是面对史学界的“革新派”，他大胆地提出要运用传统考证学的精密考据手段，去

发现中国历史的"真相"。

这种学术观的形成，其实隐含着钱穆人生观的定型。其在故纸堆中徜徉日久，精密的考据功夫突飞猛进，虽远离北平、上海等学术重地，却一跃而起，成名于无锡的乡下。这进一步使他确信中国的希望在历史中，而不在现实的革命中。

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针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廖平、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以精密的考证、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他也是因为这篇成名作而被顾颉刚推荐受聘于北大的。

章太炎、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时。胡适在美国写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也是闻章、梁之风而起。但其中具体问题而未能解决者尚多。即以整体而论，诸子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状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根据《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采用大规模考证，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

被顾颉刚推荐到北大以后，钱穆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历史研究。

北京大学的中国通史课，分门别类，分聘北平史学界各断代史专门史教授，合起来称通史。钱穆认为这样一来不能上下贯通，于是独排众议，独自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当时有人认为教学有难度，提出钱穆负责前半部分，陈寅恪负责后半部分，钱坚拒。这是钱穆系统地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开端。余英时比喻为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抗战前夕写成。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因此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大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为了全面系统地挖掘中国历史的真精

神，钱穆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一路下来，人们遂有“通儒”之誉。

1949年以后，钱穆的历史研究方法有所改变，他想通过《朱子新学案》而重建现代儒学之“体”，通过《庄子纂笺》而重显庄子道家思想的用处。

转向历史研究，寻找中国传统独特的人文精神，使钱穆对于身边时时发生的时事，先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后漠不关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罢市，远近城乡震动，钱穆所在的县四高小全体师生也结队赴周围乡村演讲。但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想。

自1930年秋至1937年双十节的7年中，钱穆除辞职回家数月以及四次短时间出游外，基本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学院任教。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6年抗战胜利的8年间，钱穆则在西南联大、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学院、无锡江南大学任教。这前后15年，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危亡的15年。发生的大事有“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围剿”红军、“一二·九运动”、伪“满洲国”成立、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但钱穆的表现则像一个“遗老”。“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他的理由是，“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因自定取舍，力避纷扰。”

1939年，钱穆刚刚写完《国史大纲》，昆明屡屡遭到日机空袭，于是他就离开了西南联大，归苏州探母，然后赴成都，任流亡的山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他走后，闻一多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他“冥顽不灵”。这大概与钱穆后来在成都两获蒋介石召见并应蒋的邀请赴重庆为中央训练团讲演有关。蒋介石在重庆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学案简编，让钱穆负责清代部分。钱穆对此非常感动，认为蒋公以国士待之。但钱穆对闻一多骂他并不感到奇怪，他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

视余为公敌。”

国学之魂何时归？

写到这里，钱穆一生的轮廓基本上站在了我们面前。青少年时期他曾有过热烈的革命冲动，但他基本上是这一场变局中的旁观者。他的学术研究起源于时代的大主题——救亡，但是他又以醇厚的怀旧与犀利的革新相抗衡。他死得确有些凄凉，但当“变局”在他身后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也许会感到些许安慰。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编者注），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1991 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1 年 3 月 9 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正式挂牌工作。1991 年 12 月 16 日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成立。1993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旨在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汪辜会谈”是指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间进行的两岸民间人士最高层的公开接触。

1992 年 1 月 6 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 月 8 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 月 9 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 11 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 54 部，计 1700 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 14 种。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语新解》、《国史大纲》、《新亚遗铎》、《朱子学提纲》、《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理学六家诗钞》、《庄老通辨》、《中国文学论丛》、《双溪独语》、《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钱穆虽然魂归故里了，但是他的后代，除了三子钱逊在清华大学担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外，其他子女均于这位国学大师的家学无涉。从钱穆给子孙的信中了解到，他虽然以隔海飞鸿的方式遥控指导子女们读书，但是明显感觉到他对他们并无过高的期望。1981 年 2 月 15 日钱穆在给钱逊的信中写道："你年事已不轻，并在学术界做事，幸加努力，不以无知无识虚度此生，则我所望也。"钱穆教导他多读自己早年所写的《论语新解》，而对于后期的著作《朱子新学案》等，太涉专门，可勿轻率涉猎。就钱逊准备为父亲编写年谱一事，钱穆则答复说："此事万非你所能，幸勿存此想。"生于 1933 年的钱逊已经 48 岁，当时还在清华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哲学教研组任教。而钱穆在 33 岁就已经写成被学界称为"开辟战国史新纪元"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35 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结束今古文之争，震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比较之下，难免让人生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

钱穆对于孙女钱婉似乎颇为青睐，专门写信给她开出书单："《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不宜早读，《论语新解》则尽可读"，"《庄子纂笺》亦宜看"，"《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庄老外，该读《史记》"，"倘读中国通史，最好能看我的《国史大纲》"。这封信同样写于 1981 年，钱婉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爱好文学。但是，此时的北大已非 50 年前钱穆任教时的北大，中文系亦非当年沈兼士、马裕藻等诸多大师们执教的国文系了。如此"函授"，尽管是学校教育之外"开小灶"，但也很难使生于 60 年代的学子继承他的绝学了。

大师的后代尚且如此，何况他人乎？

西方的市场经济观念，给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

但其思想基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同时涌入,此情此景与近百年前民国一代学人遭遇的情形何其相似,但是,当时拥有国学根底的一代学者们,面对西方的科学精神,展开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跨世纪人文工程。而今,自由主义思潮笼罩之下,实用主义成为人们的精神桎梏。即如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中,学习中文之人,鲜有了解经学、汉学、宋学、朴学者,学习中国历史之人,也罕有钱穆所强调的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等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们恐怕地下有灵,也未能预料到吧?

国学大师魂归来兮,而国学之魂何时也能归来呢?

轶事

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看相

某日,有一人自四川来。其人善相,家世相传已三代矣。其来特为梁漱

溟相，即住漱溟家。漱溟特邀十力锡予同余俱至其家，请相士一一为余三人相。又一日，其人特来南池子锡予（即汤用彤——编者注）家余室中，十力亦在，彼又为余三人相，所言皆能微中。谓十力乃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并言漱溟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言余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下当能先后如一。适克文自外端茶入，余告相士，可为此君一相否。相士乃曰，此君有官相。乃摸其后脑骨有顷，曰，为日不远，官运来逼，弗可避。锡予十力皆出手挽克文臂曰，汝闻之，即日做官人去，可庆可贺。克文默不言，即避去，不再来。（摘自《八十忆双亲》）

冯友兰借题揶揄钱穆

抗战时期，冯友兰与钱穆同时任教于西南联大，二人仍旧操持本业，冯教哲学，钱教历史。一日，冯以新作《新理学》示钱，并请提意见。钱读后，直言告冯：凡中国之理学家，论理气必兼心性，两者原本相辅相成，缺一有损；今观君书独论理气，而不及心性，恐有未当。钱又谓冯：书中没有论及鬼神，也似应增补。冯默然以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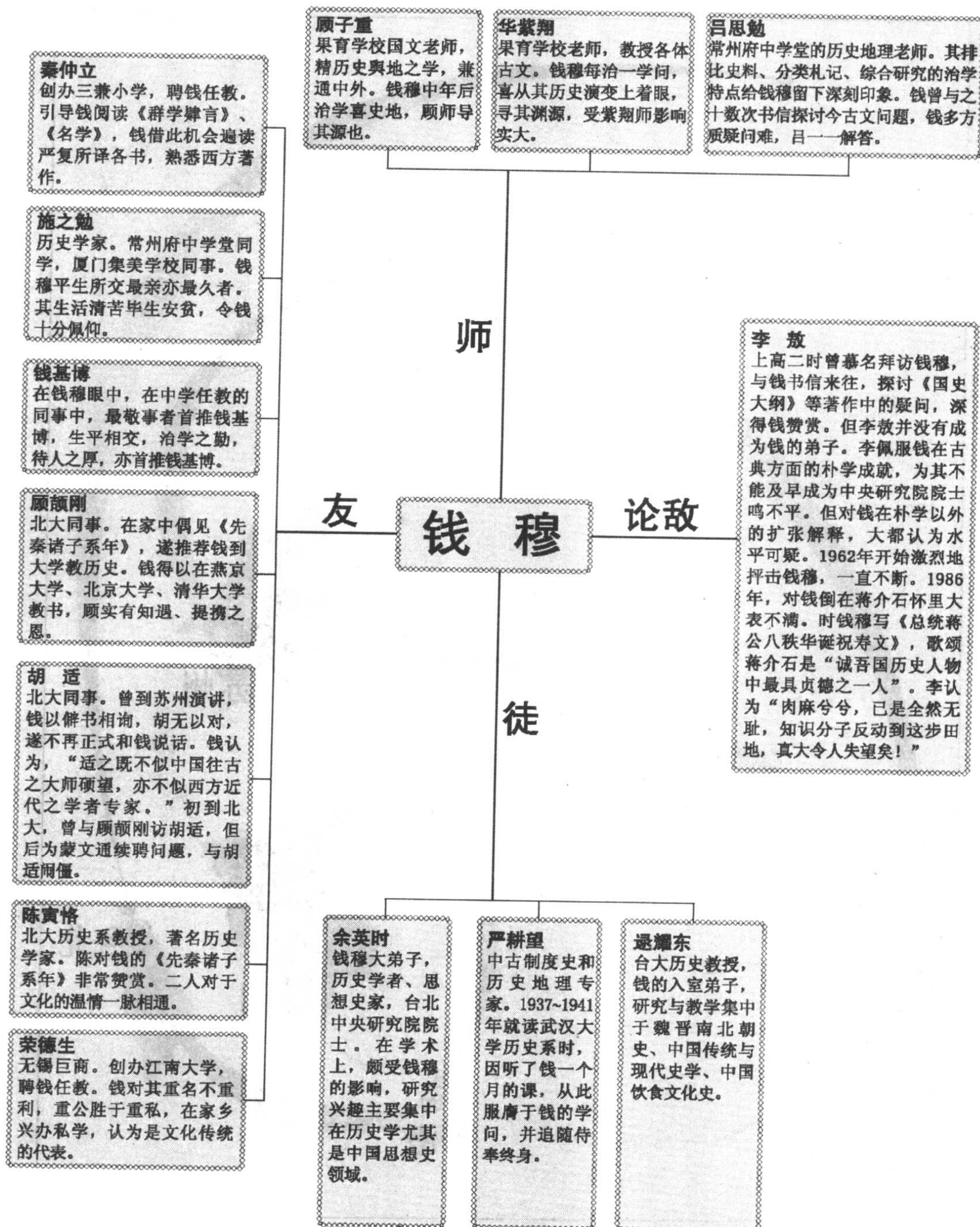
后来，冯友兰前去联大文学院演讲，钱穆亦在座。冯在演讲中谈及鬼神，不知是有意借题揶揄，以报先前怨气；还是即兴发挥创见，以活跃会场气氛，他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接着，就指着钱穆道："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

与梁漱溟不欢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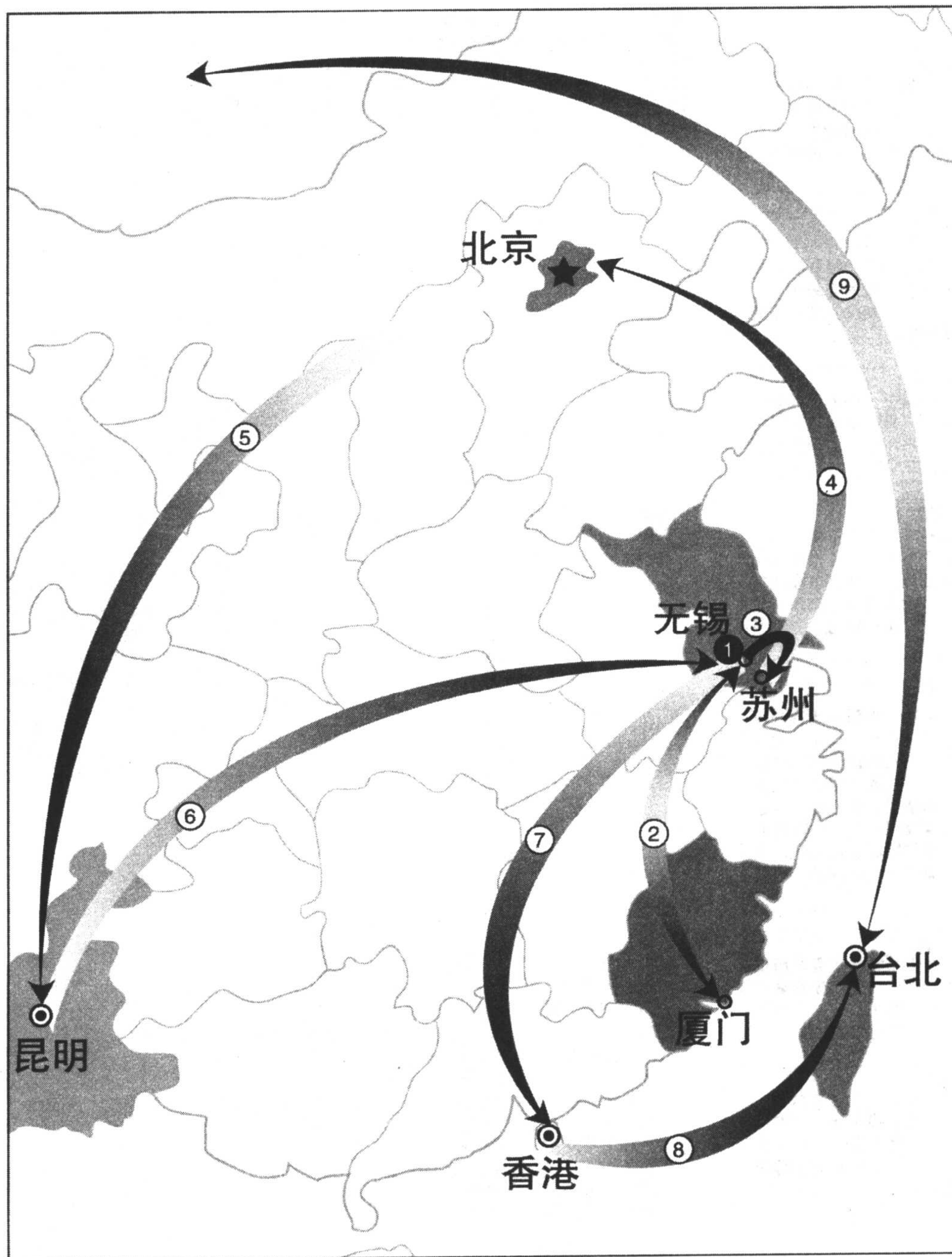
1942年，梁漱溟突然来访，说他正准备创办一个文化研究所，邀请钱穆合作。钱当即答应，问什么时候开始筹办。梁说，政府正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会议有了结果就马上开始。钱说，你做文化研究，为教导后来者，是很重要的事情，请今天就开始筹备吧。如果等政治协商会议有了结果，恐怕是幻想。梁听后大为不悦，从凳子上站起来说道："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

望。"钱穆语带讥讽地说,你说得没错,不过当时两党合作需要缘分。你进言是父母之命,还是媒妁之言呢?当今流行自由恋爱,你不知道吗?梁漱溟自然很不高兴,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两人于是不欢而散。

钱穆关系图


顾子重
果育学校国文老师，精历史舆地之学，兼通中外。钱穆中年后治学喜史地，顾师导其源也。
华紫翔
果育学校老师，教授各体古文。钱穆每治一学问，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寻其渊源，受紫翔师影响实大。
吕思勉
常州府中学堂的历史地理老师。其排比史料、分类札记、综合研究的治学特点给钱穆留下深刻印象。钱曾与之十数次书信探讨今古文问题，钱多方质疑问难，吕一一解答。
师
秦仲立
创办三兼小学，聘钱任教。引导钱阅读《群学肄言》、《名学》，钱借此机会遍读严复所译各书，熟悉西方著作。
施之勉
历史学家。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厦门集美学校同事。钱穆平生所交最亲亦最久者。其生活清苦毕生安贫，令钱十分佩仰。
钱基博
在钱穆眼中，在中学任教的同事中，最敬事者首推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钱基博。
顾颉刚
北大同事。在家中偶见《先秦诸子系年》，遂推荐钱到大学教历史。钱得以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顾实有知遇、提携之恩。
胡 适
北大同事。曾到苏州演讲，钱以僻书相询，胡无以对，遂不再正式和钱说话。钱认为，“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初到北大，曾与顾颉刚访胡适，但后为蒙文通续聘问题，与胡适闹僵。
陈寅恪
北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对钱的《先秦诸子系年》非常赞赏。二人对于文化的温情一脉相通。
荣德生
无锡巨商。创办江南大学，聘钱任教。钱对其重名不重利，重公胜于重私，在家乡兴办私学，认为是文化传统的代表。
友
钱 穆
论敌
李 敖
上高二时曾慕名拜访钱穆，与钱书信来往，探讨《国史大纲》等著作中的疑问，深得钱赞赏。但李敖并没有成为钱的弟子。李佩服钱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为其不能及早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鸣不平。但对钱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大都认为水平可疑。1962年开始激烈地抨击钱穆，一直不断。1986年，对钱倒在蒋介石怀里大表不满。时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李认为“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
徒
余英时
钱穆大弟子，历史学者、思想史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颇受钱穆的影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领域。
严耕望
中古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专家。1937~1941年就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因听了钱一个月的课，从此服膺于钱的学问，并追随侍奉终身。
逯耀东
台大历史教授，钱的入室弟子，研究与教学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

钱穆人生轨迹图



①无锡。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7岁入私塾，三年后进入新式学校，自此接受新学教育。18岁因家贫辍学任教，此后一意自学读书。1913年萌发投考北大之意，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及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始知经学之有古今文之别。

②无锡←——→厦门。1922年秋，赴厦门集美学校教授国文，因与校方争执，旋即返回无锡，由钱基博介绍，转入无锡第三师范任教。

③无锡——→苏州。1927年秋，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次年，完成《先秦诸子系年》、《国学概论》。

④苏州——→北京。1930年秋，被顾颉刚荐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震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次年秋，转入国立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先后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兼课清华大学。1933年秋，在北大首开"中国通史"课，同时兼课燕京大学。

⑤北京——→昆明。1937年时局动荡，辗转香港、广州、长沙、桂林、河内等地至昆明。任教西南联大文学院。抗战期间，因家事数度往返于内地与后方，应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多所高校之邀讲学，还曾担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导师。期间，在成都两度受到蒋介石召见，深为感动。抗战胜利后，恐陷入国共纷扰之中而重返昆明，兼任云南大学课务。

⑥昆明——→无锡。1948年春转赴江南大学任教。

⑦无锡——→香港。大陆解放前夕，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赴广州。同年秋，随侨大迁往香港。新亚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创办，任院长。

⑧香港——→台北。1950年冬，赴台北。1953年办新亚研究院。期间写成《中国思想史》、《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及《中国学术史论集》。

⑨台北←——→欧美。1960年1月，先去日本，然后夏威夷，后执教耶鲁大学。暑期应邀到哈佛讲演《人与学》。后到加拿大多伦多。留美共7个多月后，转赴伦敦。22日后，转巴黎，再转罗马。

从罗马返回香港，完成《论语新解》。1965年正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7月去马来亚大学讲学凡8月。

1967年10月迁居台北。两去日本，两去韩国。三年后，再度赴港。此后十余年间，陆续出版《八十忆双亲》、《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参考数据》等多部著作。1980年，以86岁高龄始得赴港与大陆三子一女相见。1990年8月，逝于台北。

三部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

冯友兰先生任文学院长十八年，在此期间，延聘学者，奖掖人才，并提出释古的观点，主张对历史要做同情的了解。他与清华诸师长一起，开一派之学风，在文史哲各方面钻研精进，形成了清华学派，后人总结为四个要点：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海派活泼创新的见解与京派扎实严肃的研究相结合，为我学术界、教育界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清华大学冯友兰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纪念文



冯友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卜德译为英文，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图为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冯友兰（中）由女儿宗璞（左）等陪同，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该校校长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寿筵变葬礼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

著名学者汤一介，是冯友兰的老同事汤用彤(锡予)先生的公子，他继承乃父家学，也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当时正主持“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书院筹备召开“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

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

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在最后这几个月里，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她既盼着全书的完成，又害怕全书真的完成。她知道，父亲的生命，就是为写完全书这个使命感支撑着，这个使命完成了，父亲的身体还能支撑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好。

在1990年初，有一次，医生给冯友兰检查完后，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女儿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县疣，死为决疣[①]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

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

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

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

第二天，李泽厚、陈来到医院看望，冯友兰对他们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异彩！""要注意《周易》哲学。"这是哲学家冯友兰一生中关于哲学的最后言论。

11日，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从外地赶来。据他回忆，在其后的半个月里，冯友兰还断断续续说过很多话，但没有一次说到"死"，也没有说自己身后要如何如何。涂又光说："我有此注意，是因为我忧心他可能不起，我心有死字。我领悟到，他言不及死，是因为他心无死字。"冯友兰已经超越了死亡。

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

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

①疣(yóu)：这里义同"瘤"。"附赘县疣"喻指多余的东西。疣(huàn)、痈(yōng)均为毒疮。"决疣溃痈"指毒疮化浓而破溃。整句话就是说，把生命当作是多余的赘瘤，把死亡当成是割掉了身上的溃疡浓疮。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道术多迁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大大改善，日本与中国建交。冯友兰当年在清华的研究生王浩回国参观，向冯友兰询问他的思想改变过程，冯友兰给他写了一首诗，后面两句是：

若惊道术多迁变

请向兴亡事里寻

特殊的时代风云，造就了冯友兰哲学与思想的变迁。

二史释今古

六书纪贞元

这是冯友兰在1990年3月为自己预拟的95岁寿联。

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10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胡适的这部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蔡元培亲自为之作序。他认为胡适做成了一件对所有中国学者来说都很困难的事

情。因为第一，先秦的材料真伪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朝人叫作“汉学”的功夫，所搜集的材料一定很多错误；第二，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各家著作之间都是平行的记述。因此编成系统的哲学史没有前人的著作可以依傍。胡适既有相当的汉学根底，又专门研究过西洋哲学史，几乎是当时唯一的人选。

蔡元培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备四个特点：一、利用汉学的方法证明史料的真伪；二、砍掉三皇五帝，直接从老子、孔子写起，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三、废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思想，都认为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平等的态度；四、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即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胡适的这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广泛的，冯友兰认为，胡适实际上是把西方学术的“金手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用来对中国学术点石成金。

有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前，就好像在后来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是很难超越的。

冯友兰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有正反两方面的自我评价：

一、引以为自豪的是，此书的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为前人所未发，后人所不能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二、存在两个弱点，即讲佛学失于肤浅，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

这是冯友兰自己的看法。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

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陈寅恪的基本评语是“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他认为，中国的考据

学已经能辨别出许多古书的真伪，但是对于伪材料能考证出其时代和作者，并说明这个时代和作者的思想，把伪材料变成“真材料”加以利用的并不多见。冯友兰在这本书中做到了。这说明他有史学通识和纵贯学术的眼光。

陈寅恪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了比较。他认为胡适写的哲学史，并不依据古书古字，而是随自己一时的兴致所至，主观更改古人的意思，这并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他自身的哲学史。其言论越有条理、系统，则离古人学说的真相越远。冯友兰的著作正好矫正了这种恶习。

金岳霖也持同一观点，他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带着美国商人的成见写成的。这个成见就是以竞争为生活的常态，以变迁为进步。哲学本来就是一种成见，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另一种成见，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他又说，胡适并不擅长西洋哲学和名学，所以在兼论中西学说时，不免牵强附会。而冯友兰的著作则没有这个缺陷。

由此可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的工作中，具有不可埋没的创始之功，而冯友兰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则以之为鉴，后来居上，一开始就为中国上层学术界普遍接受，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实际上，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

1946 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 世纪 60 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前面所引的冯友兰的诗中之所以写“二史”而不提“三史”或“四史”，正可显示他忏悔自己哗众取宠的行为，弃绝那个时代的内心世界。

这显示了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变”。而也正如冯诗所言，欲了解“变”的

原因,需要"向兴亡事里寻"。

冯友兰出生于1895年12月4日,正是甲午战败几个月后。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商人,后来在那里定居。家底殷实,到祖父一代仍然有1500多亩地。祖父、伯父、叔父均是秀才出身,已经由商人变成了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光绪戊戌(1898年)科中进士,被吏部分发湖北候补。

由于冯家经济宽裕,就聘请了私塾先生,家族里七八个堂表兄妹一起读书。就在这个小小的私塾里面产生了著名的"冯氏三杰"。除冯友兰外,他的弟弟冯景兰后来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淑兰,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冯沅君,与黄庐隐、凌叔华、谢冰心齐名。

和那个时代许多孩子一样,冯友兰在私塾里先读《三字经》,然后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同时读一些《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的八股用书。那时的私塾已经有"西学"渗入,《地球韵言》是那时最早的地理书。读完《四书》开始读经,读到《诗经》的时候,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父亲就在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实行新政的湖北谋到了一个职位。新政中包括办新式教育,张之洞派他幕府中的幕友梁鼎芬办了一所外语学校——方言学堂。梁鼎芬是武昌知府,也是当时的大名士,就兼任了学堂的监督,也就是校长,冯友兰的父亲担任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于是,冯友兰的学习地点就改到了武昌。

当时已经出现新式小学,冯友兰的父亲却不让子女们上小学。其实冯台异是赞成新政的,但他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于是就让夫人吴清芝监督孩子们背经,孩子们遇到母亲不认得、念不出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就这样,冯友兰又读完了《书经》、《易经》,然后开始读《左传》。

1907年,张之洞入军机处,梁鼎芬署理臬台(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于是派冯台异为崇阳县知县。这一来,冯友兰又有了教读师爷,不过不再读经,而是学习古文、算术、写字、作文。遗憾的是一年后父亲暴病

而亡。

回到老家以后，考入县立小学。1911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开封中州公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冯友兰又回到老家。河南唐河光复后，再回到中州公学。后被河南省官方选派到上海的中国公学，毕业后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3年后回到河南任教。1919年在河南响应五四运动。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河南官费留学美国的名额。1923年获博士学位。

就这样，在动荡的年月里，冯友兰完成了学业。冯友兰的国学底子虽然不如其他国学大师深厚，但是他较早地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美国从新实在论者孟太格专门学习西方哲学，这就为他回国后专门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前沿的治学框架，并且使他始终关注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

1933年，冯友兰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已经在清华任教满5年。清华的规矩，教授任教5年，可以获得一年的出国机会，冯友兰就利用这机会，远赴欧洲。

他先来到英国，住在大英图书馆附近。一边准备在各大学的讲稿，一边在图书馆看书。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但实事求是地讲，冯友兰在这里看了很多关于共产主义的书，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猜想，他可能对国民党禁止的思想感到兴趣，但在国内，他又不好公然阅读这一类图书吧。到了这里，有了一个读禁书的机会，那就大读特读起来。

总之，冯友兰的思想受到了这些书的影响。他后来承认说："1933年，我在英国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历史唯物论帮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自从1933年起，我一直相信马恩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不过，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持历史唯物论……"

1934年，他到苏联访问。看到苏联的情况，他总结说，封建社会是"贵贵"，资本主义社会是"尊富"，社会主义是"尚贤"。他认为，"尚贤"是最合理的。

回国之后，很多地方请他去做演讲。在清华学生会，他就讲了《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对苏联的社会制度表示肯定。而此时，蒋介石正在对中央苏

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冯友兰这么讲,真是犯了政治上的大忌。

在北大,他讲的题目是《秦汉历史哲学》。他在论述了中国的“五德”、“三统”、“三世”等说法之后,论述了自己理解的唯物史观。他说,唯物史观“以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的,实在是一点不错”。他还说:“每一套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各有其历史的使命,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历史的使命,是把一切事业集中,社会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预备。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成功的时候,也就是它应该,而且必须让位的时候。”

在当时的北平,冯友兰讲这些,真可谓振聋发聩。

人们听后,纷纷说:“冯先生变了。”这是在 1934 年 11 月 25 日。

3 天之后,11 月 28 日中午,冯友兰在自己的院长办公室,正要下班回家吃午饭,秘书长打电话来说:“你先别出去,有个人要来找你。”

不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人,对冯友兰说:“警察总监请你去说一句话。”

“什么时候?”

“现在就走。”

事后有人告诉冯友兰说,那人拿着一支手枪,暗中对着冯友兰。

冯友兰被带到警局,戴上手铐,坐上闷罐车,押到保定。

清华的学生知道冯友兰被捕的消息之后,群情激愤。

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去找北平行营主任黄郛(蒋介石把兄弟)、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冯友兰的老朋友傅斯年,分别在北平、南京展开对他的营救活动。

冯友兰在一夜之间,成了举世闻名的进步教授。

冯友兰到保定之后,被单独安置在一个房间里,有人过来,要他写个材料,说明到欧洲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当天就要写完。

冯友兰到欧洲,跟个普通旅游者差不多,就是在捷克的时候,见过南京政府的司法院长居正,居正跟他谈了很多孙中山当年在东京的故事。于是,冯友兰就把这个写了。

第二天,那人来说:“你写的上面已经看了。军政部何部长已经来

电报。"

于是，那人拿出一份何应钦的电报，电文是："冯友兰若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

冯友兰就这样，遭受了短暂的牢狱之灾。

没有变过来

这时候，冯友兰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跟政府大闹一通，就此加入革命的队伍；也可以退缩回去，继续做谨小慎微的学者。

有人就跟他出主意说："你不该轻易回来。"进一步说，冯友兰应该跟保定行营的人说："放不放由你，走不走由我。你们必须说明，为什么逮捕我？根据什么法律？是谁下的命令？"

当时的清华，教授和学生都准备开会，如果冯友兰选择这样做，会得到很大的支援。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个勇气。

"冯先生变了。"但没有变过来。——大约50年之后，冯友兰回忆自己当时的心境，这样写道。

事情过去之后，校长梅贻琦要去南京开会，跟冯友兰说："你也到南京去走一趟，叫他们看看你这个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冯友兰就去了南京，住了几天，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抗战之中，冯友兰虽曾为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讲过"中国固有道德"，也经常受命与蒋介石吃饭。但他接受了的唯物史观，始终都没有放弃。

也因此，当1948年底那个天玄地黄的时代分水岭之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他主动留了下来，被举主持清华的校务，准备解放军的接收。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8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

30多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绝好的注脚。

冯友兰既然认同唯物史观，他对新社会是认同的，他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北京郊区的土改，还写了一篇体会文章，收入文

集的时候,他把这篇文章改名为《我参加了革命》。

虽然有一些反复,但冯友兰还是逐渐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

1954 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1955 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兼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这几项职务加起来,他的月收入超过了 500 元。

1954 年,他还受邀请,参加宪法初稿讨论会。

1956 年,百家争鸣时期,毛泽东对冯友兰说:“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冯友兰此时心情舒畅,决心为新中国多培养研究人才。他对自己没有学生带、没有研究助手很苦恼,跟当时主持北大工作的江隆基说:“我是家有万贯,膝下无子。”江隆基对此感触很深,多次在会议上引用。

这一年,冯友兰向北大党委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 1957 年,事情起了变化,反右扩大化虽然没有波及冯友兰,但他提出的对中国传统哲学抽象继承的方法遭受了批判。冯友兰说:“在解放以后,我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与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刚一提出来,就受到了批判。”

1960 年,北大相关负责人对冯友兰表示,对批判有些过火的地方,表示道歉。冯友兰表示,自己的工作,“该怎么积极还怎么积极”。北大批准了他开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并承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2 年,《新编》第一册果然就出版了。1 年以后,第二册也出版了。这是建国后出版的唯一的一部由个人编写的哲学史著作。

《新编》出版后,照例受到批判。但冯友兰已经习惯了批判,认为这是对他工作的帮助。他对自己很快完成全书的写作充满了信心。

但时代已经不允许他在这时候继续写作了。

谄媚江青?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冯友兰五年以来相对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他被赶出家门,隔离审查。

1968年,忽然,他被释放回家。据说,是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回家之后,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表明仍然希望改造自己,为国家工作。

当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的时候,还要批尊孔,冯友兰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受批判了。他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冯友兰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是《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大会上一念,效果非常好。北大学报的编辑来要走了发言稿,在学报上登了出来。

很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北京日报》随即也转载了。

文章见报之后,各地群众给冯友兰写的祝贺信,蜂拥而至。冯友兰解放以来一直受到群众的批判,这以后境遇全然改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冯友兰再没受过批判。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机会也很巧。在一次会议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的情况,说到冯友兰也写了文章,毛泽东听到了,马上就要看。当时的负责人立即就回家去拿,拿到会场,毛泽东立即就看了,还亲自修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就这样,《光明日报》刊登了冯友兰的文章。

后来,冯友兰忏悔说,当时的自己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做了哗众取宠的事情。

1973年夏天，谢静宜到冯家，说是江青派她来问候冯友兰。问候完了，建议冯友兰写信感谢江青。冯友兰就写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

这年秋天，北大、清华成立两校大批判组，要求冯友兰当顾问。他参加过一些稿子的讨论，也帮助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走到冯友兰面前，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

几天后，冯友兰跟大批判组一起到天津，江青开会说："听说你们要请我吃饭，不必请了，就算是个聚餐会，大家都出钱，这几个钱我们都还出得起。"接着问冯友兰："你的工资多少？"冯友兰回答："三百三十五。"江青说："比我的工资还多啦！"接着江青就开始吹嘘她的历史。下午，冯友兰丹毒发作，住进了医院。

在批儒评法运动中，冯友兰写了若干首咏史诗，其中一首论武则天的说："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这首诗发表了出来，后来成了冯友兰谄媚江青的证据。

对于冯友兰来说，他的政治头脑是不够的，他以为江青就代表毛主席，他以为自己是和毛主席保持一致，是在为革命工作。但他自思，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心，不能说完全是上当受骗。

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时候，梁漱溟主动要求到冯友兰家谈一谈。但是，到1985年，冯友兰90华诞，请梁漱溟到家赴宴时，梁称天冷不能出门。几天后，梁漱溟寄来一信，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

宗璞读信后大为不平，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并命宗璞寄去自己的《三松堂自序》。忙过寿庆之后，冯友兰口述、宗璞笔录了一封给梁漱溟的回信。

数日之后，两位五四老人在梁家会面，关于"谄媚江青"，冯友兰对梁说，一切事实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写清，读过《三松堂自序》的梁漱溟未对

此发表意见。也就是说，梁漱溟认可、接受了冯友兰的解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遭到了新一轮批判。这时候，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任载坤因肺癌去世，冯友兰非常悲痛，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

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进入8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

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

冯友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学习哲学的几个留学生之一。胡适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白话文运动，关于哲学，就写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册。金岳霖的思想深入而细密，他主要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只有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也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有开创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也是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家之一。

轶事 冯友兰

藏匿共产党

1936年，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有一次，当局要逮捕几个学生，派军

队包围了清华大学。学生聚集在体育馆据守，军警准备攻打体育馆。这时候，梅贻琦校长打电话叫冯友兰去开会。冯友兰刚要出门的时候，来了两个学生，显然是来他家躲藏的。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就出门开会去了。会上，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后来，他们找到了北平市长，市长又找了北平当局的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下令把军警撤出了校园。

冯友兰回家，妻子任载坤对他说，那两个学生走了，也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在客厅的大沙发上睡着了，鼾声特别大。任载坤听门口杂人来来往往，害怕出危险，就把学生叫醒，让他们藏在后院的厨房里。

解放后，在一次会议上，冯友兰碰到姚依林同志，姚依林告诉他说，当天在冯家躲藏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他。

特殊意义的骨折

1938年南渡中，冯友兰乘坐的汽车路过广西凭祥古城，司机请大家在车进古城时把手放回窗内，而冯友兰却偏要将手放在窗外，他要体验这两者的区别，思考其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是什么。结论还未寻到，他的手臂骨折，只好转到越南河内，住院治疗。

没办手续就入了国民党

"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选自《三松堂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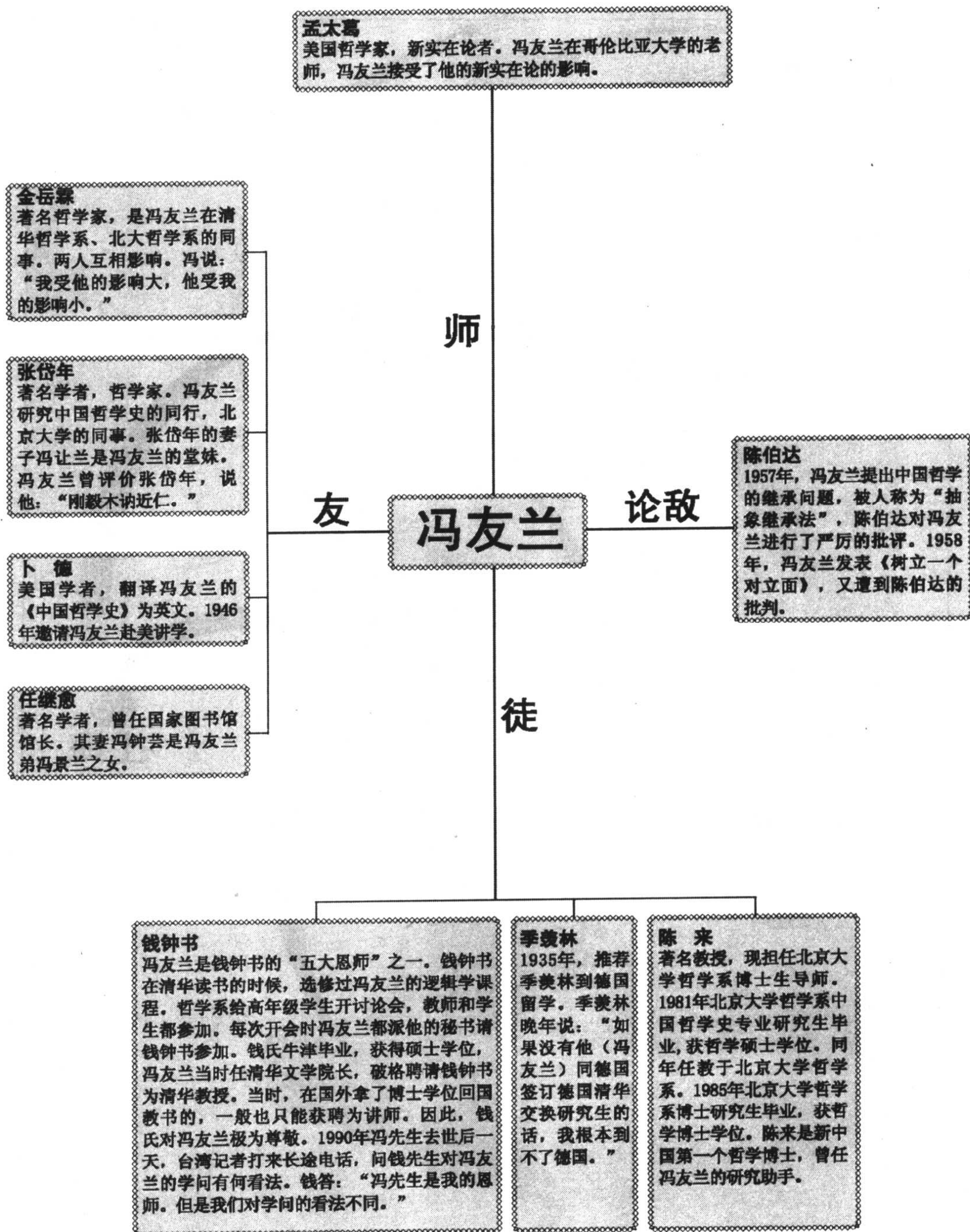
破例聘钱钟书为教授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

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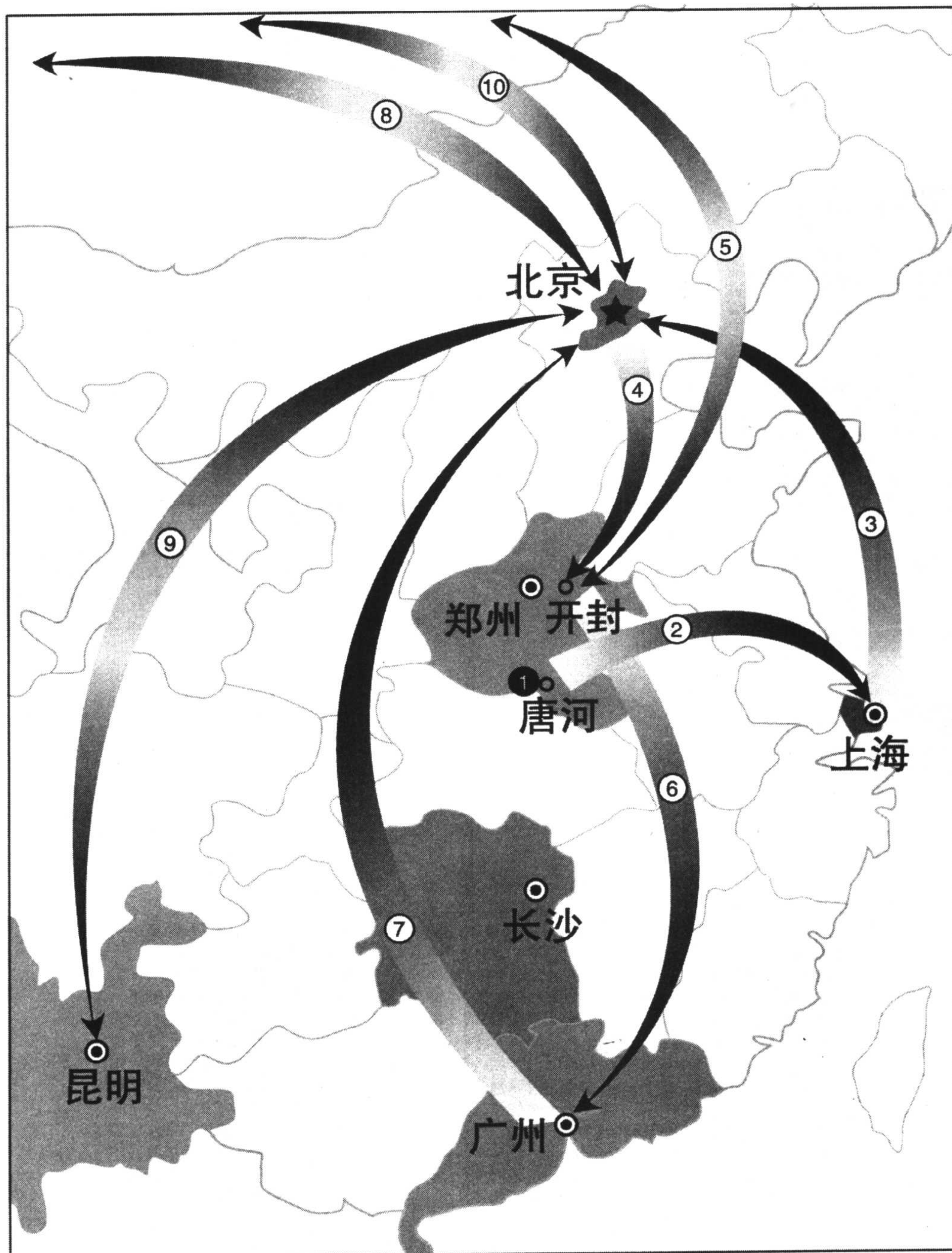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冯友兰关系图



孟太葛
美国哲学家，新实在论者。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冯友兰接受了他的新实在论的影响。
师
金岳霖
著名哲学家，是冯友兰在清华哲学系、北大哲学系的同事。两人互相影响。冯说：“我受他的影响大，他受我的影响小。”
张岱年
著名学者，哲学家。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行，北京大学的同事。张岱年的妻子冯让兰是冯友兰的堂妹。冯友兰曾评价张岱年，说他：“刚毅木讷近仁。”
卜 德
美国学者，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英文。1946年邀请冯友兰赴美讲学。
任继愈
著名学者，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其妻冯钟芸是冯友兰弟冯景兰之女。
友
冯友兰
论敌
陈伯达
1957年，冯友兰提出中国哲学的继承问题，被人称为“抽象继承法”，陈伯达对冯友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58年，冯友兰发表《树立一个对立面》，又遭到陈伯达的批判。
徒
钱钟书
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钱钟书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选修过冯友兰的逻辑学课程。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都派他的秘书请钱钟书参加。钱氏牛津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冯友兰当时任清华文学院长，破格聘请钱钟书为清华教授。当时，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国教书的，一般也只能获聘为讲师。因此，钱氏对冯友兰极为尊敬。1990年冯先生去世后一天，台湾记者打来长途电话，问钱先生对冯友兰的学问有何看法。钱答：“冯先生是我的恩师。但是我们对学问的看法不同。”
季羡林
1935年，推荐季羡林到德国留学。季羡林晚年说：“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陈 来
著名教授，现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陈来是新中国第一个哲学博士，曾任冯友兰的研究助手。

冯友兰人生轨迹图



①河南。1895 年，出生于河南唐河县，幼读于私塾。其后，随父亲工作变动在武汉、湖北、河南生活，期间随母亲、师爷在家读书。1908 年父亲亡故，回老家，入公立学校学习。

②河南——→上海。1912 年，考取上海中国公学，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

③上海——→北京。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

④北京——→开封。三年毕业，回到开封，任教于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五四运动爆发，积极响应，宣传新文化。

⑤开封←——→美国。1919 年，考取河南省官费第一名，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太格。1923 年获博士学位，归国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

⑥开封——→广东。1925 年 7 月，到广东大学执教。

⑦广东——→北京。因广东局势混乱，1926 年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1928 年到清华，任校秘书长、哲学教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迄今仍是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⑧北京←——→欧洲。1933 年，出访欧洲，在英国讲学，后赴德、法等国观光，后又获准访苏。其间，阅读了马恩原著和许多共产主义的书籍，高度认可社会主义。

1934 年回国，思想转变，介绍历史唯物论，引起国民政府不满，11 月被捕。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旋即释放，但冯因此一夜闻名，成为进步教授。

⑨北京←——→昆明。1937 年卢沟桥事变，随清华大学被迫迁至湖南长沙。1938 年，由长沙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期间写作《新理学》等六本书，构建了一个新理学体系。抗战中，多次到重庆，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宣讲“中国固有道德”。1946 年 7 月，回到清华。

⑩北京←——→美国。1946 年 8 月，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讲授中国哲学史，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并用英文写就《中国哲学小史》。次年下半年，担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1948 年初，回到清华大学，9 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2 月，主持清华校务，迎接解放。解放后，主动进行思想改造，并决心用马列主义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来到北大。自 1951 年，先后参团出访印度、缅甸、瑞士、华沙、苏联、美国等，参加国际文化交流及哲学学术会议。

1980 年，以 85 岁高龄重新开始写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以 95 岁的高龄完成全书，此后 5 月辞世。